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一九九一年十月三十日星期三

下午二時三十分開始會議

出席者：

施偉賢議員，C.B.E., Q.C., J.P.（副主席）

布政司霍德爵士議員，K.B.E., L.V.O., J.P.

財政司麥高樂議員，J.P

律政司馬富善議員，C.M.G., J.P.

李鵬飛議員，C.B.E., J.P.

張鑑泉議員，C.B.E., J.P.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范徐麗泰議員，O.B.E., J.P.

許賢發議員，O.B.E., J.P.

李柱銘議員，Q.C., J.P.

李國寶議員，O.B.E., J.P.

倪少傑議員，O.B.E., J.P.

彭震海議員，M.B.E.

司徒華議員

譚耀宗議員

黃宏發議員，O.B.E., J.P.

劉皇發議員，O.B.E., J.P.

何承天議員，J.P.

夏佳理議員，J.P.

鮑磊議員，O.B.E., J.P.

林貝聿嘉議員，M.B.E., J.P.

劉健儀議員，J.P.

劉華森議員，O.B.E., J.P.

梁智鴻議員

麥理覺議員，O.B.E., I.S.O., J.P.

杜葉錫恩議員，C.B.E.

黃匡源議員，J.P.

陳偉業議員

陳坤耀議員

鄭海泉議員

鄭慕智議員

張建東議員，J.P.

張文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

馮智活議員

馮檢基議員

夏永豪議員，M.B.E., J.P.

何敏嘉議員

黃震遐議員

葉錫安議員

林鉅津議員

林鉅成議員

劉千石議員

劉慧卿議員

李永達議員

梁錦濠議員

李家祥議員，J.P.

李華明議員

麥列菲菲議員，O.B.E., J.P.

文世昌議員

吳明欽議員

潘國濂議員

唐英年議員，J.P.

狄志遠議員

涂謹申議員

黃秉槐議員，M.B.E., J.P.

黃宜弘議員

楊森議員

楊孝華議員

列席者：

立法局秘書羅錦生先生

文件

下列文件乃根據會議常規第 14 條第(2)段的規定而呈交局方省覽：

項目

附屬法例	法律公告編號
1991 年執業律師（費用）（修訂）（第 2 號）規則.....	385/91
1991 年申請執業及註冊（修訂）規則	386/91
1991 年訟務律師（資格）（修訂）規則	387/91
1991 年執業證書（訟務律師）（修訂）規則	388/91
1991 年船舶及港口管理規例（修訂附表）公告	389/91
1991 年執業律師（修訂）條例 1991 年（生效日期）（第 2 號）公告	390/91

一九九一至九二年度會期內省覽的文件

- (11) 蔬菜統營處截至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週年帳目結算表
- (12) 魚類統營處截至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週年帳目結算表
- (13) 一九九〇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農產品獎學基金報告書
- (14) 一九九〇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海洋魚類獎學基金報告書

各項問題的書面答覆

法律援助（修訂）條例

一、 麥理覺議員問題的譯文：為本港收入微薄人士擴闊法律援助範圍的 1991 年法律援助（修訂）條例，已於本年五月獲得通過，但卻仍未實施，請問此項法例將於何時生效，其延擱理由何在？

布政司答覆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1991 年法律援助（修訂）條例仍未實施，因為原先指定供實施這項條例之用的撥款，須用來擴大裁判司法庭所提供的法律援助，以履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所規定的責任。

由於制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當局須檢討在香港各個法庭提供法律援助的先後次序。鑑於政府須抑制公共開支，以及履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11(2)(d)條所載責任，在裁判司法庭向沒有足夠能力延聘律師的人士免費提供律師，因此，政府決定優先擴大在裁判司法庭內、由香港律師會及大律師公會合辦的資助當值律師計劃。當局延遲實施法律援助（修訂）條例，便是為這個目的提供所需款項（3,000 萬元）。

財務委員會於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二日批准擴大當值律師計劃的服務範圍，這項措施於一九九一年十月十四日全面推行。至目前為止，市民對擴大服務範圍一事反應非常良好。這項措施使政府可以完全履行人權法案所規定的法定義務，於裁判司法庭聆訊的案件中，為有關人士提供律師代表辯護。預料這項措施每年將會額外惠及 17000 人。至於根據法律援助（修訂）條例放寬申請人經濟限額後，受惠人數估計為 1600 人。

當局將於獲得額外撥款後，立即實施法律援助（修訂）條例。當局並正在考慮是否可以分期推行該條例，使條例中的建議改善措施能及早實施。

破產管理官就破產人及清盤公司的財產收取的費用

二、 黃匡源議員問題的譯文：政府當局可否告知本局，破產管理官以何準則就委託其保管的破產人及清盤公司財產收取費用；以及在最近一年，當局所收取的費用，可彌補其在提供此類特定服務方面的成本至何種程度？

金融司答覆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破產管理官就委託其保管的破產人及清盤公司財產收取費用時所採取的準則，是破產管理官所提供服務的費用，應在合理情況下盡可能由使用這些服務的人士負擔。

根據破產條例第 128A 條的規定，倘破產管理官認為任何款項是超出債務人的資產中暫時需用來償還債項的，便須把多出的款項存入銀行，所得的利息，必須在每個財政年度完結時撥作政府一般收入。

根據公司條例第 285 條的規定，清盤公司的清盤人須將收到後六個月而仍未有人索取或仍未分配的款項，存入破產管理官保管的公司清盤帳內。

根據公司條例第 294 條的規定，對於清盤公司，倘破產管理官認為其以清盤人身分持有的一切款項，是超出清盤公司資產中暫時需用來償還債項的，便須把多出的款項存入銀行，所得利息，必須在每個財政年度完結時撥作政府一般收入。

倘監察委員會認為，或者在沒有監察委員會的情況下，清盤人認為，清盤公司帳目的貸存現金額，是超出該公司資產中暫時需用來償還債項，而數額在 10 萬元或以上，則須採用不同的安排。在此情況下，破產管理官須按照監察委員會的要求，或者在沒有監察委員會的情況下，按照清盤人的要求，將該筆餘額作為銀行存款投資。存款利息中，一筆相等於投資款額年息 1% 至 1.5%（或財政司所訂的其他利率）的數額，須付予破產管理官。在每個財政年度結束時，這項利息收入，亦須撥作政府一般收入。其餘利息則貸記入該公司的帳目內。

破產管理處在上個財政年度（一九九零至九一年度）的運作成本為 1.03 億元；撥作政府一般收入的銀行存款利息，總額為 2,550 萬元。因此，這項利息收入，已可應付該年度破產管理處運作成本的 25% 左右。

場外投注站

三、 吳明欽議員問：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1) 政府批准馬會設立場外投注站的現行政策，是以何種因素作為考慮準則；
- (2) 在過去 10 年，每年每區的場外投注站數目有多少；
- (3) 政府有否評估場外投注站的設立對抑制賭風及阻遏非法賭博的成效，若有的話，評估結果如何；及
- (4) 政府會否考慮採取更有效的政策，更有力地抑制賭風及阻遏非法賭博？

政務司答覆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在我答覆吳明欽議員的問題之前，我想應解釋一下政府有關賭博的政策。

政府對賭博的政策一向都是限制賭博的機會，但容許目前受管制的賭博活動存在，藉以壓抑非法賭博。實際上，這是指對非法賭博活動藉嚴厲的法例和執法行動加以限制，輔以提供受管制的代替活動，只要這類活動確屬需要。設立場外投注站是政府打擊非法賭博的其中一項主要武器。

每一項有關設立新場外投注站的申請，都會按個別情況加以考慮。在評估某一地點是否適當時，當局會考慮下列各項因素：

- (a) 政務專員對互助委員會、分區委員會、區議會以及其他地方社團所發表意見的評估；
- (b) 警方對區內的潛在或現存非法賭博活動的評估；
- (c) 警方就執法方面的角度對有關樓宇的適合性所作的評估，包括保安、進出問題、障礙及滋擾等問題；
- (d) 在可能範圍內，場外投注站一般應設於專作此用途的樓宇或商業大廈，包括商業／住宅樓宇的商用地方、地鐵車站商場或公共屋邨商場；及
- (e) 一般的指引是，盡可能使場外投注站與主要為青少年及兒童而設的社會服務設施、教育機構及康樂設施保持適當的距離。此外，場外投注站亦不應設於通往上述社會、教育及康樂設施的主要路線上。

過去 10 年，各區開設的場外投注站數目載於附件 1。

政府正在密切留意開設場外投注站所帶來的影響。第一間場外投注站於一九七四年四月開設。在此之前，外圍投注是最流行的一種非法賭博，賽馬與賽狗每年的總投注額估計超過 70 億元。行政局有鑑於此，遂於一九七三年十月批准場外投注合法化。自一九七四年以來，非法場外投注的情況已見減退，而與此有關並涉及高利貸和黑社會恐嚇等活動的社會問題，亦已減少。

從附件 1 附表所載，自一九八一年以來，場外投注站的總數未有顯著增加。不過，隨著人口遷入新市鎮，遠離市區，警方不時發現這些地區的非法賭博有所增加，但每有場外投注站設立後，非法賭博的現象便會再度減少。

現行賭博政策雖然有效，但並不表示政府便可以自滿。現仍不時發現新的賭博形式，政府在有需要時當採取步驟修改政策或修訂賭博條例，以確保警方具備所需權力對付一切形式的非法賭博。

政府最近曾於一九九〇年修訂賭博條例。該項修訂旨在大幅增加有關非法賭博罪項的處罰，以及收緊條例內的部分條款，使能更有效執行。條例經過修訂後，經營非法賭檔、從事外圍投注、經營非法彩票等的最高罰款額由 50 萬元增至 500 萬元。

附件 1

一九八二至一九九二年間場外投注站數目

地區	年份										
	1982/83	1983/84	1984/85	1985/86	1986/87	1987/88	1988/89	1989/90	1990/91	1991/92	
港島及九龍											
中西區	14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4
灣仔	8	9	9	9	9	9	9	9	9	9	9
東區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0	9	9
南區	5	5	5	5	5	5	5	5	5	5	5
油尖	11	10	10	10	10	9	9	9	9	8	8
旺角	15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深水埗	12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九龍城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黃大仙	7	7	7	7	8	8	8	8	8	8	8
觀塘	8	6	6	7	7	8	8	8	7	7	7
新界											
離島	2	2	2	2	2	2	2	2	2	2	2
西貢	1	1	1	1	1	1	1	2	2	2	2
北區	2	2	2	2	2	2	2	2	2	2	2
大埔	2	2	2	2	2	2	2	2	2	2	2
沙田	2	3	3	4	4	5	6	6	6	6	6
荃灣	5	5	5	5	5	4	4	4	4	4	4
葵青	4	4	5	6	6	6	6	6	6	6	6
屯門	2	3	3	3	3	3	3	3	3	3	3
元朗	3	3	5	5	5	5	5	5	5	5	5
總計	124	121	124	127	128	128	129	130	128	127	

政府部門專業人員的訓練及職業發展機會

四、 黃秉槐議員問題的譯文：政府當局可否告知本局，有何訓練及職業發展機會以培養政府部門高級專業人員擔任高層管理職位？

公務員事務司答覆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政府非常重視為公務員提供適當的訓練和職業前途發展機會，以備他們在政府機關內擔當更重要的職務。對於高級專業公務員，政府肯定會有適當的安排。政府為這類人員提供的訓練機會範圍廣泛，包括本地及海外的訓練，其中很多是屬於管理範疇的，是為協助公務員準備擔任更高層面的管理職位而特別設計。此外，有關專業人員的職業前途策劃亦有一套既定制度，其目的是鑑定那些具有擔負首長級職務潛質的人員，並為他們提供職位安排、訓練及接觸各種工作的機會，藉以協助他們發揮潛能。公務員事務科在諮詢各決策科及有關部門後，會為每個部門定期（通常按年）制訂及重新評估首長級職位繼任人選計劃。

至於訓練方面，公務員訓練處為各級公務員舉辦不同類型的長期及短期課程。特別為改進高級專業人員管理技巧而設的課程，內容都與管理發展、解決問題及決策、領導技巧及小組建立、人事管理及員工關係處理技巧、組織技能、表達技巧、處理工作壓力等有關。此外，該處亦提供資訊科技課程，包括個人電腦的使用、語文及通訊技巧。

公務員訓練處亦為各個部門提供支援及意見，以便進行內部培訓。該處設有資源及資料中心，為有意提高管理及其他方面知識的公務員提供閱讀材料。本年度該處已獲分配 2,630 萬元，用作內部培訓的開支，比一九八八至八九年度的 1,836 萬元有所增加。

高級公務員課程中心於一九八四年成立，為高級專業階層的公務員提供管理訓練，這些訓練都是為應付公務員的需要而特別設計的。該中心每年舉行兩次為期三個月的全日上課高級管理訓練課程，課程的目的在於擴闊公務員的視野，增加他們對政府運作的認識，以及改善他們的整體管理技巧。中心自成立以來，已有 500 名公務員因參與課程而受益，其中大部分為專業人員。本財政年度該中心獲分配 567 萬元作訓練之用。

政府亦資助公務員參加由本地及海外教育機構舉辦的課程，包括協助專業人員獲得最新專業知識的課程，以及有關管理的課程、研討會或會議。上一個財政年度，政府資助超過 9000 名公務員參與這類課程，其中有接近 450 人更有機會到海外受訓。

至於職業前途發展策劃方面，公務員事務科會向各部門索取首長級職位的繼任人選計劃書，然後加以審核。為培訓人員擔任更重要的管理職責，政府挑選有潛質的人員，在適當時候安排他們參加本地或海外的管理訓練課程。在職訓練亦是職業前途發展的一個要項，各部門會調派人員在內部或其他部門出任不同職位，盡量增廣公務員的見識。此外，由於高級專業人員一般是派駐部門工作，為了讓他們獲得在政府中央層面工作的經驗，公務員

事務科有一套既定安排，挑選適合的專業人員借調到布政司署的決策或資源科，以協助他們擴闊視野。

政府一貫的政策，是為高級專業人員及其他公務員提供訓練及發展職業前途的機會，以備日後在政府機關內擔當更重要的職務，從而確保政府能夠繼續為市民提供快捷而有效的服務。

無鉛汽油

五、 鄭慕智議員問題的譯文：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無鉛汽油最初在港推出時，有關方面為何不採用「98 辛烷值無鉛汽油」；
- (b) 關於提高含鉛汽油售價及為無鉛汽油訂出較低價格方面，政府與石油公司所達成的協議為何；
- (c) 有關協議的條款是否適用於「98 辛烷值無鉛汽油」所訂的價格；
- (c) 若否，政府將會採取何種措施以規管這方面的訂價，使當局對較低價格的規定亦同樣適用於「98 辛烷值無鉛汽油」？

規劃環境地政司答覆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有關方面在籌備推出無鉛汽油時，本港尚未即時有「98 辛烷值無鉛汽油」供應。因此，在最初推出無鉛汽油時不可能選用「98 辛烷值無鉛汽油」；加上「95 辛烷值無鉛汽油」是大部分國家所採用的主要燃油，而且日後也極可能被世界各地普遍採用，所以當時便推出了「95 辛烷值無鉛汽油」。現時全港的汽車當中，約有 77% 可採用「95 辛烷值無鉛汽油」而行走得頗為理想；此外，差不多所有新車的設計都是採用這種汽油並能行走暢順。因此，有關方面認為較宜在開始推出無鉛汽油時，選用一種在質素方面最能配合本港長期燃油要求的汽油。當局曾與石油公司進行磋商，而石油公司亦同意所供應的無鉛汽油質素應為「95 辛烷值」。

可以有效地使用「95 辛烷值無鉛汽油」的汽車，佔汽車總數的百分比不斷上升，這些汽車使用「98 辛烷值無鉛汽油」並無實質好處，反而要付較高的油價。至於為數較少且數目不斷下降的其他汽車，使用「95 辛烷值無鉛汽油」令動力減弱，改用「98 辛烷值無鉛汽油」可能會有幫助。

至於問題的(b)和(c)部分，石油公司與政府一向並無達成任何正式協議。不過，在快將推出無鉛汽油前政府和石油公司召開的會議上，彼此同意政府會在含鉛汽油和無鉛汽油之間，實施 0.45 元不會令政府增加收入的稅款差額，以鼓勵市民使用無鉛汽油，而石油公司則會對含鉛汽油多收 0.56 元的油價；兩項措施雙管齊下，使含鉛汽油比無鉛汽油

每公升貴 1.01 元。石油公司又答應，在收回為推出無鉛汽油所投資的全部成本後，便不會再對含鉛汽油多收取 0.56 元。由於在達成上述非正式協議時，雙方並沒有考慮到是否採用「98 辛烷值無鉛汽油」，因此，有關的條款並不適用於這種汽油。儘管如此，無鉛汽油與含鉛汽油之間的 0.45 元稅項差距，同樣適用於這兩種無鉛汽油。

至於問題的最後一部分，現時本港汽車使用無鉛汽油的比率約為 46%，政府對這種情況感到滿意。有跡象顯示，「98 辛烷值無鉛汽油」自推出以來，使用無鉛汽油的人數不斷增加。不過，政府會密切監察「98 辛烷值無鉛汽油」自推出以來所造成的影響，並會在日後檢討價格差距時，連同其他因素一併加以考慮。

重型貨車及混凝土貨車

六、 林貝聿嘉議員問題的譯文：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現時在本港道路上行駛的 24 噸以上重型車輛及各類型混凝土貨車的數目；在過去三年該等車輛引致的意外及傷亡數字；
- (b) 現時在本港道路上行駛的其他車輛數目；在同期該等車輛引致的意外及傷亡數字；
- (c) 是否有計劃對 24 噸以上重型車輛及各類型混凝土貨車施行特別車速管制？

運輸司答覆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現時，本港領有牌照的 24 噸以上貨車有 824 輛。該等貨車屬於重型貨車，而混凝土貨車則一般屬於中型貨車。在本港道路上行駛的領有牌照的混凝土貨車，則有 1212 輛。在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一年九月期間，涉及重型貨車及混凝土貨車的意外及所導致傷亡的統計資料，載於附件 B。

現時，本港除中型及重型貨車外，其他車輛有 374988 輛。有關這些車輛引致的意外及傷亡的統計資料，載於附件 B。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的規定，所有類別的車輛，如非另有規定，在任何道路上的時速限制一律是每小時 50 公里。在容許車速較快的高速公路，例如在吐露港公路，若干路段車速可高達每小時 100 公里，中型及重型貨車的最高車速限制是每小時 70 公里。

以現時的情況來說，我們認為目前的管制措施已經足夠。不過，我們仍會對情況繼續檢討。

附件 A

重型貨車

年份	意外數目	傷亡人數			合計
		死亡	重傷	輕傷	
一九八八	34	0	19	39	58
一九八九	44	2	18	56	76
一九九〇	79	5	19	87	111
一九九一 (一月至九月)	40	2	9	40	51

混凝土貨車

年份	意外數目	傷亡人數			合計
		死亡	重傷	輕傷	
一九八八	31	0	9	61	70
一九八九	41	2	14	41	57
一九九〇	33	2	9	34	45
一九九一 (一月至九月)	28	3	7	32	42

附件 B

重型車輛及混凝土貨車以外的其他車輛

年份	意外數目	傷亡人數			合計
		死亡	重傷	輕傷	
一九八八	16318	301	4825	17071	22197
一九八九	16214	346	4554	16697	21597
一九九〇	15255	321	3978	16050	20349
一九九一 (一月至九月)	11272	226	2905	11999	15130

將軍澳隧道

七、 劉華森議員問題的譯文：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為何將軍澳隧道並非如本港其他主要隧道一般，全日開放使用；
- (b) 是否有計劃把該隧道的開放時間延長至少到晚上十一時三十分始關閉，而非到現時的十時三十分，以方便附近一帶的居民？

運輸司答覆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將軍澳隧道於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九日開始通車，初期每日開放時間為 16 小時，由早上六時三十分起至晚上十時三十分止。

以一九九一年九月計，使用隧道的車輛每日平均有 11500 架次，大大低於原先設計的 80000 架次。

基於以下兩個原因，目前我們不打算延長隧道的開放時間。首先，即使在關閉時間內開放通車，但有可能在該段時間內使用隧道的車輛數目不多，仍未足以構成充分理由，令有關當局調派更多人手，以增援該隧道現時分兩班輪值工作的 66 名人員。其次，在隧道關閉時間內，車輛仍可採用經寶琳路的其他路線。

當局會不時檢討有關情況，如日後的需求情況證實有此需要，則會調整該隧道的開放時間。

超載貨車

八、 陳偉業議員問題的譯文：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1) 有何計劃對超載貨車進行檢查及檢控；
- (2) 有何措施及計劃以減低超載貨車所引起的交通意外；及
- (3) 政府會否在全港各主要道路及地方增設量度設施？

運輸司答覆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目前警方在全港各個不同地點設置共 18 個車輛測重站，檢查車輛有否超載，其中五個為固定車輛測重站，另外 13 個則為可攜帶的地磅。

此外，路政署亦在不同地點設置共五個動力橋秤，以蒐集有關超載程度的統計資料，作監管及策劃用途。

任何懷疑有超載的車輛均須在警方的車輛測重站接受檢查，並須卸下任何超重的貨物。當局會視乎超載程度，酌情向有關司機提出警告、處以定額罰款，或提出檢控。此外，若有充分的證據，當局亦會對有關車主採取執法行動。一九九〇年，警方一共在 33340 宗個案中採取執法行動。

至於問題的第二部分，為了加強行動對付超載的貨車，當局現正考慮實施若干項建議，包括提高定額罰款額、立例將個別車軸超載定為違例事項、將超載納入駕駛違例記分制附表所列的違例事項，以及規定車主對觸犯超載違例事項負更大責任。

關於問題的第三部分，當局已物色地點，以增設三個車輛測重站，這些地點分別位於柴灣近港島東區走廊、大欖涌近屯門公路，以及西九龍填海區近日後建成的西九龍高速公路。如果獲得資源，預計有關設施可在未來數年間分期設置。

路口的安全

九、 陳偉業議員問題的譯文：政府可否告知本局，在策劃道路時，如何確保路口設計的安全；及用何準則來衡量其安全程度？

運輸司答覆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車輛及行人往來安全，是設計路口的首要考慮因素。每一設計均會顧及道路類型、預計的行車量、行人需要以及視程等，而所採取的標準均符合最佳的國際慣例。

當局會根據行車模式的轉變以及交通意外的分析，經常檢討路口的安全情況，並會根據檢討所得，以及市民包括區議會所提出的意見，按需要作出改善。

遣返再度來港者

十、 范徐麗泰議員問題的譯文：有關與越南政府就再度來港者遣返事宜達成的協議，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當局目前採用何種程序，從新近抵港的越南船民中識別再度來港者；及
- (b) 當局對現行程序是否滿意；若否，當局會否考慮對現行程序作出改善？

保安司答覆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當局設有既定程序，查察及識別所謂再度來港者。首先，人民入境事務處設有中央登記冊，記錄所有非法進入香港的越南船民的詳細資料（包括相片）。中央登記冊定期作出修訂，以顯示越南船民人數的最新變化，包括那些已被遣返越南的人士的詳細資料。

其次，所有越南船民在青洲登岸時，均須接受人民入境事務處及懲教署人員多次面見，這些人員經驗豐富，可透過仔細查問，識別再度來港者。

在這些面見過程當中，不少再度來港者是自己承認、或由其他越南船民的揭發或接見人員的查察而識別出來的。假如接見人員對任何越南船民的身分有疑問，便會深入追查紀錄，以確定某名越南船民是否先前透過自願遣返計劃被遣回越南。

政府認為現行程序能有效地識別及察覺再度來港者。政府承認一小撮越南人可能使用不同或虛構的名字而不被察覺。不過，我們相信他們會在其後的甄別程序中被識別出來。

議員動議

致謝動議

李鵬飛議員提出以下動議：

「本局對總督的致辭，謹表謝意。」

李鵬飛議員致辭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現謹動議本局就總督提交施政報告致謝，有關的動議以本人名義提出，載於議事程序表內。

首先，我謹恭賀副主席先生獲總督委任主持立法局大部份的會議。副主席先生的委任及新一屆立法局的組成，正好反映本港政局的演變。相信本局議員均期望與副主席先生一起工作，為香港締造更美好的前景。

今午，由於時間所限，我只會談論我認為對香港的長遠發展至為重要而且影響深遠的兩個問題，即憲制發展與中港關係。

憲制發展

總督在施政報告中提到本局與政府當局之間在工作上的夥伴關係。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訊息，問題是如何付諸實行。有一句古老的話說：探戈需要二人共舞。我相信政府已明白

到政治形勢正在轉變，政府推行政策，是需要立法局的合作和支持，因此，政府與立法局之間必須建立妥善的溝通渠道。兩者的夥伴關係必須建立於互相合作和尊重的基礎上。我明白說易行難的道理，但我認為我們必須努力建立這個基礎。我謹呼籲本局全體議員及官方成員為香港的利益共同努力。我們必須找出合作的方法；假若失敗，便要尋求其他可行辦法，使香港事務得以順利運作。總督表示政府當局會為議員提供一切所需的資料和說明，並會以積極的態度回應本局全體議員的建議和批評，令我感到鼓舞。此際，我想談論一下行政局的運作及行政立法兩局之間的關係。大家都知道行政局是制訂政策的組織，然而，對於行政局如何實際運作，本局議員和市民，似乎所知不多。我出任行政局議員已有六年多，當然深明政策釐定的過程及原因。一旦行政局通過一項決定，便會向公眾公布，曾參與決策的行政局議員，自然須對其決定負責及有責任向立法局議員及市民解釋作出該項決定的原因，並尋求立法局議員的支持。因此，我深信行政局與立法局之間的聯繫是極為重要的。這當然亦是另一種工作上的夥伴關係。本局一些議員也許不信任這個制度。我曾在兩個議會工作多年，我可以由衷地說，一直以來，現行制度對香港貢獻甚大。我知道時代已變，亦同意須因應新形勢而不斷前進。但我不贊成為變而變，因為倘若我們未能全面顧及香港的獨特形勢及政治制度，日後可能會後悔。我懇請本局議員在檢討立法局的工作時，慎重考慮這點。

與中國的關係

總督說中英兩國政府在正式的層面上有頻密的接觸，又強調本港必須重視與中國官員建立融洽和有效的夥伴關係。相信大家都同意，這樣做對香港前途非常重要。事實上，這些接觸應是越多越好。可惜本局議員未能與中國政府直接接觸，委實令人失望。多年來，我不斷嘗試與中國政府建立溝通渠道，但未能成功。我雖感失望，卻並不氣餒。我明白本局與中國建立工作上夥伴關係的重要性，亦深信對中國採取對抗態度絕無好處。因此，我們必須尋求與中國達致互諒的途徑。要做到這點，我們必須採取開明和坦誠的態度，並樂於在有需要時解釋我們的不同觀點。正如我以前說過，如我們要取得中國政府的諒解和信任，就必須對他們加以諒解和信任。這並非單方面的問題。我想請問各位立法局議員：大家可希望與中國建立真誠而互相信賴的關係？抑或是對抗的敵對關係？怎樣才是最有利於香港？我謹此促請中國政府，特別是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的官員與本局議員對話。為此，我已親自去函魯平主任，試圖說服他與立法局建立溝通渠道。倘若失敗，亦絕非因我未盡力所致。現時，香港是中國的最大投資者，中港兩地經濟關係非常密切，我寄望兩地政治關係亦有同樣理想的發展。這是我的目標，希望本局議員支持我。

副主席先生，有關經濟、教育、環境、交通、房屋、社會服務、保安及其他影響民生的問題，我亦非常關注，當會留待其他場合再予討論。在這次的辯論中，若我能令各位議員思考一下以上兩個問題，已算得上是很大的收穫。我深信在這次辯論中，會有不少批評政府的言論。希望各位官方議員細心聆聽。為著建立總督所說的工作夥伴關係，各位政府人員必須勇於面對批評，而我相信在這兩天內，各位將會聽到各種不同的聲音。

副主席先生，我謹此提出動議。

副主席（譯文）：未開始今次辯論前，我請各議員注意，會議常規第 27(5)條限制議員發言時間不得超過 15 分鐘，但提出動議的議員或當然議員不受此限。我的桌子上已經安裝了計時器，當議員發言滿 13 分鐘後，計時器便會發出間歇的聲響，表示時間還有兩分鐘。當 15 分鐘的時限已到，計時器便會再次響鬧，但發出的是連續的聲響。根據會議常規，我只可以在非常例外的情況下延長發言時限。因此，希望發言的議員在聽到計時器第二次響鬧後，盡快就座，如確實有需要，亦請在幾秒鐘內完成發言。我建議在四時四十五分左右小休約 15 分鐘用茶，到七時十五分左右小休約 30 分鐘吃晚飯。

動議經向本局提出。

張鑑泉議員致辭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在這次辯論之前，已有很多人對總督的施政報告發表意見，其中不乏對報告中未有就關乎本港民生的事務提出明確政策方針而表失望者。然而，我認為總督在施政報告重點剖析本港面對的兩大問題 — 與中國的關係和憲制發展，是正確的做法。

與中國的關係

過去 40 年來，中國與香港的制度、生活方式及價值觀的發展，均大異其趣。香港人憂慮九七轉移主權後何去何從，是絕對可理解的。然而，無論得償所願的機會有多大，每一個香港人定必冀望日後能夠保留固有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正由於中國與香港有別，我們更需與其緊密合作，以促進雙方的了解。總督告訴我們，急需在各層面與中國建立融洽和有效的夥伴關係，以便到了一九九七年，可順利和成功地移交主權。我們應該認真聽取這項忠告，那些立志成為香港明日領袖者尤應如此。

副主席先生，改善中港關係，並非為了政治上的方便，此際更已成為經濟上所必須。過去 10 年，香港繼續欣欣向榮，這主要因為我們與中國近在咫尺，充分得享中國經濟改革與開放政策之利。鑑於世界經濟極可能進入一段漫長的緩長期，本港經濟發展如欲再創高峰，則極需靠賴中國繼續實行經濟改革所提供的貿易機會。我相信不少本地及國際工商業家均有同感。因此，當我聽到本港一些政治領袖公然反對與中國改善關係時，不禁為之愕然，不知他們是否過分專注於其政治意識形態，以致不能認清現實。

憲制發展

現在我轉談香港的新憲制架構。立法局引進直選議席，是香港憲制演變過程中一大進展，對此我毫不懷疑，但這項發展絕不應影響到本局的主要功能，即為香港市民服務和確保政府行使權力得當。

然而，立法局不應因為有了直選議員而令其他議員所作貢獻的重要性降低。有人想按議員進身立法局的途徑將他們分類，這種傾向可以對立法局的運作和議員間的關係產生反效。

果。本局議員均竭力達致一個共同目標，就是以香港市民的利益為依歸。我深信各位議員均同意，在未來關鍵性的四年內，惟有我們齊心協力，本局才能暢順運作。

以下我想談談一些必須立刻正視的問題。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身為貿易發展局的成員，對於擴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一事毫無進展，貿易發展局同寅和我咸表失望。發展局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首次向政府提出此項建議，由於此計劃是一九八九年施政報告所述宏圖大計的一環，故已獲總督批准。

經過兩年時間，八九年的宏圖大計已逐漸淡出，似乎會像鄧蓮如勳爵最近所言，因政府「慣性怠慢的辦事方式」而消失，但與此同時，本港會議展覽中心的卓越成就，國際同業皆有目共睹，因此亞太區內各大城市均紛紛興建或擴建此類設施，如香港仍坐視不理，便會喪失經濟上相對於曼谷及新加坡等地所佔的競爭優勢。因此，我促請政府擺脫其「慣性」陋習，批准立即擴建會議展覽中心。畢竟，貿易發展局並未冀望政府就此項工程提供任何財政援助，發展局所需者，不外是獲得政府批准動工而已。

通貨膨脹

總督指出通脹仍是一項備受關注的問題，可謂一語中的。他並警告說，如果本港不克克服一些窒礙經濟增長的因素，特別是某些行業嚴重缺乏勞工的問題，則通脹會持續企於過高水平，這是項真正的危險。當局已建議並實行有限度輸入外地勞工，從而解決部分問題，但即使僅採用這個局部解決辦法，亦已引致本港勞動人口強烈的反對。

總督曾談及政府對本港勞動人口的責任，在輸入外地勞工時保障本港工人的利益，以及在他們的健康與安全、僱用條件和賠償方面，提供法律保障。儘管如此，政府顯然仍忽略了一項早已應該履行的重要職責，就是重新訓練本港的勞動人口。

香港經濟的轉型，基本上已在預料之中，但政府卻未有主動作策略性的規劃，利用預知改變之利，重新訓練本港工人。本港目前所面對痛苦的現實，就是只能增加輸入外地勞工作為緩解通脹壓力的短期解決辦法，而在港口及機場發展計劃工程動工後，這些措施會顯得更急不容緩。然而，這些措施必須從更廣闊的角度，就是讓經濟與勞動人口作均衡增長的長遠策略上，加以考慮。這個必須由政府負責發展的策略，應包括訂有重新訓練本港工人，以及改善一些製造業的計劃；另一方面，實施拙劣的臨時措施，只會使問題更為嚴重，延長困難的時期。

住宅樓宇價格暴漲問題

本年住宅樓宇價格急升，令人矚目，亦引起了市民的關注：不僅因為此情況會帶來通脹壓力上升的心理陰影，更因為真正有意置業人士無力自置樓宇所受的挫折，可能會引致社會不安。目前住宅樓價所處的水平，甚至與所謂的中上收入階層的負擔能力脫節。以一個

面積 500 平方呎的單位為例，按市價每平方呎 3,000 元計算，很多年輕夫婦即使月入 30,000 元，亦難以負擔。辛勤工作，期望儲蓄置業的人士，到頭來發覺他們竟無力購置物業，難免會十分沮喪。

解決目前樓價急升的一項辦法，是由政府檢討註冊總署署長簽發同意書的程序，俾便迅速增加樓宇供應，以應付物業市場的需求；政府應考慮成立有各政府部門參與的中央委員會，以便更有效地處理申請及改進批准住宅樓宇興建的程序，使工作完成得更快捷順利。其次，政府應著手與土地委員會談判，撥出更多土地作建屋用途；第三，應訂立計劃，為那些真正首次置業的人士提供優惠待遇。各政府部門保存大量統計資料，如要訂立保障真正置業人士的計劃，我認為絕無困難。

治安情況

本港的治安愈來愈差，最近已成為街頭巷尾的熱門話題，根據警方最新發表的數字，在本年第三季度，涉及使用槍械的劫案大幅增加。

總督在發表施政報告時，對於近日暴力罪行的增加感到不安，並聲言確實值得關注，他並提醒我們，在過去五年來，涉及槍械或仿製槍械的劫案增加了三倍之多。

政府當局已向議員保證絕不會容忍這些罪行，並會堅決採取措施加以預防。各位議員定當同意，本港擁有世上最佳的警隊之一，其處理罪案的卓越能力並無下降。

然而我們所關注的，並非警方處理罪案的能力，而是驅使人們干犯這些嚴重罪行的社會因素：究竟是與臨近一九九七有關，抑或是通脹長期高企所產生的壓力使然呢？有些人也許將持械行劫案的增加歸咎於非法移民，但事實是否確然如此，抑或這只是掩飾本港內部社會問題的方便藉口呢？

在遇到困難需要解決時，人們往往會捨難取易，這是可理解的，但作為盡責的立法局議員，我相信我們有責任針對每項問題的根源，對症下藥。至於獲得多大成果，則在很大程度上視乎政府是否主動進取和態度堅決。

副主席先生，我們如要面對來年的挑戰，單憑政府當局的承諾，甚至我們作為立法局議員的承諾，並不足夠，還需具備其他條件，其中一項乃獲得保障 — 抗拒暴力和困厄的保障，以及置業安居的保障。

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周梁淑怡議員致辭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總督在其施政報告內表示香港現正經歷重大轉變，而這些轉變可能塑造本港未來的發展。總督並指出未來發展的成敗有賴我們如何「應付」這些轉變。

我在此嘗試探討這些轉變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對香港人的心理及想法可能造成的衝擊，並就如何可「應付」未來所面對的難題及挑戰冒昧提出一些個人意見。

倘若只集中研究在施政報告所強調的三項重要工作範疇，我們可能會將這些問題分開進行探討，並將其視為唯一需要專心處理及加以注視的考慮因素，因而忽視三者之間的重要關係，或忽略其他同樣重要的因素，而這些因素可能有助我們訂定過渡時期的處事取向或可能造成掣肘。

很多人批評施政報告過於空泛，缺乏遠見，欠缺堅定立場，亦未能發揮指導作用，不少市民期望政府會提出的明確及具體建議亦付厥如。

施政報告在方式上的轉變，相信某程度上是因為不适宜在施政報告內作出鉅細無遺的闡述，儘管我接受這個理由，但卻感到報告書的語調頗為消極，對現時並不樂觀的情況採取逆來順受的態度。

任何一個政府均甚少如此詳盡地解釋其權力受到動搖後所引致的結果，然後將維持政府有效運作的重任放在一個現仍未存在的夥伴關係之上，但我們不能貿然認為只需建立這種關係便能達致目的，因為成功的夥伴關係最少應建立在共同目標之上，為同一理想而努力。本局多位議員今午已就其不同的背景及所代表的選舉組別提出不少主張及意見，然而，觀乎多位議員，特別是直選議員所縷述的意見，他們普遍將其在立法局擔當的主要角色視為代表其選民監察政府當局的運作，將公共服務的使用者和消費者與提供服務的政府部門劃清界線，因而導致利益衝突，這種情況對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成功夥伴關係毫無裨助。

立法局在架構及運作上的轉變可能帶來另一個影響，就是令到公務員士氣低落。儘管公務員不時被指摘官僚作風及獨斷獨行，但他們為香港提供良好，甚至非常優良的服務，從而為香港建立完善的制度，使本港各行各業蓬勃發展，市民亦得以享有很大的自由。儘管日漸開明的制度帶來不少優勢，但亦有不少人埋怨高層公務員越來越不願意作出決定。俗語有云：「唔做唔錯」。這種惰性普遍存在於任何清廉的大規模政府之中，這種風氣仍會持續下去。被政府官員視為反對派的人士，倘再對其施加更大的壓力，只會給予他們藉口，減弱管治香港的誠意。

由於權力的轉移及帶來的影響，我們發現政府所側重的範疇已有所改變。政客們已嶄露頭角。現時更着重形式和表現的方式。大家只須留意高層官員在遊說工作上所花的時間及付出的努力，以及他們將「傳媒關係」提升為其首要的工作項目，便察覺到政府官員一如政客般重視公關工作。事實上，可靠的資料顯示，除香港民主同盟外，沒有其他政治團體或個別人士比政府當局舉行更多正式或非正式的新聞簡報會。

因此，透過身兼行政立法兩局的議員以加強立法局與政府當局之間的聯繫實是合理和合宜之舉。這種關係在香港運作良好，對本港政制發展亦是舉足輕重。

很久以前，政府採取一套由上而下的方式釐定政策。然而，假若市民的意見及意願未獲充分考慮，政府承擔的此項重大責任亦未必會獲市民欣然接納及嘉許，此情況日見明顯。基於這個因素，政府成立一個龐大的諮詢委員會架構。今時今日，隨着本港代議政制的發展，就我所知，政府已重新考慮這些諮詢委員會所承擔的職責，現時，這些諮詢委員會並非如以往般就政治及技術上提供意見，而是扮演專家及技術專家的角色，為政府提供服務，使其得以從多個角度深入研究各事項和問題，至於政治方面的問題則由政客來評論。設立諮詢委員會是基本政策上的一個轉變，印象中政府並未有就此發表過任何聲明或作過任何解釋。這個疏忽可能曾導致有人懷疑政府當局企圖施行「分化管治」的手段，要消弭這些疑慮實是輕而易舉，只要政府能與外界分享所掌握的資料及蒐集的意見，至為重要的是，政府亦應同時向有非政府人員出任成員的有關委員會徵詢意見。

現時很多事情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憲制的形式。行政局須就重要政策作出決定前聽取立法局的意見，這是必然亦屬必要的程序。由於制訂政策措施純屬政府當局的職權和職責，故當有關司級官員向行政局建議某項政策時，行政局經過詳細研究和深思熟慮後，即使被認為已對有關建議採取某種立場，亦屬合理。立法局中非政府人員的議員從市民利益的角度研究有關的建議，透過贊成、反對或修訂該等建議等程序向政府當局提出批評意見，擔當顧問性質的角色，從而平衡支持有關措施的勢力，同時亦維持政府有效的運作。議員運用此項極為重要的權力時，倘要保持行政局作為一個架構的健全運作，議員必須就集體作出的決定承擔責任。

不少人曾就港同盟人士拒絕進入行政局作出評論。部分人士批評總督並無委任任何港同盟成員進入行政局。我個人無法接納港同盟所給予的理由，認為倘要他們遵守集體負責制度，將會影響他們在一九九五年選舉中獲選的機會。除非假設香港人已不再信任行政局或民選議員，此項論據始能成立。儘管我同意一點，政府及行政局所作的決定有時會引起市民的質疑甚至疑慮，但大體上仍獲得市民的信任和支持。對於本局的民選議員將其政治生涯放在參與決策的必要工作之上，而後者實是他們服務香港須履行的基本責任，我感到極為可惜。

不僅是不願意承擔上述責任，他們實際上是鼓吹徹底分割行政立法兩局的關係。這種政制上的重大改變將導致對抗局面，這種局面所造成的壓力可能引起意見紛紛及嚴厲的抨擊，對決策的進度卻未必造成有利的影響，反而很可能會削弱本港官員已形薄弱的管治誠意。然而，我會對此問題採取開明的態度，而此問題亦急需進行研究和辯論。

我們須不時提醒自己，推行政制發展尤如行走於鋼線之上，鑑於香港未來須接受的獨有安排，我們並沒有太多政治空間可以走動，故必須小心翼翼才可避免從鋼線掉下來，我們或想儘速推行政制發展，但稍為行差踏錯，便足以致命，故絕不能掉以輕心。我們不應獨斷獨行，香港的未來維繫在這個重心機構之上，我們必須團結一致，均衡發展，才能達致目的。

然而，現有不少勢力正好與這種團結精神背道而馳。由於出現各種不明朗的因素，局內同僚之間採取互不信任的態度，並認為每件事情的背後必然隱藏着不良動機，任何承諾均存在着陰謀。這種猜疑將事情過分簡化，導致出現不公平及不真實的現象。對於所謂「民主派人士」所使用的某些手段，使被扣上親中派帽子的候選人的信譽蒙受質疑，我大感詫異。但令我更為震驚的是，選民亦被這些手段所蒙蔽。試從北京政府的立場來看，難怪他們會將九月直選視為一場反中，反北京的運動，亦無怪乎北京不肯承認立法局的地位。部分政治領袖如此不遺餘力，甚至採用可算是野蠻的手段打擊親中派候選人，藉以削弱他們加入立法局的機會，當他們侃侃而談，力言必須與中國保持聯繫之際，其誠意定必受到質疑。

恐怕北京領導層對立法局的成見必已加深，這對解決香港與北京之間的分歧造成阻礙。然而，鑑於大勢所趨，本局議員必須重新努力，消弭彼此的障礙，得以互相溝通和體諒。希望中方亦會認同有此必要，因為這些障礙倘得以消除，對中港雙方均屬有利，短期而言，亦有助於香港的順利過渡。

我上週日出席由城市理工學院舉辦的一九九一年香港政治與選舉研討會。除了有多位著名的社會及政治家和學者提供不少寶貴資料及分析外，我還感到席間多次帶出一個訊息，就是香港市民對政局所產生的矛盾心情，這更證實我從本身經驗及與別人接觸時所得的結論是正確的。我希望中方可承認及面對這個問題，並加以解決，而不是坐視不理，或是加以壓抑和抵制。

隨着一九九七年日漸迫近，市民的心情亦日益矛盾。香港曾獲承諾可透過一國兩制的構想享有高度自治。中國在六四事件之前所享有的良好聲譽現已大為下降。中方的強硬態度及其公開的立場已顯示她堅決對本港市民的憂慮不聞不問，更遑論將之解決，中方與英方商討有關香港前途問題時堅持將香港人摒諸門外，使港人把中方視為與其對立的一方。儘管如此，亦儘管我們對於日後如何管治香港或會意見紛紜，本港市民認同並接納香港與中方在民族、社會及文化上的連繫，以及一九九七的實際問題。我們接納將基本法作為政制發展的基礎，但由於一國兩制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嶄新構想。我們希望，只要不危及香港長遠的整體利益，中方可根據本港市民的意願和期望對基本法作出合理的修改。

本港市民亦是基於這種精神就有關終審法院表達意見。現時追問制訂該方案時何處出錯已是於事無補，但必須承認有關方案並不妥善。現時進行修改仍為時未晚。這樣不僅可令本港市民，甚至日後選擇在香港定居及經營業務的所有人士亦會信心大增。

由現在直至一九九七年，中英政府大概仍有不少涉及香港前途的問題需要討論，把香港摒諸門外，實屬錯誤，亦有欠公允。

范徐麗泰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今年的施政報告裡，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夥伴關係」一詞。在論及本局和政府的關係時，這句話出現了四次；講到中港關係時，又出現了兩次。總督不惜反覆強調「夥伴關係」，看來他深信這種關係的建立乃是本港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我基本上同意這種看法。不過，若果真的希望有成功的夥伴關係，雙方首先要有誠意，願意去了解對方的處境，用客觀理性的態度，有商有量地一起去尋求最好的做法；互相之間，要有一定程度的信任，至少相信對方和自己有共同的目標，這個夥伴關係才能維持下去。如果一開始就先入為主，對某人某事有成見，帶着有色眼光去看人，或是只顧自己的權益，或是故意醜化對方來提高自己的聲望，那麼，就算是夥伴，這關係也是極之牽強，亦是註定「失敗」的。如果這「失敗」止於個人，或個別團體、政黨，這還是無所謂，還可以忍受的。但若果這個「失敗」的代價是要全港市民代為支付的，這個代價未免太大了，而香港市民亦實在太無辜了。

作為本局的一員，我有責任為市民去尋求最實際、最可行的「夥伴關係」。我相信本局同僚、政府官員，亦應有同感。我更希望對中港關係有影響力的人士、中國的官員和領導人，也會有同感。大家放棄成見，不受權力、利益、面子所困惑，避免將事件政治化，認真考慮實際的情況，衷誠地合力去尋求合理務實的方式。

副主席先生，總督希望建立有效的夥伴關係，方向是正確的，但這道路卻並不平坦。夥伴之間，觀點與角度難免有所不同，意識形態亦不一定相同。所以，互相之間有所爭論，是必然的事。市民無需為此過於擔憂。以今日的辯論為例，雖然我未有看過各位的演辭，但我相信一定有不少同僚會對政府政策大加批評，對於如何應付通脹、炒樓、治安等等問題，同僚亦會認為政府無良策應付，所以會多方責難。但這一切，其實不過是民主國家議會內的家常便飯，並不一定表示議員對政府的政策全部否定，而是表示議員對公眾的交代及表態，同時想用這機會向政府施壓力。市民對這種關係的體會，至為重要，否則極容易引起錯覺。令市民能有進一步的理解，我想除了我們大家努力之外，亦有賴傳播媒介的協助。

回顧過去幾年的政績，我感到用在政治方面的時間極多，相形之下，民生方面的問題，備受忽略。例如，治安的問題日益嚴重、劫案直線上升、黑社會行為令人側目、走私活動猖獗、警隊士氣低落，人手不足。雖然官方多方解釋，保安司及警務處處長更引用統計數字，證明本港治安好，但市民的憂心並未因此稍減。終於在多方面的督促下，警方展開了一些成功打擊罪犯的行動。但犯罪份子明目張膽挑戰治安當局的事件，還不斷發生。警隊對付不法份子，是需要司法者、立法者、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而警隊的管理階層亦應要善用人手，提高士氣。如果治安上需要，對增加資源、加強警權，我相信市民和議員都會毫不猶疑地加以支持。但對由於管理不善而導致的資源浪費，或濫用警權，我相信大家是不會容忍的。我歡迎總督對打擊罪案的決心，而我亦希望這決心除了講之外，亦由貫徹的行動來證實。我更期望保安司和警務處處長能真正視本局議員為「夥伴」，以坦誠合作的態度，和我們攜手合力加強治安，保障安定。

有了安定，還需要繁榮。繁榮不能限於一小撮人，而是要社會上各階層人士都能得益。在製造財富的過程中，除了財經界、服務行業的發展外，我們不能忽視工業對生產總值的重要性。由於中國大陸的人工和地價都較低，不少本港廠家已經移師北上。這對中國和本港都有好處，這也表示本港工業已在轉型。對於工業未來發展的方向，政府和工業界已有共識。工業署在今年五月所完成的一項調查，清晰地反映出本港工業要走高科技及自動化的路線。這類工業需要低密度的廠房，而廠房內要有比例較大的辦公室。現行的官地拍賣政策，使工業用地也是價高者得。平均售價10倍於政府所支出的開發成本。高科技的工業多數是機械先進、投資量大，再加上現在香港的廠地昂貴，令不少高科技投資者為之卻步。如果當局還希望本港擁有一個有規模的工業界，實在應有一套發展工業的全盤策略，不能再說什麼「積極不干預」政策，作為藉口、推搪。事實上，港府預備成立工業技術發展局，讓該局有權撥款去資助工業研究和發展，是絕對正確及有必要的做法。但我覺得港府卻未能完全擺脫「不干預」的心態，因此失去了進取性。我認為港府應該採用「主動進取」的工業政策，將本港不足之處，加以發展，將本來已存在的各項服務連貫起來，配合全面策略，鼓勵工業投資，推動及協助工業轉型。

要工業成功地轉向高科技，技術人員及專業人才不可缺少。這帶出了訓練和教育的需要。在工業轉型的過程中，現有的工人應有機會受訓。這方面的資源，應該由政府和工業界這對「夥伴」一起提供。受訓後的工人，工作能力和範圍都已提高，故此薪酬應相應提高。

在教育方面，資源不足是最大的問題。大專院校學位課程的擴展，雖然是應時而生，卻令有限的教育經費，負荷極重。這個擔子在未來的三年內，會更加重。因此，在中小學內的改進，即使已經有了政策，也要受資源的限制。而尚在商討中的問題，例如師資培訓，更不知何時可以實現。但是大家可曾想過，若是中小學的師資人才流失，又吸引不到有質素的新人入行，對中小學生的質素有何影響？對大專院校的新生質素有何影響？對新一代的專業人才的質素又有何影響？摩天大廈頂樓的圖則美輪美奐，但下面若出了問題，頂樓的藍圖又如何實現？要確保教育質素，善用資源，開源節流，是必然的路向。今日我提出這個問題，是希望財政司在明年的財政預算中，對教育的需要，多加關注。教育是社會的投資，是經濟繁榮的基礎，希望不要忽略。

副主席先生，你的鐘還未響，但是我看到這會議室裡，兩邊都有一個電子格，標示時限。我並不明白，為何我們不可以使用？因為這樣我可以知道我這篇講辭應該讀快些或慢些，但現在這樣做，要是給你的鐘叮一聲時，大家的心便一跳，所以我希望副主席先生，可否請求立法局秘書去看一看那個格是有什麼用途？

副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許賢發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今年總督施政報告雖然是以內容簡潔及行文流暢見稱；但作為政府一年一度的施政報告，應該以具體勾劃政府為配合社會未來發展需要而實施的政策，作為首要的任

務。可惜，施政報告除了在本局與行政部門及中港關係方面，強調「夥伴關係」的重要性外，在其他有關經濟和民生方面都缺乏一個方向感，令人無法從報告中領悟得到：究竟政府如何帶領本港這個社會邁向下個世紀的繁榮安定？難怪一般輿論都認為，這份施政報告反映出「夕陽政府」無意為本港的未來作出長遠的承擔。對日漸感到無奈和無助的市民而言，整份報告沒有帶來任何令人振奮的消息。

事實上，這是講求承擔和信心的年代，香港將要面對的難題，不只限於憲法和政制上的急速變化，許多對外及內部問題都亟待政府提出長遠的解決辦法。本人甚至認為，透過賢明的施政，令市民感受到政府是與市民一起奮鬥，克服時下的艱苦，並且不斷為他們的下一代創造更佳的生活條件，比提出空泛的諾言甚至興建機場，更具加強港人留港的決心。這是本人對施政報告的基本上要求，但結果當然是失望的。基於時間所限，本人今日只集中談論政府對待社會福利問題的不切實際態度，和提出可行的解決辦法。

首先，本人想澄清一個誤解，就是一般人以為，既然政府已制訂這個「跨越九十年代社會福利白皮書」，則九十年代的福利發展應該已有基本藍圖，而從事這類服務的專業社工應該心滿意足。這是錯誤的想法，其實社工界一直擔心，就是為了增加庫房收入應付未來龐大基建開支，以及打擊通脹而壓抑公營部門的開支增長，政府會否放棄過去對福利界所作出的承擔，尤其是在財政方面。

為了證明本人的擔憂並非毫無根據，早在施政報告發表之前，本人已特意要求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秘書，提供一份統計資料。結果顯示，獲該委員會通過的政策或計劃當中，因缺乏資金而無法執行的項目，在本財政年度一共有五項，所需資金不過大約1,000萬餘元；但到九四至九五年度，可能無法執行的項目增至19個，而所需要經費就攀升到2億2,800餘萬元。換言之，拖延只會增加解決問題的難度。

各位同僚或許知道，一項政策或計劃能夠獲得撥款委員會通過並非易事；而且為應付社會新需求而制訂的政策，本身已經有一定的逼切性，再等到政府有資金執行時候，可能已是明日黃花，屆時又替政府提供一個不願意執行的藉口。因為這樣，本人要嚴厲質問政府：究竟有沒有誠意推行「保赤安貧」的福利計劃和投資？！如果沒有的就乾脆說沒有，何必一方面不斷向社會人士編織「美麗的承諾」；另一方面卻努力找尋推卸的藉口！

社會福利界從來都不敢要求削減學位、病床數目或建屋量，來增加福利服務的經費，因為明知在政府和眾人的眼裏，社會福利無論在重要性和資源分配方面，都在教育、醫療和房屋之後。在形勢比人強之下，本人不作奢望，只要求政府修改六合彩彩票的分配方法，令到指定用於福利範疇的政府獎券基金，能夠增多一點收入。但政府在這幾年來庫房有盈餘下，卻暗中將撥入獎券基金的比率，由早期的5.75%，降至八五年的1.5%。經過多番爭取，才增加至八七年開始的3.5%水平；但比原來的數字仍有段距離。政府的做法就仿如在乞丐砵中討飯吃一樣。

目前六合彩彩票的分配方法是：獎金佔59%，政府抽取的獎券稅達到三成，經馬會抽去7.5%的佣金後，只剩下3.5個百分點撥入獎券基金內。事實上，要靠六合彩這類

博彩收益來維持福利服務的部分經費，已經可以說我們的政府應自覺慚愧，因而寬大處理利益分配，令六合彩這個真正具有慈善性質的工作能夠表達真正的意義。

更令人感到憤慨的，就是政府當年借意拖延基金撥款來隱瞞公眾，說是由於機構的申請不多，故基金出現盈餘。但事實勝於狡辯，根據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指出，經修訂預算後，該基金在去年度有 6,400 萬元赤字，而估計本年度的赤字亦會高達 1 億 700 萬元。

政府的手段不但可以說是瞞騙公眾，更可說是浪費社會資源。一間志願機構在五年前因經費不足，向基金申請所欠缺的 35 萬元，希望可以進行一個已獲社會署認可的計劃；但一直未獲批准。拖延到今日仍然是未能解決；但由於通脹的影響，所需的費用就由原來的 85 萬元增至現在的 300 萬元。其實，類似這樣浪費資源的個案可以說得是非常多，本人希望有關當局能切實檢討及改善現行志願機構的撥款程序。

另一方面，本人更希望政府認真考慮本人在本年三月，在本局辯論財政預算案時所提出的改善建議，即是政府和馬會在六合彩所佔得益，分別減少五個和 1.5 個百分點，令撥歸福利用途的比率增至一成。其中的一半可以沿用現行方式，作為福利服務的非經常性投資項目；將另一半儲蓄起來，再利用基金滾存得來的利息，作為已獲社署認同的改善服務經費。本人相信，這個做法比較獎券基金管理局藉擴大六合彩銷售網來增加基金收入的試驗計劃，更加實際效用；何況這樣做沒有附帶任何「社會代價」，便可以使福利服務得到穩定的經費支持。副主席先生，你既然是政府獎券基金的主席，一定明白這個過程和需要。

最後本人重申一點：本港的社會福利界絕對不是貪得無厭，我們只想向政府討回應得的權利和資源分配，從而使福利服務和人力供應得到穩定的發展。這亦是本人自八五年加入本局以來，一直念念不忘的爭取目標。本人籲請政府，特別是財政司現在就認真考慮我上述的提議，以便明年三月發表預算案時候，能夠作出改善建議。倘若政府不肯從善如流，本人將會根據博彩稅條例（即香港法例第一百零八章）所賦予本局的權力，以附例方式修訂六合彩的得益分配比例。屆時，本人相信將有不少的同僚會支持這動議。雖然本人極不願意這樣做；但六年時間給政府考慮和拖延，已到了容忍程度的極限，政府在情在理，都應該給市民一個「公道」的交代。

副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李柱銘議員致辭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本年九月十五日，香港市民終於有機會第一次運用到他們長久以來被英國殖民地政府剝奪了的權利，這就是民主選舉代議人士的權利。在這次選舉中，唯一將民主派人士與其反對者分隔開的只是對民主的立場而已。民主派人士堅持縱是在北京的壓力下，香港仍必須按照中英聯合聲明，建立一套民主的政治制度。相反，民主派人士的反對者，

卻相信寧可將香港的民主發展，限制於基本法的牢籠內，藉此討好中國政府，他們竟相信這種做法對香港會帶來更大好處。

在香港市民面前的抉擇已經很清楚，而我們香港人已經作出的抉擇，亦更清楚而肯定。香港市民已經挺身吶喊，用投票選出 18 個民選議席中的 16 個去傳遞一個肯定不可能被曲解的訊息。這就是：我們對民主要求之熱切，絕不比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遜色。

香港市民已堅決的表示，我們要求有管治自己及管理自己事務的權利。我們要求聯合聲明所承諾的高度自治；而我們在爭取全面落實聯合聲明的鬥爭中絕不會妥協。簡言之，我們要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但我恐怕殖民地政府刻意忽視這個清晰的訊息。在總督的施政報告中，隻字不提我們歷史上首次的民主選舉，而由於不能回應香港人對民主自治的要求，總督實際上藐視了群眾的要求。長遠來說，這樣做只會毀滅了港府的信用和效率。

總督在施政報告中對一連串香港市民極其關注的問題竟然隻字不提，顯示了港府未能在這些備受關注的項目上回應市民的要求。政府不理會我們每年因移民而損失六萬人；不理會香港人並不相信九七年後的基本法會符合聯合聲明而要求將其大幅度修改的意願；政府亦不理會我們工人的退休保障，或為那些將畢生積蓄存在銀行的人提供存款保險。

由於殖民地政府漠視港人利益，作為市民代表的本局議員，不論是否經民主選舉產生，都有責任站出來捍衛港人的真正利益。香港民主同盟正是以「為港人爭取利益」為目標。

這次選舉表明了大多數的香港人認同我們對民主的追求與主張，而我們亦只是剛開始成為市民的代表。我鼓勵所有市民繼續提供意見給我們、批評我們及確保我們真正能代表你們。為了協助廣大市民爭取利益及解決問題，港同盟已開始在各選區開設辦事處，並鼓勵所有市民到我們的辦事處提供意見。雖然我們的資源極為有限，而我們仍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但我們承諾我們會竭盡所能服務你們。

在這兩日中，港同盟的成員會提出我們的社會及經濟政策。我們希望香港可以有一個自由而生機蓬勃的經濟、使各行業都有一個良性的競爭環境。我們同時希望政府的社會及經濟政策能建立一個互相關懷的社會，使更多人能獲得更公平的待遇。我特別指出政府有需要改變現時所強調的累退的間接稅，提供一系列打擊通脹的方法，設立老人退休保障、及確保新機場興建的速度及規模不會對社會服務做成不良影響，港同盟的同僚今明兩天會更深入的討論這些建議，而我們希望我們可以與本局其他議員及政府部門合作，以達致我們的政策目標。

我個人的發言會集中三個範疇：民主、行政立法關係和香港在港中英三角關係中的角色。

在這次選舉中，香港人認為民主比任何其他問題都來得重要，縱是親中的候選人亦急於將民主放在他們政綱之首。總督現在竟然將新立法局運作的成效，視為民主步伐的指標。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帝皇及暴君亦曾經以同樣的藉口拒絕給予其子民民主的權利！

黃宏發議員：副主席先生，我不知李議員可否讓我問一個問題，請他澄清一下？他剛才說「一些親中候選人」，我想明白那句說話是什麼意思？他又說過港同盟有相當多席位，民主人士(democrats)佔 16 席，究竟那 16 位是民主派人士？

副主席（譯文）：李議員，根據會議常規，你可決定是否願意退讓與黃議員，他剛提出一項質詢，要求你解釋發言中的若干事項。

李柱銘議員（譯文）：如果解釋時間不計入我的發言時間內，我是願意的。

副主席（譯文）：我認為這屬例外情況，你所花的時間將不會計入該 15 分鐘內。

李柱銘議員（譯文）：我認為對大多數香港市民來說，所謂「親中候選人」實際是指「親共黨候選人」；至於 16 席民主派人士，我抱歉地說，當然不包括黃議員在內。（眾笑）

黃宏發議員：副主席先生……

副主席（譯文）：黃議員，你已打斷了一次。在我們有另一次打斷之前，我認為應讓李議員表明他是否準備再次被打斷發言。

李柱銘議員：另一位已再不是議員了。讓我繼續發言。

英國政府用這種敷衍而不負責任的方法對待香港，就顯得特別偽善。兩星期前在英聯邦會議上，馬卓安強調：「我們做事的基礎必須是普及的民主和人權 — 即我們的人民可以自由選舉由誰來管治他們」。馬卓安此言當然正確，但卻使人懷疑其誠意，尤其是當我們想起以往英國政府對待香港的方法。雖然英國一直不斷強調，建立一個未必能跨越九七的民主制度對香港絕無好處。但當香港市民在今次選舉中壓倒性地傾向那些支持民主的政綱時，英國的論據便顯得完全站不住腳。如果香港市民現在就願意開始建立民主，英國政府憑甚麼理由否決我們這項最基本的權利。

我因此呼籲英國政府根據兩局共識方案，確保在九五年立法局至少有一半議席由直選產生。我同時呼籲中國政府修改基本法以符合香港人已清楚表達的意願；與此同時，香港政府亦應積極採取措施令區議會及兩個市政局全面民選，並對極度不民主的功能團體選舉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我對總督就有關立法局與行政部門之間要建立夥伴關係的說法表示歡迎，但這個「夥伴關係」必須建基於平等及互相尊重的原則上，而並非以往那種立法局只淪為附庸的橡皮圖章的角色。

雖然如此，以下兩項仍然對健全的行政立法關係做成障礙，必須盡快消除。首先，為了實踐行政立法分工，總督應該放棄其作為本局主席的權力。

其次，行政局必須不再堅持透過行政立法兩局秘書處來管理立法局的職員及研究工作。所有立法局的職員均應向政治上中立的立法局副主席負責，而並非向有政治立場的行政局首席議員負責。只要一日立法局職員仍然由一位有政治立場的人決定任免，職員就不能以一種中立的態度為立法局議員提供服務。立法局必須建立一個獨立的研究中心，才能與行政局成為平等的夥伴，如果單靠倚賴政府部門提供所有的資訊，立法局便不能有效地監察政府政策。

我最後希望討論的是香港在港中英三角關係中在未來六年所扮演的角色。今次選舉清楚表明香港市民對於中英不斷強迫港人接受一些他們不能接受的協議，已感到極其不滿甚至失望。我恐怕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正逐漸轉變為一個中英聯合政府，在沒有徵詢港人意見下便為香港內部事務作出決定，更談不上先取得港人的同意。

這種發展，主要是由於英國及其殖民地政府在面對北京政府企圖加強對香港在九七年前後的控制時，一次又一次為北京提供方便所致。中國政府加強對香港事務的干預主要可分為三方面。第一，限制香港立法議會的民選議席數目。第二，阻礙立法局的發展及權力。第三，不放過任何與英國政府討價還價的機會，以剝奪香港政府整體的自治權。而在每一個層面上，英國政府都和中國政府衷誠合作，因為兩國政府的目的正不謀而合，就是不希望在未來六年內，反對香港被出賣的聲音傳遍世界。

面對中英雙方如此良好的關係，我們香港人可以做些甚麼以令聯合聲明所承諾的高度民主自治的權利得以落實呢？首先，立法局必須嘗試向中國政府解釋香港市民的普遍意願。我們必須令他們明白聯合聲明的實踐對香港的長遠發展極為重要，而香港的發展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亦有極大貢獻。我們香港人需要在任何時間、各個層面向中國傳遞以上的訊息，而同時亦應與中國就中港邊境各項問題商討，以增強香港與廣東緊密的經濟聯繫。不過，我要強調，一個良好的中港關係必須建基於中英聯合聲明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之上。

我們亦必須對英國政府採取堅定而清楚的立場，拒絕接受英國政府任何違反港人利益的決定。如果我們要保衛香港的利益和實現高度自治，我們就必須站出來堅持港人有權代表自己與中國政府商討。過去 10 年來的事清楚顯示，我們不能依靠英國代表我們進行談判。香港愈早能為自己的利益與中國磋商，就愈能在九七年後與中央政府交往。

終審庭的協議便是一個鮮明的例子。根據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的規定，終審庭有全權決定邀請海外法官的人數，而設立終審庭的立法則應由本局決定，但聯合聯絡小組在未諮詢本

局的情況下，就終審庭達成協議，而這協議明顯歪曲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的有關條文，故此在本局內務會議中不能為大多數議員所接受。

本局否決中英協議已成為一個重要的先例，我們絕對不可放棄港人自行決定所有內部事務的權利，包括有關香港的司法制度、基建、財政預算及政治改革的速度。本局必須要求聯合聯絡小組在整個討論過程中，必須全面諮詢本局，並應表明除國防外交事務外的任何協議，均不能在未經本局同意下通過。此外，凡總督或英外相與中方任何有關香港內部事務的商議，均應在討論前後將詳細內容告知本局。作為一個職責是立法和批准公共開支的代議機構，這不單是我們的權利，更是我們的職責。雖然中國政府並不承認立法局，而英國在不少重要的香港事務上亦沒有諮詢立法局意見，但若我們立法局議員能負責地運用其立法權的話，最終別人亦不能不承認立法局的地位。

每個人都希望見到一個順利銜接的過程，但順利的銜接只能在實踐中英聯合聲明的情況下出現。

以言論及結社的自由為例，自中英聯合聲明八四年簽署以來，中國政府多次公開地表示不能接受香港人現時所享有的這類自由，亦向港府施加壓力。真正的銜接就是在九七年後維持港人現時的生活方式。而港府必須確保我們所有市民能繼續擁有這類法律所給予的自由。

15 分鐘時限已到

副主席（譯文）：根據會議常規，我只能在例外情況下延長時限，因此，如果你不能在數秒內說畢，我必須請你就座，但我會稍作彈性處理。

李柱銘議員（譯文）：副主席先生，我需要 30 秒左右。因我曾被打斷。

副主席（譯文）：我們並沒有將打斷發言時間計算在內。

李柱銘議員（譯文）：一年前，我希望香港人與香港民主同盟攜手邁步向前，而這個願望能在九一直選中體驗，實令我們大為鼓舞。

我們的市民已用選票表達了他們最清楚肯定的意願。香港市民已授予了港同盟踏上征途的指令，我們誠邀本局所有議員加入我們的行列，走出我們的大道。只要我們有信心，路雖漫漫且艱難，我們終能去到我們的目的地。

借屈原一句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港同盟將上下而求索」。

何承天議員致辭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總督在施政報告首頁即開宗明義表示，從中英雙方簽署聯合聲明開始至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為止的一段時期，到現在已過了一半有多，而且「香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已踏入一個更密切和更重要的新階段」。此種密切關係對於順利過渡至一九九七年及以後日子至為重要。

雖然部份人士對諒解備忘錄有所批評，但其簽訂不僅表示現可展開新機場的工程（這是香港經濟前途的重大投資），還有更重要的，是使中英兩國政府結束了九個月來有關香港在後過渡期的管治方法的公開分歧。在該段期間內，香港處於夾縫，諸事停滯不前。現時兩國政府似會合作，確保順利過渡九七及其後的日子。此事使本港股票市場及地產市場的投資信心普遍增加，而港人對此事的認許，亦可見一斑。

我在進行競選活動的整段期間內，已再三強調必須與中國各級人員加強諮詢、對話及合作。我認為中國珠江三角洲一帶發展迅速，而且與香港存有複雜的經濟夥伴關係，是可以確保香港日後繁榮的唯一最重要因素。我們必須繼續維持這種由互利互惠關係而來的夥伴關係。

在進行競選活動期間，我亦留意到無一候選人提議與中國對立。有鑑於各候選人均渴望與中國建立更良好關係，因此一些中國官員堅決拒絕承認立法局存在意義的做法，實在令我有點失望。但我們不應氣餒，反應竭力以言行證明，立法局的存在，是為港人利益服務，正因一九九七年後，香港將會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所以香港的利益，只會對中國有利。我堅決相信，倘我們能竭誠耐心工作，作為立法局議員，我們定能與中國展開對話。在某些問題上，我們的意見可能會與中國當局所持的有異，屆時我們應克盡厥職，反映意見，但卻不應採取對抗的姿態，而應就有關問題尋求共同諒解。

通貨膨脹

一九八六年的通脹率僅為 3%，本年八月則達 12.7%，雖然已較四月份的 13.9% 稍為下降，但仍屬偏高，令人難以接受。通脹已成為第一號公敵。據悉財政司會就此次辯論作出回應，提出一些遏止通脹的建議。雖然他已提醒我們，現時並無任何立竿見影的解決方法，但我仍熱切期待他的建議。

通脹高企將嚴重威脅本港的經濟成就：削弱本港的競爭能力及打消海外跨國公司前來香港投資的念頭。社會也會蒙受不良後果，因為最受打擊的是低收入人士及老年人，他們沒有多大能力保障其入息及積蓄不致逐漸褪色。

我們須先找出通脹的根由，才能為這問題找到解決方法。近日通脹高企，但失業率卻極低，顯示在勞工市場緊繃的情況下，公營及私營部門均作龐大的開支。這是因為香港的經濟活動已在結構上有所轉變，香港已由一個製造業基地轉為一個專為華南地區迅速經濟增長提供服務支援的地方，而華南地區本身卻已成為一個主要製造業基地。

此種結構上的轉變在兩方面影響香港。首先，華南地區的經濟增長是由於香港的製造業務向外拓展所致。香港雖然增添了收入來源，但有關收入卻非本地生產總值的一部份（因此近年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頗低），而財富增多還刺激了消費。其次，以服務為本的業務活動基本上是工人成本較高或生產效率較低的。此兩項因素對勞工供應造成沉重壓力，與此同時，勞工供應更因過往數年技術及專業人才紛紛移居外地而更形緊絀。

因此，解決問題的方法有二，其一是放緩在香港境外進行生產工序的趨勢，但此舉顯然不可行，亦不理想；其二是實行一項人力資源策略，以紓緩因勞動力有限而造成的問題。

談到輸入勞工問題，本地工人的反應異常強烈，再加上問題的意義被人混淆，其作用又受到誤會，因此問題往往更形複雜。為了工人的利益，必須從根源對付通脹問題，不斷加薪不能對付通脹，只徒令問題進一步惡化。

扭轉通脹升勢的人力資源策略，應以維持全民就業及工資穩定增長為目的，並應具備下列特點：

- (a) 應該是有選擇的：必須審慎選擇輸入的外工類別，俾能滿足指定行業的特別需求；並須有時間限制，只在有需要時才輸入勞工。例如新機場及附連的基建工程全面展開時，便可輸入建築工人。另一方面，儘管地產市道過熱，但建築界目前仍頗淡靜，從近期投標的激烈競爭已可見一斑。由此可知目前並無特別需要擴大一般建築工人的輸入配額；
- (b) 不應增加社會開支：應由僱主負責工人的住宿、福利及遣送等費用；
- (c) 必須慎加管制，以維持本地僱員全民就業及工資穩定增長，並應經常調整某類勞工的輸入配額，以滿足實際需求及就業率。工資應作為一個重要準則：這樣可免勞工界憂慮過度激烈的工作競爭和由此而對他們帶來的不良影響。

政府和個人、公營和私營部門、僱主和僱員必須通力合作，才能打擊通脹，因此我建議成立一個由政府及私人機構代表組成的人力資源策略工作小組，制訂及監察一套全面的人力資源策略，以遏止通脹。

政府絕對有責任更嚴格控制其開支。過去三四年來，政府開支大幅增加，遠超經濟增長的水平。此外，政府開支已接近本地生產總值的 19%，創下歷史的高峰。這個趨勢令人憂慮，其對內部資源的需求，肯定大力助長通脹。

政府應推行計量生產力的措施，正如私營機構一樣，應訂定形式，按生產力進行獎罰。我重新籲請當局，慎重研究可否把政府機構改為私人公司，九廣鐵路公司就是一個好例子。政府並應進一步研究可否把以提供服務為本的政府部門改為私營公司。

房屋成本飛漲

由於通脹率早在本年第二季樓價開始大幅上揚前已起步攀升，所以並無證據顯示樓價上升造成通貨膨脹。事實上，甲類消費物價指數所示的通脹率，是根據租額計算出來的，而該數額的升幅不及樓價。無論如何，樓價銳升是很多人的實際憂慮，所以試圖遏止炒樓活動或甚至壓低樓價的建議委實不少。

凡屬打擊不守規則樓宇買賣活動的措施，以及為購樓人士提供更佳保障的安排，例如透過自律措施或發牌制度，規管物業代理商的活動，我都表示歡迎。然而，藉人為辦法干擾自由市場的運作，企圖就此壓低樓價，將會對本港經濟架構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害。根據本港的經濟體系，一切須由市場決定。另一方面，真正的市場動力須由供求情況調整。在香港，土地供應受當局管制，因此，解決辦法是增加住宅用地的供應，使供求回復平衡。政府已宣布增撥超過五公頃住宅用地在本財政年度使用。本人促請政府明年再增撥土地，並在日後維持穩定的供應，以應付需求。

由於市區的重建機會有限，新界土地顯然是土地供應的來源。新界的私人土地大部份是農業用地，須待規劃審批及契約修訂。此等程序可以甚為費時，間亦有多年才能完成。為處理這問題，政府應該：

- (a) 使規劃審批程序加速完成，並縮短全港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擬製時間（該圖則將為土地用途提供明確的依據）；
- (b) 精簡規劃批核後的契約修訂程序；及
- (c) 進行所需的基本建設，使私人發展計劃得以展開。

除增加批地及換地外，原供其他用途的土地可以視情況合宜而改作住宅用地。為使擬訂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工作及規劃審批的程序能加速完成，規劃署應獲得更多專業資源。我對城市規劃條例擬議修訂的意見，將待本局辯論此條例草案時才向各位講述，但有關建議繫於充足的專業人力資源，否則將會在圖則擬製和規劃審批等工作出現嚴重延誤。

規劃項目會否獲得批准，通常會視有關地區有否基本設施而定。基本設施匱乏，例如沒有適當的道路網絡（新界西北部便特別遇到這問題），嚴重限制了有關地區廣大土地的發展條件。我曾在本局前時的辯論談論這點。運輸司最近在簡報會告訴我們，政府最低限度已願意檢討可否提早進行3號幹線北段的建築工程。我認為當局應認真考慮將這段幹線轉為私營，以便盡早推行有關計劃。3號幹線及附連的鐵路連接系統可帶來偌大的發展機會，足可抵銷所涉基建工程的成本有餘。

總督在施政報告說得對，不論議員循何等途徑加入本局，本局都作為一個整體工作。我經常認為，「香港制度」運作良好，優勝於很多其他國家，便是因為本局包容了眾多不同的人才和利益。無論如何，本局首次有三分之二成員是民選議員，我們肯定正在進入新紀元。本局議員要求政府比前更徹底向市民交代，正如議員本身也須向市民交代。再者，市民漸次相信，加強民主政制可使立法機構和政府更趨理想，最終亦使生活更為理想。市民的期望很高。

最後，副主席先生，我相信各人過份關注新一屆立法局的不同派系，並過份擔憂這現象可能產生的問題，但卻忽略了積極的一面。我們的背景不同，分屬不同團體，代表不同利益，應是一種實在的力量，最能使我們發揮期望中的作用，就是朝著同一目標工作，促進香港市民的整體利益。

副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劉健儀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總督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用上相當詳盡的篇幅，談到中港之間的關係問題。事實上，香港在後過渡期內，非常需要與中國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才可達致香港平穩過渡九七這個目的。我個人極之贊同港英兩個政府以及本局議員，甚至各階層的香港市民，從各種渠道加強與中國的溝通，增進互相之間的了解。不過，真正的溝通必須雙方衷誠合作、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諒解，不能夠單靠任何一方妥協讓步，亦不能只是「神女有心而襄王無夢」。以往本局議員一直都有意與中國加強溝通，但由於中方堅持拒絕承認本局的地位，溝通出現極大的障礙。近期中方發表的一些言論，更反映出中方對本局的運作存有誤解。事實上，本局現時的功能，與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基本相同。倘若中方堅持拒絕承認現時的立法局，否決與立法局議員溝通，我認為這樣必然會影響九七的順利過渡。為著解決此困局，香港政府與英國政府實在有責任主動向中國政府解釋有關立法局的功能及重要性，爭取改變中方對立法局的態度。

副主席先生，近年來，香港通貨膨脹率持續高企已嚴重影響民生。如何打擊通脹是政府當務之急。港府在今年五月實施一連串反通脹措施，雖然有助遏抑通脹繼續上升，但問題仍未能解決。政府必須積極考慮進一步採取其他有效的措施遏抑通脹。我期望政府能夠在不久的將來提出這方面具體的針對性方案。政府在較早時凍結各項收費，以及有限度調整公務員的薪酬，這是正確遏抑通脹的措施。不過，任何有關的措施都需要一段較長時間，方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因此政府所凍結的各項收費，絕對不能在解凍後作出任何大幅度的調整，亦不能以任何形式追加已往被凍結的加幅，我很高興見到九月份的通脹率稍有回落，但政府仍需努力，我盼望政府將來在釐定各項收費政策及處理公務員加薪時能夠深思熟慮，盡量避免刺激通脹。

副主席先生，遏抑通脹，不能單靠政府獨力承擔。與民生有重大關連的公用事業機構，必須配合政府，採取打擊通脹的措施。公用事業機構應該本著對社會的責任，在調整收費時，主動考慮到市民承受的通脹壓力，萬勿只顧牟利，加費超越通貨膨脹率。就擁有專利權利機構而言，政府應該透過公用事業利潤管制計劃，有效地控制有關的收費水平。另一方面，對於不受利潤管制的法定公共機構如地下鐵路公司及九廣鐵路公司，政府亦應該運用影響力設法勸諭有關公司，在調整收費時，考慮採取溫和而又不刺激通脹的加費政策。不過，政府現行可以採取的辦法，因法例所限，始終比較被動；上一屆兩局交通小組在今年六月曾經建議政府考慮採取若干措施，其中包括修訂現行有關上述兩間法定公共機構的法例，加強管制，規定有關機構所依循的審慎商業原則，必須符合公眾的利益。有關兩局

交通小組提出的建議，至今未被當局採納，當局甚至未有作出任何回應。為著公眾的利益，我個人盼望政府能夠盡快採納有關建議，付諸實行。

副主席先生，本港治安情況亦是香港市民關注的重大事項。近年來，嚴重暴力罪行，特別是行劫案件不斷增加，剛公佈的第三季罪案數字顯示此類罪行再創高峰，這情況難免令人憂慮。政府最近重新調配警隊人手，增加輔警執勤人數，我認為這是有效維持治安的正確做法。另外當局免除警隊管理萬宜水庫越南船民羈留中心的工作，令到警隊可以抽調更多人手，負責巡邏任務。此舉對維持本港治安應該有一定的幫助。本人希望政府能夠盡快將其餘由警隊負責管理的船民羈留中心，交由其他紀律部隊接手，使到有更多警員可以投入維持治安的正規工作。

副主席先生，我深信香港的警隊是有效率和負責任的，但現時治安情況回趨惡劣，警隊經常受到挑戰和考驗，在此環境下，維持警隊士氣至為重要。我認為當局採取任何政策時，都必須照顧到警隊士氣這方面。當局亦有必要經常檢討加強警隊的裝備，增加警隊維持治安的效率和信心。

在本港治安問題方面，中港兩地走私活動的猖獗，一向備受關注。自從今年四月實施新的反走私法例以來，打擊走私活動的措施，的確產生到預期的效果，中港兩地的走私活動曾經一度顯著減少。此種現象看來並未能夠持續，近期中港兩地的走私又再有復燃的跡象。為著更有效打擊走私，政府成立的反走私特遣隊實在有必要盡快研究加強各項反走私的措施，加重對走私份子的刑罰，以產生更有效的阻嚇作用。打擊中港兩地的走私活動，亦有賴中港雙方面的合作，當局必定要加強雙方的溝通，透過交換情報及互相配合行動，齊心設法杜絕走私的非法活動。

副主席先生，本港的交通擠塞問題，一直以來對民生造成重大的困擾。香港路少車多，道路阻塞對香港經濟活動的效率造成嚴重影響。政府計劃發展機場港口的基建設施，將來對改善本港交通情況肯定會有幫助，不過，有關計劃的道路工程，起碼要在五、六年後方能陸續落成啓用，而其間進行有關工程時，將會令已經混亂的交通情況變得更加混亂。在現階段直至新道路網工程完成之前，政府必須運用更妥善的道路管理措施，設法提高道路使用的效率，減低道路阻塞的嚴重程度。以舊海底隧道現時的情況為例，可以見到解決交通嚴重擠塞的迫切性。機場港口發展計劃當中的西區海底隧道落成之後，對舊海底隧道的擠塞情況，肯定會有極大的紓緩作用。不過，現時距離西區海底隧道落成的日期，起碼有五、六年時間，在此段時間內，舊海底隧道的交通擠塞問題應該如何解決呢？自從東區海底隧道及大老山隧道通車之後，理論上應該有效紓緩舊海底隧道的擠塞情況。可惜，實際情況並未能達致預期效果，雖然使用東區海底隧道過海的車輛已經逐漸增加，但舊海隧的擠塞問題依然並無顯著改善，使用率亦沒有降低。有關問題顯示出駕車人士仍然未有充份使用東區海隧。有見及此，政府有必要切實研究採取有效的道路管理措施，改善舊海隧出口及入口兩處的交通流量，亦該設法吸引駕車人士使用舊海隧以外的途徑渡海，以減輕舊海隧所承受的壓力。政府應鼓勵汽車渡輪公司及東區海底隧道公司，作出適當宣傳設法招徠更多駕車人士使用。我認為政府應該盡可能避免採取加價手段，遏止使用舊海底隧道的車輛數目，因為此一做法在已往已經證實極其量只收短暫效果，而並非長遠解決道路擠塞問題的良策。

副主席先生，在後過渡期內，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至為重要。中港雙方加強溝通，維持和諧的關係，有助穩定香港，使香港順利過渡九七，但影響民生的經濟、治安，以至交通問題，港府亦不容忽視。市民的生活受到保障，才可以安居樂業，任何社會的安定繁榮必然建立在這基礎上。

副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李國寶議員致辭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作為銀行界的代表，我感謝總督在立法局本年度會期的首次會議上勉勵之辭。總督在檢討政府當局和本局的職權範圍時，對「政府」和政府的組成部份作出極為重要的區分。

香港已進入新的憲制年代，「政府」一詞已不單指政府當局，而是包括政府當局、本局、行政局、司法部和最重要的一部份——本港市民。上述各項一起構成香港「政府」。這項區分不只是語義上的問題，更是關乎職責和責任承擔的問題。

首席議員於本年三月就財政預算案進行辯論時曾表示，在他 13 年多的公職生涯中，記得只有一次是非官方議員的提案得以施行。際此新會期開始，本局議員和所代表的選民均希望，在會期結束時，毋須再作同樣的慨歎。

然而，話須兩頭說。我們身為立法局議員必須盡力確保首席議員上屆所作的慨歎不會被新的怨言所取代，就是指稱狹隘和只顧特別利益的政治取向大大拖慢了立法程序的步伐。

我們不應忘記，一直以來，本港擁有全亞洲回應最迅速和效率最高的政府。當然，施政上仍有可作改善之處，但我們切勿為求革故鼎新以致「過猶不及」。

我們必須竭盡所能，維持和提高本港立法程序的效率，更應採取靈活和開明的態度。我們應致力鼓勵而非打擊公務員、本局議員及市民在制訂和實施適當政策方面所表現的努力、熱誠和興趣。

我的功能組別歡迎政府當局與本局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的決心。我們期望與政府當局共同努力，為香港謀取更大的利益。

今時今日，通貨膨脹是最急切需要政府注視和着手處理的問題。這不只是我的個人意見，亦不只是我所代表功能組別選民的意見，而是香港每個市民每個行業的意見。

本港政府當局，即政府整體所得的評價，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其如何對付通脹。通脹高企的問題已存在很久，而持續的兩位數字通脹率，現正侵蝕我們的生活水平和削弱本港商業的競爭能力，亦構成威脅，可能令香港由一個經濟「奇蹟」變為一個經濟「廢人」。

我的功能組別歡迎政府當局提議有管制地擴大輸入外地勞工，但若要把通脹率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則必須做的事情甚多。

在勞工市場的供應方面，積極的解決辦法須包括制定措施，以確保能盡量善用本地勞動資源。本港工人為全球勞動人口中最盡忠職守、勤奮向上和技術熟練的一群，若因缺乏適當訓練而致本地的人才遭浪費，實屬社會上和經濟上的罪行。

本港的勞工短缺涉及質、量兩方面問題。只輸入更多「血肉之軀」不會令問題迎刃而解，本港必須尋求辦法，最好是從內部着手，解決技術人材不足的問題。

擴展本港專上教育是良好的開始。然而，加強本地僱員的專業、管理和技術訓練，以及重新訓練本地工人，將會更快取得更顯著的效果。

若政府當局確實希望打擊通脹，便須同時抑制間接稅的增幅。當全港各行各業繼續忍受高通脹之苦時，政府當局再無理由從「乞兒砵中搶飯」，以填滿其「鐵飯碗」。

作為打擊通脹的第一步，政府當局應把間接稅凍結在目前水平，以便實質緩和通脹情況；否則，亦應準備接受間接稅只有負數的「實質」增長。

政府收入的購買能力會下降，要接受這一點並不容易，特別因為政府現正提出多項新的開支計劃，但是在若干方面讓步是難免的事。經常開支的增長應限於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的水平。各部門首長、本局議員和香港市民均須準備接受事實，就是某些服務或計劃的開支將受削減。

要使政府的財政受控制，香港的基建計劃必須採用固定成本預算法，及在經常開支方面採用零基預算法。

另一有價值的可行辦法，是政府從過去的基建計劃套取資本增益。將九廣鐵路、地下鐵路、供水服務、郵政服務等私營化，政府便可將非流動資產套現，籌措資金進行新的基建計劃。

為釐訂打擊通脹的長遠政策，政府當局亦應考慮改變現有的聯繫匯率制度，使其不單與美元掛鈎。

此做法不應單獨使用，而應從全面加強本港的貨幣金融制度方面研究。香港需要一個獨立金融管理局，而外匯基金管理局的成立已為一個獨立的金融管理局奠下基礎，現在是繼續循這方面發展的時候。

金融管理局的其中一項重要職責，是必須成立及操作功能完備的貼現窗制度，這大有助於提高金融系統的穩定性。貼現窗亦可防止今年夏季的不幸事件重演，並可排除由政府設立存款保險制度的需要，以及避免隨之而來的支出和內在風險。

面對未來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挑戰，我們需要有清晰的遠見，應知道何去何從。我們的眼光應放遠一點，不應單着眼於磚塊灰泥的實質工程問題，更應超越「血肉之軀」和方頂帽子等問題。

我們應在憲制發展上邁進一步，應和中國建立更密切、更和衷共濟的關係，亦應提高本港市民的生活質素。這些目標由一個凌駕一切的要點連接起來，就是本港的「競爭能力」。

我的功能組別同意香港必須「致力謀求發展」。為達到此目標，政府政策的試金石必然是「競爭能力」。

香港亦須加強其作為亞洲首要商業中心的地位，所採取的經濟、財政、金融及社會政策，必須提高本港在國際間的競爭能力。立法局議員的職責之一，就是確保上述情況能夠實現。

我們必須締造一個有助於順利進行長期投資的環境，必須消除對商業的障礙，更須徹底打擊通脹，使其不再肆虐。

我們必須為各個行業提供「公平競爭場所」，任何行業，不論其成員人數多寡或政治勢力強弱，都不應予以優待。

我們必須在本港推行所需的技術訓練，使香港能在主要工業上取得卓越的成績。我們更須為市民提供健康和富吸引力的居住工作環境。

今日，香港所面對的挑戰在其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在英明的領導下，加上有創見的政策及真正能幹的人材，我們一定可以順利發展。

副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倪少傑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本人首先贊同施政報告中所提出的三項主要施政目標：

- (1)繁榮興旺；
- (2)安定太平；及
- (3)保赤安貧、照顧兒童和保護環境。

施政報告為今後香港繁榮進步確立正確工作方向，值得讚賞。但在落實工作方面，未有具體講述。因此，本人覺得施政報告並未有充份照顧到工商方面的發展事務，以致忽略加強繁榮經濟的工作，未能滿足社會人士對政府如何在過渡期內更好地管治香港的期望。由於發言時間所限，本人只能集中在經濟事務方面發言。

政府對九二年的經濟前景作出樂觀的估計，並引述今年頭七個月的經濟數據作支持，預計全年整體經濟增長可達 4%。從表面上來說，世界經濟似乎開始呈現復甦跡象、全球政治形勢走向全面和平、海灣戰事結束、蘇聯形勢漸趨穩定、美蘇兩國相繼大幅裁軍、中東和平會議召開等等；而在本港方面，新機場諒解備忘錄已經簽署，中港關係進一步和諧發展。世界局勢充滿和平希望，本港內外環境看來良好，前途光明一片。

但事實上，本港仍須面對不少內外威脅和不安。美國針對中國展開 301 調查，顯然會影響本港的出口及轉口貿易，對在國內有投資的本港中外工商界人士可能帶來嚴重的打擊。本港內部亦因勞工短缺、通脹高企、成本上升等因素而削弱了本港經濟的靈活性和競爭力。在這種種隱憂之下，實不能以 4% 的經濟增長而自滿。本港應該加強貿易發展，開拓新市場，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加強對抗保護主義的活動；可惜的是，施政報告並沒有詳細描述這方面的策略，只是提到設立工業技術發展局。事實上，這建議已經提出多時，到今才聽聞樓梯響。本人希望政府能夠盡快開展工作，並賦予該局獨立的統籌地位，擁有一定的資源調配權力去推動本港工業向前發展。

副主席先生，我留意到在施政報告的開首部份一再引用「夥伴關係」來形容本港憲制發展及與中國的關係。我相信「夥伴關係」自然是指一種和衷合作的良好關係。施政報告中並沒有進一步具體說明。但對於坊間出現一種議論，認為政府以「夥伴關係」來推卸後過渡期的管治責任，本人不敢苟同。

本港憲制發展，無論立法局成員的成份作何種轉變，政府和立法局的工作目標都是以廣大市民的福祉為依歸。在這樣的一個共同目標之下，雙方的工作關係自然是和衷合作的關係，亦都是施政報告裏所描述的「夥伴關係」，十分恰當。

事實上，證諸某些政治人物近期的輕率言行，間接證明本港的政黨政治尚未趨成熟，而本局的新同僚尚要摸索議會的運作規則，在這些背景之下有人急切地要以「監察施政」的咄咄逼人態度來取代「夥伴關係」的互同協作態度，除了能夠帶來譁眾取寵的後果之外，實際上可以為本港的社會及憲制展帶來什麼好處呢？我得提醒有關人士，「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急激的政治舉動一旦危害本港經濟，受害的選民終會認識到誰是始作俑者。始作俑者將不會獲得廣大群眾的支持。

在中港雙方的關係上，「夥伴關係」正是唯一可以按照現實而發展的合理關係。事實上，我們要盡更大的力量，使中國的官員，包括任何層次的官員，都確切瞭解本港的特質以及將來作為特別行政區的地位，雙方瞭解越深，對本港的發展越有利，本港的社會經濟發展，亦只有在穩定的政治條件之下，才能大步向前。

副主席先生，管理社會確是一門藝術，如何準確掌握時機，推行適當政策，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更是管理藝術的精華所在，從這個角度來看，政府既錯失了掌握適當的時機未能積極推行輸入勞工政策，進一步提高本港經濟增長；亦未能預早製訂政策，針對聯繫匯率所可能引發的通脹壓力；更加未能及早對整體稅制作出檢討，為政府未來的財政策略打好基礎。現在看來，政府的施政，正好在上述各方面處處受困，我們既不能紓緩勞工短缺情況，又未能有效打擊通脹，亦不能在通脹熾烈的情況之下開徵銷售稅，更要為未來的政府財政穩定情況而擔憂，而工業界亦未獲政府有效的支持，增強對外競爭能力，凡此種種，影響到今後經濟的發展，令人憂慮。

副主席先生，本人現在就政府的打擊通脹政策、勞工輸入政策及環境保護政策，略作出評論。證諸大部份其他國家，尤其是與香港保持密切關係的國家，普遍並無嚴重通脹問題，相信本港持續的通脹主要是由內部經濟因素所引致。記得本年五月二十九日，本人在有關「通貨膨脹問題」的動議辯論中，曾呼籲政府應該火速由政府和勞資團體三方面組成一個「遏止通脹緊急委員會」，制訂一些可以互相配合推行的政策和措施，遏止通脹情況。副主席先生，我很高興有關司級官員在回應施政報告的會議中，透露政府的一個專責小組正在研究打擊通脹的辦法。這確實是政府關注民生的表現，雖然遲了一些，但意向可嘉。不過組成一個成員較為廣泛的「遏止通脹緊急委員會」，現在看來，仍然是合用的。

到目前為止，政府所採用的反通脹措施依然是捨難取易、治標不治本，未能對症下藥，因此收效不大。

歸根究底，政府開支增長迅速和勞工短缺是造成本港通脹的兩大主要原因，我很高興知道政府已經定下削減公營部門開支的指標，逐年增加節省比例，這是政府主動而積極的表現。我在此再一次表示讚賞。

副主席先生，有些人士否定勞工短缺和通貨膨脹的關係，我看這是掩耳盜鈴的做法。對於本港為何會在高就業、低增長的情況之下持續出現通脹問題，這些人士將難以自圓其說。客觀地看，勞工短缺是造成低增長、高通脹的主要原因。因為勞工短缺局限了生產能力，限制了本港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勞工短缺直接推動工資上升，帶來成本增加，刺激通脹，從而削弱本港產品的競爭能力，反過來又打擊本港經濟表現。當然，我們得認識到在經濟轉型的結構性改變中，總有一些不幸的勞工未能適應轉變而需要接受技術訓練，或遭遇某種投閒置散的不愉快經驗，更加不幸的，是這些勞工同時要面對通貨膨脹的壓力。我覺得政府應該對症下藥，提供多種職訓課程，為解決勞工轉職轉業問題作出貢獻。而在解決經濟低增長及由於工資上升所帶來的通脹壓力方面，我們更加需要有限制地和有選擇性地輸入勞工，當然不是廉價輸入和胡亂輸入，因此我認為並不會影響本地勞工市場。

副主席先生，我想談一談環境保護問題。從其他先進國家的環保經驗來說，由政府單方面提倡和推行環保措施，很難收到滿意的效果。按照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高斯先生的分析，政府在環境保護所採用的管制做法只能帶來很高的「交易成本」，即他所指的“transaction cost”，這些做法不一定有利整體社會。事實上，在污染管制問題上，政府所面對的困難往往不是釐定管制標準，而是如何在技術上容許和協助污染者達致或符合釐定的管制標準。因為在這個問題上，往往出現外行人領導內行人的情況，以致對社會整體

利益作出錯誤的評估。我們必須明白，香港是一個自由貿易體系一環，製造商的產品，一般來說，都要面對世界市場的競爭。因此，本港的製造商很難以成本轉嫁的方法來進行環境保護活動。事實上，根據本人的觀察，大部分倡議環保的活躍份子都與本港製造業沾不上任何關係，這就形成他們在提倡環保時無需考慮任何損失，即所謂「機會成本」。與此相反，製造商和製造業勞工都深切瞭解，過份嚴厲苛刻的環保措施可能直接影響他們的生計。政府在考慮製訂及施行環保措施時，應該明白上述的不同處境和取態，更加要留意不能因管制而管制，造成高斯先生所不幸言中的後果，也就是不一定有利於整體社會的後果。

副主席先生，工商界人士亦支持環保，更以務實審慎的態度去進行環保。最近成立的「私營機構關注環境委員會」，便是希望匯集本地工商機構的人力及資源，尋求方法解決。

最後，副主席先生，施政報告雖然未夠具體和深入，但是除了若干政府政策有待進一步改善之外，基本上是有遠見的。我期望施政報告所提及的「夥伴關係」能夠在各個社會層面開花結果，包括本局同僚們共同工作時候的取態，不要恃着「唯我獨尊，捨我其誰」的君臨姿態，我希望任何人不應該過份自我標榜，自絕於「夥伴關係」之外，則社會幸甚，市民幸甚。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彭震海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今年總督的施政報告，市民的心理上早有準備，因為殖民地政府只剩下五年多一些的日子，所以預料政府不會有什麼好前瞻的施政策略，但市民仍迫切希望政府在可能範圍的情況下照顧一下普羅大眾的生活，關心一下民間疾苦，這不應該算是一種苛求。

如果要對總督的施政報告表示衷心感謝和欣賞的說話，恕我難以啓齒，甚至會覺得面紅。若將以往四年的施政報告檢出來大家看一下，比較一下，更是令人大失所望。

本人就總督強調應付的三項轉變，表達一下我的感受：

第一，憲制發展：政府好像已忘記以前對代議政制進一步發展的許諾：「要建立一個植根香港的代議政制。」現在九一直選已經完成，政府除了將設立一個獨立的選舉事務專責委員會提出技術性檢討改進外，不再提及政制進一步發展的計劃。

施政報告第4段說：「市民寄望你們確保政府當局與社會人士盡量保持密切的接觸，了解他們的憂慮和期望，政府當局寄望你們提供協助」。這句話好動聽，似乎對本局期望殷切。但又說：「假使沒有本局在處理本港立法和財政事務方面的支持和合作，政府將不能提供市民期望和應得的服務質素和選擇」。這明顯地給本局造成一種壓力；它可以在必要

時作為政府推卸責任的藉口。其實立法局是否有這種權力？在提到立法局與行政局之間關係時港府特別強調「根據本港的政制，行政局無論現在或將來，都是釐定本港政策的主要機構」。這已清楚說明政府有這種意圖，會將本局的地位擺低，將本局監察政府的實際權力降低，難怪被人家說立法局是何物？只是一個諮詢機構而已。

第二，中港關係：更是軟弱得可憐。事實上從香港主權談判開始，有關所有談判只限於中英之間的交往，儘管每一項事務的談判，實質上關係到所有香港人的前途，但始終不讓香港人甚至香港政府參與，例如最近「新機場的諒解備忘錄」，「香港設立終審法庭」等。因此，對於如何搞好中港關係，我看只是一廂情願，不提也罷。

第三，內部事務的轉變：我預料會有不少同僚對經濟發展、社會服務、環境衛生、醫療管理等都會提出他們的重點。我首先想對本港房屋計劃提出意見，政府一直在標榜香港房屋計劃的成果。其實當初政府興建公屋及居屋的目標，是為所有需要廉價住所的市民提供居所，本來這項政策確實可以替中下層市民解決居所問題，也是凝固香港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但現在已經徹底變質，房委會由八八年「獨立自主」後，這個機構已經化身變成一個牟利的商業機構，而且是全香港最大的地產商。加上政府不斷推行高地價增加收入，默許私人地產商的興波作浪，房委會又配合私人地產商的樓價實行掛鈎，興起一片驚人的漲風。一般市民即剛才所說的中下層市民，實在已無能力負擔，如果說到通脹，這才是引致通脹高企而且不斷惡化的罪魁禍首。因此，我慎重地要求政府和本局同僚，對房委會這樣一個組織，現今擁有不斷膨脹的權力，必須認真地重新檢討。

總督對通貨膨脹，沒有提到，大多是迴避了諸多複雜的真正原因，又不提出用何種方式來遏抑的方法，而竟歸咎於勞工短缺。他又不記得八八年的施政報告說過：「要紓緩勞工短缺，應加強自動化，提高生產力及改善工資，工作條件，以吸引更多人就業。」本來這是正確的，但現在又不是這樣，特別使勞工界強烈反對的是政府對輸入外地勞工無一貫政策，現在，總督認為：「我們必須選擇經濟增長，但必須是有適當保障的增加，因此我們政府正在考慮擴大有管制地輸入外地勞工的計劃」。又說：「如果我們不設法消除某些不利於經濟增長的結構性障礙，通貨膨脹率顯然便會繼續處於過高水平的危險」。因此，政府對付通脹的唯一方法就是進一步擴大輸入外來廉價勞工。在這裡，我再一次特別強調香港所有勞工界一致反對這件事。

中英雙方完成簽署關於新機場的諒解備忘錄，我們可以見到的，政府好像「一天光晒」。將一切財力集中在建設新機場及有關基建工程；其他有關改善社會民生的計劃都已放慢甚至放棄。總括來說，施政報告令人得到一個啓示：「夕陽政府」一切都受命於中英兩國政府的支配，所以事實上，它已無心確實亦無力可以保持有效自主的管治能力。

說到這裡，我曾經聽過有人說：「倫敦經常大霧，所以外國人看英國人，總是看不透，而英國人在霧裡看向外面，則一切瞭如指掌」。這就是說，形容英國人玩政治把戲非常高明，一面張起密不通風的障眼煙幕，讓人有一種似乎有透明度的錯覺。但是我看這份施政報告，覺得現在的港府已經黔驥技窮，這份施政報告並不高明。

雖然如此，但是我仍希望政府所謂達致「繁榮興旺」、「安定太平」及「保赤安貧，照顧兒童和保護環境」等等，應該明確地列出具體措施，來保證可以達到這些目的。

副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並對致謝動議表示願意棄權。

下午四時四十五分

副主席（譯文）：本局會議至此暫停，小休 15 分鐘。

下午五時十分

副主席（譯文）：本局現恢復會議。

陳坤耀議員致辭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本港經濟增長經過三年放緩後，雖然情況可望於一九九二年變得較為樂觀，但並沒有跡象顯示我們可以擺脫過去三年來持續高企於兩位數字的通脹。

讓我先談談那些並非導致本港通脹的因素。

首先，本港目前的通脹肯定不是由需求所帶動。本港經濟在過去數年並無過熱的跡象。私人與政府消費以至投資方面的增長率均十分溫和。由一九九〇年初至一九九一年中的 18 個月期間，貨幣供應增長率為 1.4%，信貸增長率為 3.8%，兩者均屬偏低。總而言之，在本港目前的金融制度下，貨幣供應並無可能決定物價的水平。我們目前所面對的通脹，與一九七九至八三年間的通脹很不同。既然目前的通脹與求過於供無關，則以提高利率及削減政府開支之類的管理需求措施來打擊通脹，均會勞而無功，而且更會對本港原已增長緩慢的經濟產生巨大的抑制效果。只要不影響我們所作改善基本建設的承擔，緊縮財政開支無疑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與生產力的積極之舉，惟對壓抑通脹卻於事無補。

更重要的是，把目前的通脹歸咎於聯繫匯率是不對的，因為提高利率對於降低通脹沒有多大幫助。很多人謂，若不是港元與美元掛鈎，我們便可以提高利率來打擊通脹。然而，此論點忽略了一個事實，本港目前的通脹並非由於求過於供所致。我們現時實際處於負利率的情況，確是令我們焦躁不安，但解決之道卻在於冷卻通脹而非大幅提高利率。況且，我所進行的計量經濟分析顯示，本港經濟對利率變化反應極微：利率變化必須十分鉅大，才能影響經濟活動的水平。此外，一般公認，運用利率措施，需經過長達六至 18 個月才能對經濟產生較大的影響。

我們不清楚現時港元幣值相對於美元幣值是否偏低；若然不是，則讓港元浮動將會令港元貶值，以致入口價格上漲和出口擴張，兩者均會繼而加劇本港的通脹率。

其次，本港目前的通脹與近期樓宇炒賣活動沒有多大關係。本港目前的通脹大約於三年前開始，炒樓則是很近期的活動。聰明如我輩，亦很容易混淆因果關係與連繫關係。事實上，樓價上漲並非通脹之因，而是通脹之果，因為消費者預期通脹持續的心理吸引了資金流入地產市場。住宅樓價上升，對於推高成本以至消費物價只具有輕微的初級與次級效果。我們反而可以說，資金流入地產市場，有助冷卻貨物和服務消費。無論如何，在一九九一年首八個月，住屋方面的消費物價指數只略升了 7%。我也同意，若炒風過份熾熱，以致收入分配不公，令真正用家百上加斤，且殃及金融界，則應予以遏止。然而，這樣做並沒有解決通脹問題。

然則，本港通脹的成因與解決之道為何？

通脹的成因是與本港過去五、六年來經濟及人口的結構性轉變有關。本港勞動人口的增長率，在八十年代前半期每年平均增幅為 2.5%，到了八十年代後半期，已大幅下降至 1.1%。在一九八一年，工業從業員（受僱於製造業和建造業）佔總勞動人口的 49%，到了一九九〇年，則降至 36%，而在同期內，第三級行業的從業員由佔總勞動人口的 48%增至 62%。

雖然某些業務正走下坡的製造行業有從業員失業的現象，但不少行業，尤其是服務性行業，出現勞工嚴重短缺問題是無庸置疑的。一九八六年九月至一九九〇年九月期間，個人服務業與商業服務從業員的工資實質增長分別為 31% 及 26%。同期內，製造業從業員的工資實質增幅只有 8%。此等數字顯示，由於急劇的經濟轉型，非製造行業的工資上升成為推動通脹的主要原因。此外，一九八五至一九九一年間，服務性項目的消費物價指數上升了 83%，遠較各類項目的 61% 增幅為高；這些數字亦可進一步支持上述推論。

除了服務性行業的「工資推動」因素外，服務性行業的獨家壟斷和少數公司壟斷的情況也令通脹率加劇。由於經濟轉型，供本地消費的服務性非貿易行業變得越來越大。出口或貿易行業由於須與國際同業競爭，其效率遂有所保證。但非貿易行業則並非如此，其經營絲毫不受外國競爭所影響。本港目前的通脹多少與非貿易服務性行業逐漸為獨家壟斷手法所支配有關。銀行、保險公司、燃油公司、公用事業公司、專業組織等的壟斷手法對本港目前通脹的影響，均不容忽視。

由於非貿易服務性行業越來越重要，舖位的需求因而大增，供應極端不足。最近一項有關世界各大城市黃金商業用地的調查顯示，香港的舖租是全球之冠，比東京稍高，比紐約高 35%，比倫敦高 50%。一九九〇年六月至一九九一年六月期間，本港樓宇租金的情況為：零售業單位上升 8.3%，住宅樓宇上升 5.4%，寫字樓下跌 7.8%，工廠單位則下跌 3%。因此，零售業和酒樓業的租金大幅增加，成為另一個由成本推動通脹的因素。

因為目前的通脹是結構性通脹，所以並無辦法可以即時解決問題；凍結工資和物價會導致更差的長期性問題。我們只可針對結構性問題，利用長遠的辦法解決結構性通脹。我剛才點出三個導致通脹的主要成因，現在要提出三個相應的長遠解決辦法：(1) 輸入外地勞

工；(2)對於因非貿易性行業壟斷手法和公用事業公司欠缺效率而引致的「成本推動」效應，政府應嚴加監察；(3)制訂週詳而長遠的城市規劃和土地供應政策，以應付本港急劇轉型的經濟所需。

輸入外地勞工無疑是最具爭議性的問題，所以今天我會集中討論這點。

在過去兩年，輸入外地勞工政策對於降低通脹率似乎沒有多大成績；不過，並非因為政策本身不收效，而主要是關乎輸入數量和該計劃的實施方法。首先，我所進行的計量經濟分析顯示，本港每年需要輸入約 100000 名外地勞工，維持數年，才能達致八十年代前半期同樣的勞動人口增長率。我一方面考慮到由於科技發展和本港工序外移的因素，今後可能需要較少勞工，另一方面又顧及港口及機場工程可能需要較多勞工，所以估計在未來數年，本港每年至少需輸入 40000 至 50000 名勞工。這說明何以本港過去兩年來輸入 15000 名勞工，並未能在降低通脹率方面產生顯著的效果。其次，現行輸入外地勞工計劃太多限制：輸入勞工有配額限制，工資水平亦設定於中位數。可是，政府最好放手由市場決定所需勞工的種類和工資的水平。我們或許可以仿效新加坡的辦法，每輸入一名勞工，即徵收一筆定額費用，這筆徵費不僅可用來支付額外的社會間接開支（至少支付一部份），而且因為對各級勞工均劃一徵費，所以亦可作為吸引僱主輸入較熟練勞工的優惠條件。此外，輸入勞工計劃即使要設定配額，也應容許有極大的彈性。

輸入外地勞工是否只有僱主得益？倘若我告訴工人和工會領袖說輸入勞工對工人利多弊少，他們可能會覺得此說十分荒謬。然而，我所說是真的。以為維持現時的勞工短缺狀況便是對工人有益，不僅是缺乏遠見的想法，實際上也自欺欺人。本港如短期內不輸入大量勞工，通脹肯定會繼續惡化，生產成本上漲，然後是本港在國際間逐漸失去競爭力。結果，將會出現自動調節的緊縮效應，經濟增長放緩，若干製造行業的失業率上升，工業移往中國與海外經營的情況大增；工資水平會因此被壓抑，工人身受其害。同時，通脹令固定低收入的人士受苦最深，因為他們與富人不同，他們不懂而且也沒有資源利用對沖辦法抵銷通脹對其積蓄的影響，也不可以把較高價錢轉嫁給購買者。反過來說，倘若適當行業輸入足夠勞工，通脹率當可下降。某些行業現有勞動人口的工資水平短期內可能會稍受壓抑，但隨着生產能力擴大，通脹率下降，經濟增長加速，工資水平和工人福利自會迅速提升。有人擔心輸入勞工會有不良後果，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以本港目前的境況來看，我們大可不必擔心。有很多實例證明輸入外地勞工行之有效。當年香港就是在不同時期有大量人潮湧入，實現了本港的工業化過程。在新加坡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其勞動人口有超過 10% 是從外地輸入。德國於戰後重建經濟期間，輸入外地勞工也擔當了重要的角色。

然而，政府同時亦應施行積極的人力資源發展策略，換言之，政府須重視勞動人口的教育、培訓與再培訓工作。當局應成立一個適應經濟轉型的特別培訓基金，藉此為工會、行業團體和個別僱主提供設施與優惠措施，俾能給予員工足夠和適當的培訓與再培訓，以助員工轉職和學習新技能。

副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司徒華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施政報告》說：政府當局「這個角色與西方民主制度下執政黨所擔當的角色極為不同」。實際情況是不是這樣呢？並不，其中有異，也有同。

所同之處是：行政局是《釐定政策的主要機構》，其成員全部由總督委任，完全有如執政黨的內閣。政府當局，就是執政黨。

所異之處是：第一，這個執政黨並不是通過選舉而取得其執政地位的，在超過半數議席通過選舉而產生的議會中，它沒有絕對的把握取得超過半數的支持。

第二，政府官員，並不是只聽命於執政黨內閣指示而去執行政策的，純粹文官制度的，保持中立的架構。執行政策者，去委任組成釐定政策的內閣，執行政策者與釐定政策者合而為一，並且，執行政策者居主導地位。

有異有同，就是矛盾。產生矛盾的唯一原因，就是沒有民主制度。這是由於百年來殖民地的幽靈在作祟，即使還不到六年就要在名義上擺脫殖民地的今天，這個幽靈和另一個換了顏色的幽靈仍然在虎視眈眈。

怎樣去解決這個矛盾呢？《施政報告》提到「建立有效的夥伴關係」，修改政府當局的「處事程序」，簡化行政局的「工作程序」。但是，怎樣去「建立」，怎樣去「修改」，怎樣去「簡化」，卻語焉不詳。我希望政府官員在答辯時，作出明確詳盡的闡述。

解決這個矛盾，我認為有兩個背道而馳的方法：

- (一) 利用代表著大多數民意的直選議席，在立法局中只佔少數議席的不民主制度，採取種種形式，千方百計去組織有形、無形、變形的「救火隊」，「防洪隊」，「放水隊」，「擡牆腳隊」去取得立法局的多數，對民意置若罔聞，置諸不理。
- (二) 正視政府當局就是並非通過選舉而產生的執政黨這個不合理的現實，充分尊重民選議員（尤其是直選議員）所反映的民意，根據這些民意去釐定政策，而不是單單看在立法局內拉得多少票。

夥伴關係，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既能制衡又可合作的關係。否則這不是夥伴關係，而是主僕關係。我強調：只有能夠制衡，才可以合作。如果一強一弱，一大一小，強大的一方，只會壓倒吃掉弱小的一方。目前的不民主制度，並沒有提供足夠的制衡力量。我希望：在仍然討論研究中的立法局內部制度和行政立法兩局關係，對沒有足夠制衡力量的既有制度作出補救。假如政府當局，是真心真意去「建立有效的夥伴關係」，而不是有效的主僕關係的話，應該主動去促成這樣的補救。

四年後，一九九五年的選舉，在《施政報告》中，佔頗重要的份量，但也是語焉不詳的。直通車在這一年開行了，鋪設的路軌往何處去？駕駛者是不是還是那個幽靈，或是換

了顏色的另一個幽靈，而不是中英聯合聲明所承諾的，除國防、外交之外的、具有高度自治權的港人呢？我要求政府官員在答辯時，明確詳盡回答下列的幾個問題：

- (一) 《施政報告》說：九五年「至少三分之一的議員由直選選出」。這樣的表達方式，實在是太含蓄了。「至少」，即是會超過，有超過的願望，有超過的可能。政府當局，曾經作過怎樣的努力，將會繼續怎樣去努力向 600 萬港人交代，是竭盡所能而作過這樣的努力去爭取這個願望的實現，去證明這個可能性，而不是口惠而實不至的呢？
- (二) 《施政報告》說：「有些議員會由一個選舉委員會產生」。根據基本法附錄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這些議員有 10 人，但對選出這 10 名議員的選舉委員會的組成，並無任何規定。施政報告，為什麼只說「有些」，而不說出具體的 10 名呢？這個數字會否改變呢？如果有所改變，是增加還是減少呢？更重要是在基本法毫無規定的情況下，政府當局將會怎樣去籌組產生九五年的選舉委員會呢？是不是要在中英聯絡小組內進行談判？談判的時候，政府當局會不會諮詢本局？會提出一個怎樣的方案？是不是好似目前的終審法院協議一樣「打死狗才講價，煮熟就要食」呢？
- (三) 根據基本法的規定，目前佔 21 席的功能組別議員，在九五年將增加九席而佔立法局的半數。政府當局，將會怎樣去確定這九席所屬的功能組別？是否會增加除勞工界以外的議席，代表中下階層的功能組別？是使立法局較具民主性，抑或是更少民主性？會不會又是「打死狗才講價，煮熟就要食」呢？
- (四) 九五年，立法局將再沒有委任議員。這樣看來，下一屆的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和各個區議會，是不是也再沒有委任議員，全部由直選產生呢？基本法對此完全沒有規定，這對政府當局來說，是完全沒有束縛和顧忌的。這是對那個百多年來的幽靈，是否有多少歉意和悔意的最後考驗。
- (五) 《施政報告》提及，將會設立一個「獨立的選舉事務專責委員會」。政府當局，怎樣去保證它是「獨立」的呢？只有通過民主公平的方法去設立，才能去保證真正的「獨立」。一個由非民主不公平的方法產生的「選舉事務專責委員會」，怎樣能夠冀望它去制訂公平民主的選舉程序和規則呢？
- (六) 多年來，政府已經或準備即將，把一些很重要的權力，下放給一些名為獨立的機構，例如地鐵公司、房屋委員會、廣播事業管理局、醫院管理局、新機場管理局等等。這些所謂獨立機構，組成成員全部由政府當局委任，也即是由變相的非選舉產生的執政黨去委任，「獨立」從何而來？這不過有如孫悟空，拔出身上的幾條毛，變出其他幾個孫悟空而已。怎能說由孫悟空身上的毛所變成的假孫悟空，是「獨立」的呢？這些假孫悟空，只不過是轉移一般人的視線，使真正的孫悟空避免面對民意、接受監察、承受壓力、遭受衝擊而變出來而已。此外，數以百計的諮詢機構，也存在着同樣的情況。政府當局是否願意、打算怎樣去改善這樣的情況，使中英聯合聲明所承諾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在未來能夠有較大空間實現的可能性呢？

我不但希望，政府官員在答辯時，明確詳盡回答上述的問題；同時，我更希望本局的同事，也關注這個問題，並且，為使這幾個問題能夠得到較好的結果而共同努力。本局雖然還沒有足夠的制衡力量，但是，仍然可以發揮一定的制衡作用。我們正處於歷史的大轉折；不管你自己是否意識到，在實際上是負有歷史的任務。我們要為徹底實現真正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貢獻出自己的真誠和力量，對自己、下一代和歷史，無憾無愧。

我是香港民主同盟的成員，我是香港民主同盟在立法局內的「黨鞭」。香港民主同盟和我們本局 14 位議員將會在爭取民主的道路上，寸進必爭，百折不回，並且願意與所有抱着同一願望的人合作，攜手合作，共同努力。

副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並表示對《施政報告》感到沉重的失望！

譚耀宗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一九九一年快將過去，還有幾年香港就要回歸中國。在這個關鍵性的後過渡期裏，香港政府的責任更為重要，不少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問題需要解決。怎樣協助香港順利過渡，是政府的重大考驗。我希望政府在這個時候能更積極進取，以長遠的目光，高瞻遠矚地為香港的繁榮和各階層人士的福祉作出承擔。然而，這份施政報告的部份內容卻令我感到失望。

總督提到香港正面臨幾個大轉變，其中之一便是本局的大部份議員是由選舉產生，成為憲制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毫無疑問，香港的政制將更趨開放民主，而政府也必須考慮如何適應這種轉變。總督在論及本港的政制發展時，提到本局應該和政府建立一種「夥伴」式的關係，彼此要由衷合作。當然，我相信本局的議員都很有誠意跟政府合作去解決問題，可是單是一句「夥伴」關係並不能解決問題。由於大部份議員由選舉產生，在和政府合作之餘，他們也要向其選民負責和交代的。此外，隨着政制的開放，市民對政府的問責性要求會愈來愈強，故政府的運作方式和與本局的合作方式便需要改變以適應新的需要。我建議政府應首先改變過去的封閉式的決策方式，開放資訊，增加透明度，例如向市民盡量公開已掌握的資料，增加決策科的人力物力，整理資料，把資料電腦化等，都是政府可考慮的措施。

在報告中的「中港關係」部份，總督花了不少篇幅去分析目前中港之間的經濟關係是何等的密切，例如指出廣東省有八成的外來投資來自香港，省內有 300 多萬工人受僱於香港人辦的工廠中等。既然政府明白兩地的經濟關係是那麼唇齒相依至不可分割，為甚麼不去考慮政府在促進兩地經濟關係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呢？因此，我建議政府考慮下列幾點：

一、協助香港的製造業提高科技水平，同時要扶助在華南地區設立工廠的工業家改善技術。

二、積極地和中國方面探討中港兩地科技交流和合作的可能性。

三、與中國方面研究中港兩地在基礎建設和環境保護等問題方面的協調工作。

事實上，政府在制訂香港經濟的發展策略方面，應該要先留意整個華南地區跟香港的經濟發展和合作的形勢，研究兩地的發展如何互相配合，取長補短。我相信只要配合得宜，香港和華南地區長遠而言是亞太地區一股非常強勁的經濟力量，而香港經濟的繁榮也可以延續下去。

談到香港經濟的前景，總督異常地樂觀，認為只要中東戰事結束，大型基建計劃開展，香港的經濟前景便一片光明了。然而，我認為至少在可見的將來香港的經濟仍然會受到不少因素的困擾，高企的通脹率便是其中之一。

眾所周知，高企的通脹率不但損害社會民生，還會削弱香港在國際貿易的競爭力。總督雖然也承認通脹是香港經濟的隱憂，但他對通脹成因的解釋卻顯然是片面和甚至帶有誤導性的。總督只把高通脹歸咎於勞動力不足，而建議要透過輸入外地勞工來解決問題。這種理論只是要低下階層去承擔通脹的責任而已。香港不少行業的工資上升速度都低於通脹率，這是眾人皆知的事，例如製造業便是。我認為其實政府近年來的一些政策才是推高通脹的主因。例如政府近年來大肆加稅加費，縱容公用事業大幅加價等，都和通脹率的上升有莫大的關係。而且，政府即將開展的基建計劃，肯定會刺激本港的內部需求，進一步推高通脹。面對這些情況，政府竟然不肯反省自身責任，甚至推卸責任，實在使人失望。

今年，總督在施政報告中列出政府在來年的工作目標時，提出要「保赤安貧」。以我記憶所及，這是政府近年來首次提到這個名詞。現在政府終於把照顧低下階層利益作為工作重點之一，這是令人欣慰。可是，細閱施政報告內容，我卻很懷疑政府是否真有誠意貫徹這個承諾。

就以輸入外地勞工一事而言，政府就完全無視本地工人的利益。近年來，政府不理全港勞工界的一致反對，一而再地輸入外地勞工，嚴重地削弱本地工人的競爭力，使他們面臨失業和半失業的威脅；年老體弱者更被迫提早退休。然而，政府未能為失業工人提供足夠而恰當的轉業訓練，又不願意考慮設立一個完善的退休保障計劃，反而又再建議輸入勞工，這豈不是「落井下石」嗎？我想政府沒有認真地研究過輸入外地勞工對本地勞工界造成的打擊，而只懂得在經濟放緩時犧牲低下階層的利益。這難道可以叫「保赤安貧」嗎？

總督又說：「政府對改善社會服務和保障處境不利的人士所作的承擔，必須不少於對改善基礎建設的承擔」。這又是一句很動聽的話。可是，事實卻是，政府一方面耗費大量金錢去搞基建，另一方面卻盡量減少自己在社會服務方面的承擔。近年來，政府把社會服務公營化，宣傳「用者自付」，「收費要與成本掛鉤」的原則，減少對社會服務的資助，使市民要付上高昂的代價。就以醫療服務為例，政府設立醫院管理局，把醫療服務公營化，揚言可以改善服務。然而，公營化後的醫療服務會否改善尚待觀察，但醫療費用大幅上升卻是可以預見的。難道這就是政府所謂「保赤安貧」所實施的政策嗎？！「保赤安貧」豈不成爲一句空話？

副主席先生，從以上的分析，我實在很懷疑政府能否做到「保赤安貧」。何況，即使政府真的做到「保赤安貧」，我看仍是不足夠的。以目前香港的經濟成就，政府更應該訂立更高的目標，維護社會公義，促使社會財富能得到公平和合理的分配，避免貧富差距擴大，使各階層都能共享經濟繁榮的果實。這也是維持社會長治久安的大前提。

近來香港的住宅樓價升勢驚人，自年初至今升勢已超過五成，已經完全脫離一般市民的購買能力。受禍最烈的莫如那些沒有資格申請公屋和居屋的中等收入家庭了，他們往往要用收入的七成或以上來供樓，負擔之重實在驚人。樓價的高升，除了打擊很多市民的置業計劃外，還使社會資金流入少數壟斷土地資源的財團裏。因此，我認為政府必須介入以制止這種經濟上的壟斷化趨勢。我建議政府應該制訂更有效打擊炒賣樓宇的措施，增加更多住宅撥地，興建更多公屋和居屋以平抑樓價，使市民都能安居樂業。

可是，對於樓價高升這個困擾市民的切身問題，政府竟低調處理，甚至不在施政報告中提及，實在使人費解和失望！

副主席先生，我想在這個經濟放緩，民生困頓，社會矛盾日益擴大的時候，政府若果不認真踏實地解決一些市民覺得最迫切的問題，只一味懂得粉飾太平，避重就輕，漠視民生，報喜不報憂的話，政府在市民心目中的威信，就會如江河日下了。請政府三思！

副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李永達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由一九八九年總督衛奕信爵士宣佈新機場計劃至今短短二年，中英雙方經過長時間討價還價，有關新機場諒解備忘錄終於簽署了，一方面港人會為新機場發展有所定案而穩定下來，但另一方面，新機場協議安排中，容許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之下組成一個沒有港人代表，而只有中英雙方代表的機場委員會去為日後新機場問題作出進一步磋商，使港人對政府自治權被進一步侵蝕感到憂慮。英方讓步明顯是尋求中方在後過渡期間合作，好使夕陽政策管治得以維持，亦令大英帝國在九七年能光榮撤退。這正是英國政府另一次將港人利益拱手相讓的一項明證。

機場委員會提供中方干預本港事務的一個新途徑。對於工商界來說，他們對新機場計劃當然甚表歡迎，除了是因新機場計劃而即時出現龐大商業利潤機會外，新機場建成亦能維持及發展本港作為一個國際商業、金融及旅遊中心，直接及最先受益始終是工商界人士。但一般市民可得到甚麼？總督衛奕信爵士在八九年施政報告作出展望將來時，為新機場出現描繪出一幅美麗圖畫。

但是，在這幅圖畫還未有實現前，廣大市民經已受到新機場動工影響，最明顯不過的是政府經費收緊，令社會服務開支有所削減，新的社會服務項目更難開展。市民大眾要為新機場佔用大量經費而要大量分擔公共開支。他們更面對日漸削減的房屋及教育資助，並會遲早繳付高昂醫療費用。

新機場興建更為進一步輸入外地勞工製造借口。在過去一年勞工實質工資不升反降情況下，他們面對是職業保障及生活質素下降雙重打擊。對於這班勞苦大眾，新機場現在對他們有甚麼好處？

三年通脹高企，進一步侵蝕了工人工資，但政府高官對此只說束手無策之外，又容許公共事業加價高於通脹，增加間接稅，及縱容地產發展商及有關行業大炒樓宇，這是赤裸裸維護資本家利益而犧牲中下層市民生活。

我並不會寄望單單透過立法局議員們大聲疾呼可以改變這些不合理政策，只有市民自己起來反抗及爭取，這個只會維護大財團的政府才會對市民要求作出一些讓步。

總督在施政報告中迴避了評論九一年直接選舉成敗，令人十分失望，一年多以來，英國政府官員曾經向港人承諾，若九一直選成功，便向北京政府商討可否增加九五直選議席，但總督在施政報告中只說：「稍後，當我們積聚了本局怎樣以新形式運作的經驗後，便須考慮應否就一九九五年各個選舉組別在本局所佔議席的準確比例，與中國當局作進一步磋商」。這無疑是一種推延香港政策民主化的手段。這不是出賣港人利益，又是甚麼？

總督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行政局、行政機關與立法局建立夥伴關係，我希望這是一個在立法局有真正及充分監察行政機關權力下的夥伴關係。一個具體做法，便是將現時立法局與行政局真正分立，立法局內將成立的常務委員會不單有審議法例草案，更有討論政府政策及監督政府權力。行政局議員，為免角色混亂，或被人批評為行政領導立法，應不再擔任這些常務委員會負責人，最後，兩局秘書處轉變為立法局秘書處。這個轉變後，有監察能力的立法局才可與行政局、行政機關建立受市民擁戴的夥伴關係。

現在我轉入討論房屋政策及私人物業價格問題。房屋是一項生活必需品。但在香港地少情況下房屋供應更形緊張，使房屋需求一直不能得到滿足。一直以來，政府對私人物業市場採取放任態度，政府相信透過自由市場供求關係，私人物業價格是可以適當地調整。但是，土地供應有限，再加上地產發展商及物業代理公司囤積商品，令樓宇價格在「不自由」的市場或甚至在地產發展商們控制的市場中，價格不斷攀升。

當供求關係受到壟斷或控制而失去平衡時，政府便應積極介入。但可惜政府在一年以來所頒佈的遏制樓宇炒賣措施收效不大，唯一可以做到的，只是令炒家能在更有秩序及不受黑社會威脅下炒樓。

公營房屋理論上可以是熾熱炒樓的冷卻劑，但可惜，房委會從來未有將遏抑樓價或調節私人房屋供應為其重大目標，一九八七年，在未經公眾諮詢下，房委會所頒佈的房屋策略是以私人樓宇優先策略為主體，主旨為盡量利用及鼓勵私人發展商潛力去滿足市民置業的要求，在這個策略的分析中，估計私人物業在九〇年代供應過剩，所以應透過種種方法鼓勵居民置業，並充份利用私人發展商潛質，房委會的自置居所貸款計劃，便應運而生，這個長遠房屋策略更主宰了未來 10 年的公屋及私屋供應量。在未來日子中，公營房屋興建日漸減少，根據九〇至九一年房屋委員會年報，公營房屋由九〇至九一年 53000 個單位減至一九九九至二〇〇〇年的 30000 個單位。

在長遠房屋策略估計中，在一九九〇年本港已有 380000 未能滿足的房屋需求，雖然政府大概能跟從策略供應房屋，但現時需求明顯比策略大大增加，所以政府有需要對長遠房屋策略作出全面諮詢和全面的檢討。房委會將居屋及出售公屋與私人樓宇價格掛鈎，這種關係使私人物業價格完全不受公營房屋價格影響，反而居屋及出售公屋被私人物業價格牽着鼻子走而大幅上升。出售公營房屋作為一項調節私人物業市場價格工具，便變得蕩然無存。

公營房屋應視作一個社會福利，是一個負責任政府對市民作出承擔的具體表現，在現時樓價高企日子中，這種政府承擔便更為重要，為了使廣大市民在房屋需求得到更大滿足，及遏抑私人樓價上升，政府應考慮：

(一) 增加土地供應，及在社區及交通設施充裕地方，放寬樓宇建築比值比例。

(二) 開徵資產增值稅。

而房委會應檢討長遠房屋策略，將以「私人樓宇優先策略」模式，改為以「公屋／居屋混合主導」為模式。使政府在房屋供應中有更積極介入。將現時至二〇〇〇年興建公營房屋數量由 40 萬單位大幅提升。這些新建單位全部可以公屋／居屋居住可轉變形式興建，去適應市民在購買和租住房屋的要求。房委會亦應取消居屋、出售公屋價格與私人樓宇掛鈎做法，改為以建築成本加上一個合理利潤計算，此利潤進一步作為發展公營房屋資金。藉着公營房屋供應量增加及撤消價格掛鈎政策，一方面以回應一般市民未來 10 年房屋需求，更可以使公營房屋發揮積極調節私人物業市場作用，使樓價回順，令中產階級房屋支出負擔減少。

房屋另一項最受市民爭論的是房委會是否有足夠開放，及是否向市民負責。房委會成員全部由總督委任，而總督又沒有公佈任何明確的委任準則，令到房委會只須向總督負責，而不是一個需要向公眾負責的架構，使房委會可以任意制定受到居民抨擊的政策。我建議房委會採納近似立法局申報利益制度，使委員能受公眾監督。現時房委會與有民意代表成份的立法局並沒有任何憲制關係，房委會在未來財政充裕，無需向立法局尋求撥款，立法局透過控制撥款來監督政府部門做法對房委會是行不通。立法局現時只能透過質詢及辯論兩個方式向房屋署／房委會施加微不足道的壓力。假若房委會繼續制定及推行不得民心政策，就會逼使立法局議員採取第二個做法去修訂現時房屋條例，使立法局與房委會有憲制上連繫，使房委會此一決策機構受到立法局有效監察。

交通擠塞在本港是常見現象，一方面是道路建設與市鎮或地區發展失去協調，加上公共交通工具仍未能滿足市民日漸增加的需要。

政府在九〇至九一年發表交通政策白皮書，以三個發展策略去面對未來交通需求。第一個策略是「改善交通運輸基礎建設」。現時屯門公路已接近飽和，而每天從屯門公路經過荃灣、葵青而進入九龍及香港車輛不斷增加，加上中港貨運急劇上升，政府有需要提早興建第三號幹線郊野公園段及汀九橋，使這段路可以同時在機場落成時一同啓用。這段幹線興建對中港商業活動大有裨益，亦使荃灣、葵青、屯門和元朗間交通更為順暢。

有關機場鐵路方面，亦應與機場開放同時啓用，機場鐵路亦有助疏導沿彌敦道線南行交通擠塞的情況。

在改善公共交通服務方面，政府需要全面檢討現時由兩間主要巴士公司專營的巴士路線，並以資產值方式去保障兩間巴士公司利潤的做法是否合適。明顯地良性競爭是更有效督促巴士公司作出改革及完善管理的手段。現時已經有專利巴士路線以投標形式進行及在合約中並沒有利潤保障的方式是可逐步推廣。

近幾年路面維修工程使更多地區遭受交通擠塞之苦，本人贊同對各類 — 包括政府及公共事業機構，在徵用路面做工程時訂立時限，並對超出時限作出嚴重金錢處罰。為了使道路更有效使用，運輸科應進一步研究，找出進一步擴展巴士專線及專用時間的可能性。

總括而言，我對今年總督施政報告感到失望，一方面總督未能為本港民主政制的進一步發展提出任何展望，而對本港通脹問題更是束手無策。對於遏止炒樓和公共事業大幅加價，亦未有大刀闊斧的建議，對於一個夕陽政府，這樣施政可能是中規中矩，但對於 500 萬希望與政府攜手邁向九七市民來說，這套施政計劃便顯得可能軟弱和蒼白。

劉皇發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機場諒解備忘錄」的簽訂，標誌香港又闖過了一個難關，事實上，歷史不斷顯示香港是一個充滿生機的地方，縱然遇到重大困難，每次都能安然渡過，之後皆變得更為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當然港人不能以此自滿，特別是香港的主權在不足六年後便要回歸中國，期間當會面對很多棘手的問題，我們實在有需要秉承一貫以往務實穩健的處事態度。

在眾多問題中，增強中、港的溝通交流，改善兩地的關係，應是我們迫切需要採取步驟去付諸實行的。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同意，倘若中、港兩地心存猜疑，互不信任，儘管「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制訂得如何理想，「一國兩制」成功的機會肯定會大打折扣。

總督在施政報告中強調要與中國建立夥伴關係，是十分務實和正確的做法。要達到消除雙方歧見，增進彼此了解的目標，其實不但政府需要在各個層面與對等的中國官員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本港的民間機構、政治、學術界團體以及個別人士也應身體力行，加強與中方的溝通，只要大家都有著這方面的共識，中、港兩地的官方和民間的交流合作，將會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情況對雙方都有大利，而在政權交接日近的關鍵時刻，尤其是會起到穩定民心，增強各方面對香港前途信心的作用。

接著我想就一些本港的內部問題表示意見。香港的嚴峻治安情況，令人非常憂慮，無疑最近當局在某些方面，例如在反走私的活動以及與中國公安部門加強合作，都有良好進展；但市民最感關注的暴力行為，卻日益猖獗，而在鬧市持械行劫珠寶金行的案件，繼續經常發生，這類赤裸裸，公然向治安當局挑戰的嚴重罪行，使香港無論對內對外的形象，都受到重大損害。我在上屆的立法局會議上曾就有關問題提出質詢，令人感到遺憾的是至今仍未見到較為有效的預防及打擊措施，希望當局在對付此一問題上，予以更大重視。

打擊罪案，除了要多方面的配合外，確保警隊獲得充足的資源是非常重要的，為此我認為當局最近決定以假期代替警隊「超時補水」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在目前的財政狀況下，無疑政府部門是有需要緊縮開支，但在執行上宜具彈性，況且事有輕重緩急，警隊目前肩負異常艱鉅的任務，維持高士氣是至為重要的，而際此警員人數仍有所不足的時候，以補假代替「補水」的安排是否會令值班警員的數目更為吃緊，令人不無疑慮，希望當局能充份考慮這些問題，以免因小失大，弄巧反拙。

通脹問題已困擾本港多時，大家都了解導致通脹熾熱的成因複雜，而短期內並無特效的靈丹妙藥，但政府較早時推行的一些財政措施，搖擺不定，進退失據，著實令人失望。至於打擊通脹的方法，本局來自財經界和勞工界的同事當會提出很多寶貴的建議。但我想指出一點，政府對付通脹的態度，給人的感覺是不夠鮮明果決。在這個影響全港市民生活的民生重大問題上，政府是有責任負起領導的角色，制訂一套完整的策略。

副主席先生，身為鄉事界在立法局的代表，我想藉此機會反映一些新界人士感到關注的問題。新界是有獨特的歷史傳統背景，這是客觀存在的現實，政府要在新界維持良好和諧的施政，其中的一項重要條件是了解和尊重新界的特殊情況。當局多年前實施政府架構及行政專業化，以取代新界一貫以來的政治與專業並重、而行之有效的制度，鄉議局不斷提出警告，指出新的改變，若果處理不當，是會導致專業部門在處理問題時，傾向於片面地顧及專業方面的考慮，漠視新界的政治因素和實際情況，而部門與部門間之統籌和溝通不足，更會影響效率和引致行政上的混亂，苟如是，將會引致很多糾紛和問題。

可惜當局對此並未予應有的重視，沒有作出相應的補救措施，以致問題相繼出現。最近八鄉上村興建骨灰龕的爭論，便是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地政署和規劃署對事件的見解並不協調一致，令人無所適從；再如當局打算在鄉郊地區岡顧實情地實施污水管制措施，更加使人大惑不解。

鄉郊地區的發展長期以來為政府所忽略，而新市鎮的發展並未能為鄉郊地區帶來生活設施上的相應改善，該等廣大地區一直以來都是沒有集體排污系統，雖然在一九八九年「鄉郊改善策略」中，政府承諾改善鄉郊環境包括建設污水渠等，但至今仍未進行。在這情況下當局遽然要在鄉郊地區實施發牌制度去管制污水的排放，完全是本末倒置、不切實際，強人所難的擾民做法。該項措施在鄉郊地區觸發巨大的反抗情緒，是自然不過的。事實上，在沒有集體排污系統的環境下，鄉民除非不用水，否則產生的生活污水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妥善排放，發牌制度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因而也不能達到改善水質的效果。

政府改善環境的目標，鄉議局和新界鄉民是深表支持的，但對於上述不合理的措施，實在是覺得無法接受。很明顯，解決問題的關鍵是政府從速落實已承諾多時的鄉郊改善策略，在鄉郊地區設置足夠的排污系統，以及其他必需的社區設施，這樣才可以治本而且也是符合民心的做法。

此外，新機場的興建，將會佔用了政府大部份的財政資源，新機場對香港固然重要，但當局應該同時兼顧其他地區有迫切需要的工程，例如：新界西北地區連接市區的運輸系統已呈飽和，因此興建第三號幹線、或連接荃灣的鐵路經已刻不容緩。無疑在資源緊細下，

要進行這些工程，財政上可能會出現困難，但過往的經驗顯示，類似工程的延誤，是會嚴重影響民生及香港整體的經濟發展，代價是非常高昂的；因此，當局是需要認真研究這個問題，尋求解決的方案。

最後，我想談論一下本港因發展或環保需要而對業權人做成影響的問題，最近的灣仔李節街收樓事件，以至城市規劃條例檢討對於補償的爭論，其實都涉及一個原則性問題：就是少數人士的權益在受到公眾利益服務的工程或措施所影響時，他們的利益是否應該得到公平合理的照顧？其實兩者的利益並無衝突，在講求民主公義的社會，都十分重視個人權益的保障，以公眾利益為理由而剝奪部份人士的合理權益，無異於鼓吹極端的平均主義，這樣將不利於維持社會的和諧和穩定。

副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夏佳理議員致辭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總督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提醒我們，若要改善本港市民的生活水準與生活質素，就需要有一個不斷增長而且成功的經濟體系，這實在言之有理。我堅信香港得以成功，除有賴各行各業間維持夥伴一般的工作關係外，亦需要政府奉行不干預的監察制度，以往如是，日後亦會一樣。這可能不是唯一，但肯定是邁向成功的最佳辦法。副主席先生，本港的經濟成就是建基於辛勤工作與自由市場經濟。因此，如果我們特別留意施政報告內有關憲制發展、與中國的關係、進度檢討和立法計劃，以及共同承擔責任維持良好管治等大標題的內容，就會發覺其中的一個共同點：如何能夠維持本港經濟蓬勃，以確保日後的安定繁榮。

副主席先生，基於以上各點，我將會在這次辯論中，集中論述本港的自由市場經濟，以及政府雖不時保證在這方面會繼續維持積極不干預政策，但可能因受壓力以致干預市場的問題。我是指政府與我的其中一位選民同意就住宅樓花買賣訂立的一些管制措施。這些管制措施部份涉及治安問題，例如打擊三合會活動和維持群眾秩序，但其他的管制措施，例如首期付款額或可沒收的金額，則近乎干預自由市場運作。若不加以監察和控制，則縱使未至扼殺本港的自由經濟體系，亦會造成嚴重損害。我的地產界選民在與政府商議的過程中，已多次就政府可能干預市場的問題表示關注。他們如此關注，是因為這問題不單影響地產界，更會干擾整個經濟體系的平衡，經濟失衡會帶來可怕的後果。我的地產界選民認為政府的職責，是要發揮影響力，促使市場自動（我須強調是自動）採取管制或抑制的措施。我相信商人有一種第六感，能按個別情況迅速採取一些相應措施；而這正是正確的做法。另一方面，政府不應純粹因為公眾壓力或焦躁而過快作出反應。副主席先生，政府對有關樓價高企及樓價影響通脹的評論所作的反應就是另一例子。據我對情況的理解，雖然樓宇租金可能是通脹的計算因素，但樓宇售價（不論是高是低）則不是任何通脹指標的計算成份。雖然在理論上，樓價高就會導致租金貴，但這理論亦不是絕對正確的。又有人說樓價高企引致高按揭款額，這又是一個過於單純的說法。銀行在放款前必先對有關樓宇進行估值，然後借出所估樓宇價值某個百分率的金額。我們是否要譴責銀行借出太多金錢？若是的話，這又可否說是另一項干預行動呢？

副主席先生，今年四月，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為 13.9%，八月降至 12.7%，九月再降至 11.5%。是否有人想告訴我們，由於物業價格在四月至九月期間上升，以致使通脹率由 13.9% 降至 11.5%？如果時間的差距超過幾個月，那就很難使人信服物業價格上升是現時通脹問題的主要成因。本局一位同事較早前以豐富的專業知識詳細地闡釋了有關情況，在此我只能說，對於他的見解，我深有同感。副主席先生，物業市場的過熱情況，會像以往多次的情況一樣，進行自動調節。一九八七至一九九一年期間，香港和世界各地年復一年面對接踵而至的危機，以致需求顯著地積壓起來。但今年年初，各個影響香港的重大領域均傳來利好消息，本港各界信心大大增加，叫人感到意外。我必須強烈籲請口口聲聲要採取措施降低樓價的本局同事小心；本人認為，市民置業，正是對自己和香港的前途充滿信心的反映。

副主席先生，最近有人建議增設資本增益稅或增加印花稅，或遠在樓宇落成前提早徵收印花稅。提出建議的人是否明白自己在說些甚麼？他們是否真的建議香港改變稅務政策？如果每次交易都徵收印花稅，是否只會在價格上升時徵收，抑或價格下降時也一樣徵收？我們會否不明智地迫使買樓人士隱瞞交易以求節省費用，以致要冒損失大量金錢的風險？這項措施是否適用於所有類別的物業，不論是住宅、辦公室、商業或是工業樓宇？一旦實施，政府庫房預料可以得到多少稅款？最後，這項措施會否使我們原想設法保障的最後用家增加負擔？要說下去還有其他問題，但我不想說得太多，只是覺得這種構想 — 以打擊需求來取得供求之間的平衡 — 實在不尋常。我們期望的政府新政策絕不是這類措施；還有，這會否擴展至其他範圍？謝天謝地，我們還沒有將這種方法施諸病人和醫院病床不足的問題上。

副主席先生，我最後懇請政府在實施任何對自由市場經濟做成干預的措施前，必須再三思考。香港的成功並非朝夕所致。香港人一向辛勤工作。香港人在香港擁有大量物業；這是他們對香港前途的寄托。我們是否絕對肯定這些措施，除非是自願採取的，不會將需求完全毀掉？我相信政府定會回應以上提出各點。

副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鮑磊議員致辭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

我對一九九一年施政報告的發言將集中討論香港成功的因素。我會解釋為何香港政府必須重申其對經濟繁榮的承諾及其積極不干預的一貫政策。我會論述個人發揮創意、精力及運用靈感的權利。個人是資本主義的動力，這是香港人嚮往的理想，而香港的成功是由不少個人所創造。

副主席先生，從東歐方面我們獲得甚麼教訓？紐約等大城市的破產給予我們甚麼啓示？為何西歐背棄民主社會主義？為何世界各地均有低稅、細小政府及更多自力更新的要求？副主席先生，對於這些問題，答案都是一樣。在改善人民的生活水準方面，資本主義社會市場力量的自由發展及所帶來的經濟繁榮，遠較政府干預經濟活動以圖將這些市場力量轉向特定的社會或政治目標，更有效率及有效。

證據不勝枚舉。最了解情況的，不是政府，而是市場。

副主席先生，聯合聲明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將會保持具有低稅率政策的資本主義經濟。我們應盡所能加強這個香港社會的最大優點。

這哲學是否「商業至上」？副主席先生，對這哲學我們可引以自豪，因為這是普羅大眾的資本主義哲學。這是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哲學，亦強而有力說明了香港成功的價值觀。

香港人及企業家之間衷誠合作，使香港成為世界上最繁榮的地方之一。政府的任務是恰如其份地提供場地及擔任裁判員，制訂明確、公允及對比賽盡少造成干預的規則。擔任裁判員是指確保香港成為一個關心別人的社會，在工業安全、消費者保障、健康、教育等方面具有適當水準。這並非表示我們應建設一個所謂「偉大社會」或試圖以更高稅率的人為辦法將財富重新分配。前者導致龐大的政府架構及日增的國債，後者扼殺企業精神，造成更多貧窮而不是減少貧窮。

立法趨勢

政府凡事都管的最佳明證莫如不斷增多的法例。我覺得現正有所改變，這種改變試圖對香港的經濟及社會生活的不少環節實施新的管制。我們必須確定這種熱衷立法的原因，並追問是否符合本港的最佳利益。

政府當局的行事宗旨未有貫徹始終，這是有所不足之處。

香港社會漸趨成熟，對社會問題例如福利及消費者保障等必然多加關注。不過我們不要忘記，應付這些問題須付出高昂代價：規模更大的政府、更高通脹率、增加稅項及最後經濟放緩。

這種政策轉變可見諸大量新法例的制定，但對於轉變的優劣並無適當討論。單獨而言，個別新法例似屬周全，但連同現行制定的其他法例來說，則可能損及本港的自由資本主義社會。或許香港人認為社會事務較經濟繁榮更重要，這是他們的權利。強行將選擇加諸他們而無適當顧及代價和利益，是不當做法。

就此而言，我歡迎當局在布政司轄下成立委員會，審核有關法例的新建議及訂立優先次序。相信該委員會的成員將會積極反對新法例的氾濫。

法治

毫無疑問，香港人包括經商人士在內必須支持法治。對違法者須訂立有效制裁。然而，成文法及普通法現行制度有何不妥？除此之外，我們是否需要增訂大量條例？副主席先生，現行普通法可以產生有效制裁。

通貨膨脹

副主席先生，我想將話題轉到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對本港市民的影響已耳熟能詳，但其對本港作為出口中心、金融中心、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及旅遊中心等地位競爭能力的中期影響，尚未有廣泛討論。這各方面的不利影響最終將會降低本港市民的生活水準。

勞工短缺

我想評論與通貨膨脹有關的兩個具體方面。首先，我們有能力影響供應以便供求達致平衡。就這點而言，我是指勞工供應。任何對通貨膨脹進行的認真分析都會指出這問題。

一九九〇年輸入 12700 名工人的計劃，一方面受到政府機構的官僚作風限制，另一方面則未有足夠的阻嚇措施以對付違例者，一九九一年當局為了興建新機場而實施另一項計劃，使輸入勞工的薪金中位數超逾本港工人實際所得的薪金中位數。獲益者是來自中國的工人及有關的職業介紹所；損失者是香港人，他們為了新機場而不必要地付出更多開支。倘若當局容許中國大陸的次承建商供應勞工，讓工人每天從蛇口前往大嶼山，節省的開支可能數十億計。為何香港納稅人要給這份禮物予本港以外的機構及工人？

正如施政報告所言，當局需要彈性地輸入勞工，此舉並非純粹為了應付通貨膨脹，亦是為了應付經濟增長。政府一九九二年中期經濟增長預測是 5.5%，但許多人預測將會是 6%。失業率已經下降，而在一九九二年肯定會降至 2% 以下。副主席先生，現正是採取行動的時候，我籲請政府即時付諸行動，以簡單及不受官僚作風影響的辦法增加本港的勞工供應。

作為商界的發言人，對於若干僱主濫用輸入勞工計劃，我甚為憤怒。不過，我們必須採取持平態度：在輸入勞工的總數中，投訴個案少於 7%。對於違例者，當局必須加強制裁。我們應採取迅速及果斷的檢控行動，而不應以更繁瑣的程序妨礙該計劃的運作。

關於勞工短缺問題，我尚有三點要補充：

首先，就是這問題背後所付出的代價。例如，警隊招募人手顯而易見受到整體勞工短缺的影響而更形困難。雖然近月的招募情況已又大有改善，令人非常鼓舞，但到一九九二年勞工市場再度緊絀之時，可能再次出現困難。此外，當局將所有在建築地盤拘捕的非法入境者監禁，亦令致社會承擔龐大開支。最後，本港的護士嚴重短缺，亦影響醫院的服務水準，這點衛生福利司上週已在本局詳細闡釋。

其次，我贊成有關重新考慮來自中國移民的限額的建議。倘若我們將每天的名額增加一倍，即增至 150 人，增多的 75 人便可加入本港勞工行列，我們便可紓緩勞工短缺而又避免輸入勞工計劃的複雜問題。

第三點，我們必須承認，輸入勞工並非唯一解決辦法。提高生產力、舉辦轉業訓練及增加勞工參與率亦是同等重要目標。例如，若干行業的僱主必須獲得政府批准始能讓女工超時工作，但男工則無這種規限，這規定是否必要？

政府在經濟方面擔當的角色

本港公務員工作熱忱、盡忠職守，令人欽羨。但我們必須使每個公務員都能運用其無窮的潛在力量、創意和幹勁。我籲請政府進行徹底改革、發揮公務員的個人積極性，使他們脫離集體主義、集中於效果而不是方法、為市民而不是為上司服務、相信工作成就而不是堆積如山的文件的價值，並且刪除無必要的管理階層。倘若我們能將這些壓抑的力量釋放出來，我們亦有能力削減政府耗用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我在 12 個月前曾談及這些事情。我想請財政司參閱一九九〇年十月二十五日立法局議事錄第 134 至第 136 頁。財政司可否給我們一個進度報告？許多人都知道私營機構有促進效率的措施。容我建議政府邀請私營機構人員提供協助，或許成立一個「效率諮詢委員會」？

私營化

副主席先生，過去 10 年私營化已成為所有先進國家的經濟特色，但香港卻不為這趨勢所動，我實在大惑不解。單以英國來說，有 44 項主要企業及逾 60% 國營工業已轉為私營。為何本港在一九九一年僅有香港仔隧道轉為私營？當其他對市場規律干涉較少的國家正不斷將公營機構轉為私營，為何本港水務署、政府車輛管理處、資訊科技署、機電工程署、郵政署、鐵路運輸及其他機構仍然屬於政府？政府是否已忘記，本港的一個公營屠場改為私營後，現在轉虧為盈？即使私營化並非在各種情況下均屬可行，我們亦應盡快全面將公營機構公司化。

私營機構的建議，例如設立新會議中心計劃亦應予以鼓勵。副主席先生，我對張鑑泉議員的關注深有同感。我們何時知道這計劃的進展？

就私營化來說，員工問題似乎是其中一項引起關注的事情。當然，他們應該獲得公平合理對待，但有關計劃不應因員工關切的事項而有所改變。我再談談個人主義主題。在政府較少干預的環境，個人會享有更大的工作滿足感，創意及生產力亦會受到激勵。

結論

副主席先生，我現以開場白所談的個人主義論點作結。香港一切成就皆因制度容許個人有所作為。歷史說明只有維護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始可能讓我們有真正關心別人的社會，使我們的權利與自由獲得保障。

香港自由企業至上的制度使本港市民享受繁榮興旺。倘若這制度非因人們恐懼一九九七年臨近（我認為這些恐懼毫無理由）而是因一個凡事干預並日漸擴大的政府所影響，這實在令人感到諷刺。

在這次辯論中，若干同僚認為本港應徵收更高稅項、為貧者提供更多福利、管制租金及禁止輸入勞工，他們可能認為上述論點難以接受。

試想一想，我們日後將會如何。我們應抗拒政府置於個人之上的做法，並回復「積極不干預」制度，因為這制度令致本港成功，日後亦會如此。

副主席先生，最後，我想表示，李鵬飛議員支持總督施政報告所述而就與中國建立關係作出的評論，我深表贊同。我今早剛從北京回來。這次我是以私人身份訪問北京兩日，期間進行了多次有用的會晤。我籲請各位同僚盡量以合適的身份訪問中國。

副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林貝聿嘉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總督在三星期前發表的施政報告，很精闢地指出本港現正經歷三項關鍵性的轉變，而這些轉變會塑造我們的未來，本人非常同意這見解，亦深信要確保香港在下一世紀繼續成為亞洲首要城市之一，大規模的投資計劃是必要的。

總督更強調要「做好管治香港這項重要的工作」。誠然，如何在過渡期內有效地管治香港，是這個政府必須面對的問題，而政府在這方面的表現亦一向令人滿意。然而，在九一年下半年發生的幾宗社會事件，或多或少反映了市民對香港政府在管治能力方面信心不足，而總督的施政報告，對於這個問題顯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本年八月發生的銀行擠提事件，雖然迅速平息，卻反映了一些令人擔憂的群眾心理。值得我們深究的是為什麼部份來自各不同階層的市民，當日的表現會是那樣的罔顧常識，一如驚弓之鳥，而政府高層官員的保證和呼籲，卻得不到他們的信賴和支持！！！

另外使市民對政府管治能力缺乏信心的例子，分別是治安及九一立法局直選。前者詳情，我會在稍後詳述，而後者作為一件有歷史意義的重要事件，在政府的熱烈鼓勵和傳媒的大力宣傳下，市民支持的程度，亦只能夠用「相當有限」四個字來形容。

當然，這些事件的性質不盡相同，而政策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也牽涉到很多複雜的因素，然而從公共行政的觀點來看，卻反映出政府「公信力」不足的問題，即是說市民對政府某方面的管治能力缺乏信心，或者對某些政策的意圖有所懷疑。

因此本人深信，政府目前當務之急，是要重建管治的權威和恢復市民的信心，而這便無可避免要涉及中港關係及政府對施政的多個不同的層面。

與中國的關係

首先是中港關係，施政報告在這方面的着墨不多。而這個中港的雙邊關係亦沒有隨着新機場諒解備忘錄的簽署變得一帆風順，其中一個障礙是中方一直不承認立法局的地位。作為香港未來的主權國，如對立法局的態度不變，會令到市民懷疑香港政治架構的合法性，這一來對於市民的政治參與意欲與政府的管治權威都有十分消極的影響，我擔心這種心態如在市民心中漫延，會不利於中英雙方希望順利過渡的共同目標及本港的民主發展。因

此，我們祈望香港及英國政府必須盡其所能，改變中方對立法局的觀點，使中方與立法局建立平等而有建設性的合作關係，進而增強市民對香港及政府的支持。

本人同時在此亦向各位立法局同僚呼籲，政治的本質是協調分歧，求同存異，在處理敏感的中港關係時，不應該製造對抗，觸發衝突，並且要時刻緊記立法局議員的身份，謹慎言行，以大局利益為重。

憲制發展

總督以「共同承擔責任，維持良好管治」作為今年施政報告的結論，本人關注的，正是「承擔責任」與「良好管治」的關係。香港目前實行的是一個行政主導的政府，政府的高層官員擁有極大的決策權，問題是政府的行政架構，缺乏監察的機制，使政府官員要為其所犯的錯失而負責。這種導致「良好管治」的「責任承擔」，應該是香港憲制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而作為監察政府的立法局，在這方面理應扮演一個更積極和更有效的角色，本人對現正研究中的委員會制度寄望甚殷。

民生經濟及社會福利

對一般普羅大眾來說，政府的管治能力也許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他們關心的是本身的生活得到大程度的改善。因此政府要維持良好的管治，便必須切實地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

長期處於兩位數字的通貨膨脹已經是市民的頭號公敵，本人十分高興，知道政府已正視這問題，成立專責小組研究打擊通脹的方法。不過本人覺得各界人士關於通脹問題的討論，過份集中於輸入勞工的利弊，而忽略了其它重要的因素。本人希望專責小組能夠全面檢討通脹的成因，研究每一個打擊通脹方法的可行性和成效，包括實施多年的聯繫匯率制度。不過，無論政府當局最終選擇那一種方法，都不可違反公平的原則 — 不能夠單獨犧牲某一階層的利益。

總督今年的施政報告隻字不提近期樓價的暴升，其實這卻是與市民息息相關的問題，政府實在不容忽視。本人關心的，是在樓價暴升，投機風氣熾烈的環境底下，出現的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以及經濟的不平衡發展。樓價節節上升，有樓人士自然是笑逐顏開，但買不起樓的人士眼看樓價愈升愈高，自置物業的希望愈來愈渺茫，便難免有被剝削和被遺棄的無助感，這種感覺若進一步彌漫於各階層，對社會的安定遲早會構成威脅。另一方面，地產商的盈利遠遠凌駕製造業，雖然這種情況在香港悠來已久，但最近的發展愈趨極端化，對出口帶導的香港經濟發展未必是一件好事。

總而言之，樓價的影響既深且遠，已經不單是地產商和置業人士才可以置喙的問題，政府應該成立專責小組，研究有關的種種微觀和宏觀的社會及經濟問題，並制訂長遠的政策。

施政報告中提到一些需要改善和擴展的社會服務範疇，但本人關注的卻是社會福利經費不足的問題。事實上，很多重要的社會福利計劃，都可能會因為缺乏資助而胎死腹中。目前社會福利計劃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資助來源是獎券基金，只可惜獎券基金只佔每期六合彩投注總額的 3.5%，這百分比實在太低了。本人在今年的財政預算辯論中亦有提及，希望獎券基金的百分比能提升到 10%，可惜當時並未得到政府的認同。根據估計，九一至九二年度該基金可能會出現 1 億 7,000 萬元的赤字，如這入不敷支現象持續，情況確令人憂慮。最近有人建議將獎券基金所佔的比率提高到 8.5%，本人十分贊成，也希望政府對此作出積極的回應。

治安

本港的治安問題確實令市民十分擔心，幾天前在中區鬧市發生的四名悍匪持四槍行劫金行一案，其手法已到了無法無天的境地。光天化日下，各匪均不用蒙面，雖見警員出現，仍相當鎮定，將約值 1,000 萬元的珠寶玉器手錶，放進攜來的袋中，然後向外警員開槍，他們搶完一架車又一架車，在重重包圍下，仍能安然逃脫。這種視警員如無物，罔顧法紀的兇徒，必須繩之於法，處以重刑，以警儆尤。

最近有幾宗大案，警方表現了極高的專業水平，迅速在短時間內破案，這是非常值得嘉許的。本人亦非常高興，看見政府積極制定嚴厲的法案，對付三合會及有組織罪犯集團，希望諮詢期過後該法案能早日提交立法局審議及通過。

不過本人最擔心的，是政府的緊縮政策，對警方的士氣和滅罪能力會否有影響？毫無疑問，政府個別部門近幾年來不斷「發福膨脹」，實有減肥 “Keep Fit”的必要；然而警方的人手和資源，卻只有不足而無過剩。事實上，在本港罪案日趨科技化和武裝化的情況下，政府必須承認警察部作為一個政府部門的特殊性，而政府與市民對警方的人力，裝備和其他資源的投資，其實就是城市整體基本建設的一部份，實在不容吝嗇的。相信許多商人及投資者，亦願意付出比目前高一些的利得稅，來換取良好的治安。

至於長期困擾香港，甚至造成多名警務人員殉職的「走私」問題，由於中國沿海的範圍太大，警方必須作更努力的嘗試，取得中國治安當局的充份合作，「走私」問題才有解決的希望。

環保

本人非常欣慰，知道政府雖然受到縮減開支的影響，政府當局仍然將改善環境問題視為當前急務。但最近的環境污染問題諮詢委員會討論到灣仔東及銅鑼灣渠務問題時，曾提及原定於一九九二至九三年應開始施工的計劃，可能因為政府政費不足而要推遲，而且整體渠務改善計劃是否能付諸實行，完全要看有否足夠的資源。本人對這消息，深感失望，因為維多利亞海港水質的污染，已到了令人不忍卒睹的境地了。因此本人希望環保署能貫徹法例的施行，對於違犯污染條例者，嚴格執行檢控，尤其對一犯再犯者，當局更應判以最高刑罰。本人非常高興知道政府擬修訂法例加重污染環境的罰款及刑期，希望這法例能盡

快通過。本人更建議部份的罰款應交由環保署作為改善環境污染之政費，使環保署能在開源節流的原則下，徹底有效地執行已定的政策。

有關新機場的興建工程即將展開，它對環境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本人建議政府從速進行全面的評估研究，並將報告發表，廣泛諮詢各界人士的意見。

副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劉華森議員致辭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今天我想講幾個對保持我們的穩定與繁榮甚為重要的問題。

現在的情形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已經頒布，爭論已久的機場問題已由簽訂諒解備忘錄而得到解決，而聯絡小組亦就終審庭的組成問題取得共同的意見。看來似乎一切都很順利。但是我們是否可以覺得穩定與繁榮已得確保，而從此可高枕無憂。絕對不可。我們仍有很多困難需要克服，有很多問題需要正視和解決，才能增強本港及外國投資者的信心，繼續在香港投資。

我們發展得相當完善的社會及經濟制度與中國的非常不同。為保持香港穩定與繁榮，我們必須經常與中國各階層溝通，以增強彼此間的了解，而最重要的，是使中國的領導階層充份了解，為了保持我們的現有制度不變，我們必須在社會及經濟事務上有高度的自治，並有一個獲得完全承認的獨立司法制度。

我們只有五年半就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現在該是我們集中努力的時候，以確保香港的法律、財經及政治機構及制度，繼續博得本地及外國投資者的信心，不但在九七年之前，而且要維持到九七年之後。

現在有幾個問題，我們必須在一九九七年之前盡早解決。我想舉出四個例子，以說明我指的是那類問題。

首先，而且是最明顯不過的，是保持工商界對我們的司法制度的信心，這點極為重要。法律界兩個公會及本局大多數議員，都對聯絡小組現時就終審庭法官成員的建議有所保留，令人覺得十分憂慮，這是不容忽視的事。我希望我們可有權靈活決定邀請海外資深法官參加審判，因為這對外國投資者的信心，有極為重要的影響。

其次，我很高興看到諒解備忘錄的簽訂，終於使機場發展計劃得以開展。我們現在必須鼓勵國際性投資者參與這項龐大的基建發展。同時也必須確保各個國際性的大航空公司，繼續利用本港作為其亞洲空運服務中心。任何城市，如用作空運服務中心，就可得可觀的經濟利益，包括投資於飛機維修、伙食供應、行政、貨運與客運管理，及由此等投資而帶來的就業機會。

現已確實知道，新機場的第一條跑道不會在一九九七年前啓用，但啟德國際機場則很有可能在一九九四年達到飽和點。這三年青黃不接的時間，將迫使我們無法增加客運與貨

運。關於此事，我注意到亞洲華爾街日報最近有一篇報導，說新加坡政府宣佈，有一間國際性航空公司曾與它洽商設立一個新加坡空運服務中心，以便將其貨運服務擴展至亞洲地區。我們應當知道，在亞洲有幾個地區，包括新加坡及台灣，正競爭成為空運服務中心的地位。這些地區都採取比香港更開明的空運政策，因而增加了成為空運及貨運服務中心的吸引力。要緊記的是，空運業務，一旦失去就難以奪回，空運服務中心的業務，更加如此。我希望，在與美國及其他國家進行民用航空運輸協定談判時，我們能緊記國際性航空公司繼續利用香港，為其亞洲空運服務中心所帶來的巨大利益。在此類談判中，我們應集中注意香港的整體利益，而不只是本港航空公司的利益。採取較為開明的空運政策，將為我們帶來有利的回報。如果我們的亞洲空運服務中心的地位被亞洲其他國家奪去，那麼對本港的經濟及對新機場的前景，都是嚴重的打擊。

第三點，經常有人指出，香港可由與外國訂立雙邊稅務條約而獲得實際利益。以我的意見，這類稅務條約可能帶來的利益相當大，但政府看來對這意念的跟進頗為緩慢。我必須指出，現在即須進行此類條約的談判，因為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達成協定及加以執行。

第四點，由於利用珠江三角洲及中國其他地方的經濟利益，很多香港廠家及外國投資者，已與中方簽訂不同形式的合資經營合同，利用香港為仲裁中心，並規定其判決可在國際上執行，包括中國。有些人以為，一九九七年之後，香港將自動享有同樣利益，繼續成為中外業務糾紛的仲裁中心。然而，一些中國司法官員及專家曾聲稱，一九九七年之後香港將不准保持紐約公約的獨立會員地位。因此，一九九七年後，香港的仲裁裁決，並無保證可在中國執行。這會嚴重損害香港可能為與中方有關的糾紛擔任仲裁中心的角色。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一十六條，香港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國際組織。我們沒有理由不可以現在採取行動，使香港於一九九七年後成為紐約公約的獨立會員。因此，我促請政府迅速採取行動，透過英國政府澄清我們於一九九七年後在紐約公約的地位問題。擔任這角色的潛在對手，如新加坡，已經很快地看到了一九九七所提供的機會，並加緊宣傳自己是中外商人解決糾紛的適當地點。我擔心會有其他有關我們在國際組織的獨立會員地位的事件。我希望在立法局內繼續進一步研究這問題，以確保我們在一九九七年之前不會錯過任何確立我們的地位及維持我們權益的機會。

副主席先生，提過了影響我們的法律、財經及政治制度最重要及急切的問題的四個例子之後，我想講一講我們經濟發展的問題。為要保持我們的經濟增長及繁榮，我們必須解決土地與勞工嚴重短缺的問題。這是我們長期增長的兩項主要經濟要素。幸而珠江三角洲有大量的土地和勞動人口，因此我們必須善加利用這些資源於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很樂意見到很多本港廠家已將他們的生產線遷往珠江三角洲，利用那裡的土地和勞工資源，為我們的出口產品增值。這類經營已為中港兩地建立了更密切的業務及投資關係，並幫助華南地區加速經濟發展。事實上，香港已在中國的四個現代化計劃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如果我們繼續利用這些華南的資源，將會使香港與實際上與華南，在經濟上結合，而成為同一個體。這肯定是對雙方有利。

然而，有些行業是不能將其生產線遷出邊界之外的，例如製衣、建築、酒店、旅遊及其他服務行業。我樂於見到政府已實施了一項為選定的行業而制訂的有控制輸入勞工計劃。

關於輸入勞工，我認為可更進一步。在可見的將來，我預期我們的工業及基建發展將逐漸移向接近邊界。正如我曾在一九八九年提議，我們應該考慮每日由中國輸入勞工，即獲發給特別許可證的工人，可每日進入香港工作，及於放工後過境回去。這類過境工作的安排，直布羅陀和新加坡已經實行。我預料遲早這類每日過境工作的安排，將會成為必需的事。這類輸入勞工的方法最重要的特點，是不會使我們的社會組織增加負擔。顯而易見，這項安排是對我們有利的。鑑於電子科技的最新發展，我相信這項安排可輕易利用電子控制，即每日以打印機印出逾時留港名單，使警方與僱主可即時採取行動找到失蹤工人。我促請政府盡速認真考慮我這項建議的可行性。

關於解決長期勞工短缺的問題，我的另一項建議是政府可檢討其人民入境政策，以便增加我們將來的勞工供應。我們的人口分佈模式，顯示將有持續性的藍領工人的短缺。這是因為我們的出生率偏低，而另一方面，我們的年青人以追求較高學歷為時尚，因而延遲了他們進入勞動市場。我建議除現時的每天准許由中國進入 75 名移民外，我們應制訂另一個入境特別限額，由人民入境事務處控制，以永久性接納加入我們的社會，那些對本港有利的中國工人，而入境的選擇則須根據若干條件，如年齡、健康狀況、婚姻狀況、技術、教育程度等。目的是選擇那些對我們的經濟證明有貢獻，並能容易與本港社會融合的申請人。

副主席先生，我在總結之前不得不略談通脹問題，這問題是我以前三年都有談論的題目。在我們開始興建雄心勃勃的大規模基建計劃，如海港與機場發展計劃與大都會計劃之前，如果我們不能控制日益加劇的通脹問題，我們將面臨成本超出預算的嚴重問題，而導致難以為這些工程籌資，這個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最重要的是如何在開展工程前遏止通脹。我不想重覆我往年提出的論點，但只想指出，我們實在需要將公共開支的增長削減。由於我們的公共開支增長率，已有幾年超過本港生產總值增長率，上述要求就不是容易辦到的事。我雖讚賞當局努力堅持底線水平的預算，並限制各部門僱員人數的增長率為零，但我必須指出，以人頭計的零增長率，應該與減少不必要的職級重疊的堅定政策，與精簡部門組織架構相輔相成。以我的意見，將一些部門的職員階層減少一級，應該不難辦到。以我所知，已有一些初級公務員投訴，說零增長率政策傾向於導致裁減低級人員的職位，但卻將高級職位升級或改編職系，這樣就一定會增加薪金總開支。既然在職員方面的支出佔經常性開支 60% 以上，減少主管階層的一級，將為精簡架構的最佳措施，這不但是縮減公共開支較有效的辦法，並可從而加速決策過程，進而改善公務員的效率。

副主席先生，我們還有不到六年就要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我所提出的全部問題都需現在著手解決。我們不可視若無睹及採取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因為這些問題全部需要相當時間研究和試驗才可以實行。這些問題都是企業家認為重要的因素，以考慮是否在香港作長線投資。本港及外國投資者，都需要著手解決這些問題的即時保證，否則，他們將會抽調投資而轉投他處。地區內的其他國家如新加坡，已在盡力取代我們在這地區內領先的商業中心地位。外國投資者一旦撤離香港，要再吸引他們回來就非常困難。

副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並支持動議。

副主席（譯文）：尚有六位議員等候發言，會議進度較預期為佳。因此，我建議取消剛才提出的晚餐小休，繼續開會至八時才暫停，希望不致對各位議員做成不便。

梁智鴻議員致辭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今年的施政報告有如自助餐般羅列了種種的激勵言辭和承諾，但總督對於如何將這些構想付諸實行，並無充份的解說。很遺憾，這份施政報告整體上令人十分失望。

我想從以下四方面闡述對施政報告的意見，包括：憲制發展、中港關係、民生，以及我當然要評論的醫療衛生問題。

首先，我樂於聽到政府將於明年中完成選舉制度的全面檢討，以及考慮成立一個獨立的選舉事務專責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看起來獨立，更要緊的是要在每一個工作層面都可以獨立運作。

我肯定本局清楚知道香港民主會 — 這個我和麥理覺議員都是其常務委員的政治團體 — 於今年年初邀請聯合國承認的選舉改革學會，派出一團選舉事務專家來港考察香港的選舉制度。他們當時的一項建議是成立獨立的選舉事務委員會，負責未來的選舉事事宜。我很高興這個建議被當局接納。其實，我們可以更早便開始改革，但遲一些總好過永遠不做。

我同樣歡迎在九五年前當局有可能就立法局的組合成份與中國方面進一步磋商，這不啻是加快民主步伐的一線曙光。事實上，我們的選舉制度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其中突出的有備受爭議的功能組別選舉。

副主席先生，在我們邁向一個全面由直選產生的立法局的同時，建立行政局、立法局與行政機關三者之間的恰當關係同樣重要。這亦符合總督在施政報告中呼籲的行政立法夥伴關係。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這點，因為這是服務香港市民的最佳方法。沒有一個政府可以沒有這三方面的和諧合作而可以運作成功。

說到這裏，我要請大家小心行事，無論立法局的角色，以及行政局與立法局之間的關係日後如何改變，有關的改革均須符合順利過渡以及港人治港的精神。

在這方面有許多工作要落實，其中我認為有三個範圍非常重要：

- (一) 立法局應該全面自主審核法案、討論政策、監察法例的實施以及肯定行政機關妥善地執行有關政策；
- (二) 行政局應吸納更多民選議員，以保證在決策過程中充份聽取及吸納民意；
- (三) 在行局決定政策前，有關事宜應先獲立法局充份討論。

以上建議旨在建立一個更有效率的夥伴關係，貫徹基本法第六十四條訂明行政機關須向立法機關負責的精神。

總督在施政報告中對本局全員表示信任，並委以重任，相信本局同事一定會感到鼓舞。不過，責任必須由實權而來。我希望本局能夠真正獲得實權，達成真正的自主獨立。

談到夥伴關係，總督在施政報告中亦強調中港的夥伴關係，指出我們需要在各層面上與中國當局取得合作。

任何實事求事的人都不會對此有所異議。可是，除非中港之間能夠建立起正式的官方渠道，並盡可能提高透明度，以討論及解決問題，否則，中港之間很難建立任何實質的關係。

遺憾地，在所有高層渠道香港都沒有任何官方代表參與，更加沒有正式的渠道代表香港人。

我要在此強調，任何的夥伴關係都必須平起平坐。在建立夥伴關係時，任何一方都不應被威嚇屈膝或阿諛奉承另外一方。

我希望政府會全力直接或通過英國政府與中國當局洽商，建立多方面的中港官方溝通渠道，以令任何與香港前途有關的問題，均可以通過這些渠道解決。否則，所有有關夥伴關係的說話都只是空談。

副主席先生，沒有立法局這個中方眼中的「禁忌」的參與，要達成有效的中港夥伴關係將十分困難。

然而，連總督本人也沒有在施政報告中提及加入了直選成份的新立法局的重要性。但是，副主席先生，新一屆的立法局肯定是透視社會人心和脈博的一扇窗戶。這是一個不能抹煞的事實，不是中國單方面憑主觀意欲可以改變的。

要達成總督對中港關係的期望，我們必須打破中港之間的心理障礙，香港是一直處於下風的，希望中國方面可以提出主動。

讓我現在轉向民生問題。副主席先生，我們不可忘記市民的信心，是要靠政府在照顧民生問題時付出多少「劑量」的關心來計算的。

在未來幾年，當我們愈接近九七，我們的市民，尤其是那些決定或被逼留下來的市民大眾，會愈來愈關注影響他們日常生活的民生政策。

可是，總督在如何打擊日漸嚴重的通脹以及控制暴漲的樓價兩方面，說得太少，更沒有提出解決方法，但這兩方面正是困擾香港的重大問題，對每一個升斗市民的生計都有沉重

的影響。這些問題若不予以解決，便會打擊他們對香港的信心，而在目前這歷史轉捩點，信心是香港的寶貴資產，不能坐視不理。

總督只是說：「通貨膨脹依然是備受關注的主要問題……通脹問題不是可以輕易解決的。」這並不足夠。

我們需要具體打擊通脹的措施，可是，施政報告並沒有提供任何解決良方。將通脹問題歸咎於勞工短缺完全是短視的，顯示對升斗小民的問題無動於衷。

兩年前，總督在施政報告中向港人承諾興建「玫瑰園」；諷刺的是，兩年後香港市民卻要躑躅於通脹的泥沼當中，不知何去何從。

在此，我要提出警告，如果解決不了通脹問題，我們可能要面對因通脹而引起的諸多問題，從而使我們社會的安定繁榮受到威脅。

雖然醫療衛生歷來都是招惹不滿投訴的範疇，但我本人和醫學界仍不得不對今年施政報告有關醫療衛生的部份表示極度失望。

多年來醫學界和公眾都一直敦促政府全面檢討醫療政策。總督表示「醫療衛生方面正進行重大的改善」，但如果沒有全面的醫療政策，任何改革都不會完整。

今年六月衛生福利司表示政府將於明年初全面檢討醫療政策時，醫學界非常雀躍。但不料施政報告中竟隻字不提這個檢討，我希望醫學界的歡欣不會如此短暫。

我要強調目前進行中的醫院管理局改革，基本醫療健康改革以至醫療保險研究小組所提出的種種建議，絕對不等如可以為香港未來的衛生醫療發展提供一個全面完整的發展方向。我們有需要就我們的醫療制度釐定新的目標和指導原則。在七十年代，醫療政策目標在「平等」，這個目標今日仍然重要，但我們明顯已有更重要的課題需要處理，包括資源分配以及公眾衛生的發展等等。全世界，包括太平洋區的國家已開始就它們的衛生服務釐定特定的指標和政策，香港必須也向這方面前進。醫學界已作好準備與政府攜手合作，我們需要的是政府的決心。

去年立法局曾就全面檢討兒童服務表示極大關注，也強調在預防、保護及賠償三方面改善我們不斷增加的就業人口在工作崗位上發生意外及受傷時得到的待遇。可惜施政報告完成沒有指出這方面的發展方向，令人失望。

醫學界和市民都知道醫療成本急劇上升，而政府亦有意逐步削減開支。有人提出，政府應研究額外的開源方法，一個醫療保險研究小組亦已成立，究竟政府在醫療經費方面有何長期與短期的策略？施政報告隻字不提。

副主席先生，政府必須明白，使擠逼病房內的帆布床消失或對基本健康護理工作小組報告書所載的建議進行零星改善，並不等如醫療得到全面改善，更不足以使員工相信香港政府是個關懷社會的政府。

副主席先生，香港目前處境艱難，經不起逆流厄運，只靠承諾，絕不可能令它成為火鳳凰，從毀滅的灰燼中重生，我們需要的是決心和具體的措施，將願望付諸實行。

副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有保留地支持動議。

麥理覺議員致辭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總督在十月九日向本局發表施政報告時，提到本港現正經歷的種種轉變。在很多眾所關注的問題上，他能夠指出重大的改善，以及預測在未來數年仍有增益。他所描述的香港，經濟及基本建設擴展迅速，市民生活日趨富裕，並期望收入及物質財產續有實質增加；此外，種種跡象顯示，香港社會正愈來愈成熟。

總督確實大有理由對本港的整體發展充滿信心，以及相信它仍具有極大發展潛力。本港經濟結構之佳，世所罕有，且極端穩定，經濟表現十分出色。香港經濟自始以來的發展和運作所依據的基本原則，均為目前絕大多數國家所認許者。因此，我很高興知道，儘管政府面對很多新壓力和問題，它並未建議對本港的經濟哲學和制度作重大的改變。本港經濟發展所倚重的自由企業充沛活力，較簡單的低稅制度，以及盡可能讓個人或公司自由創造財富等因素，已再三證明有助我們穩步獲取結實的經濟及社會成果，若隨意改動，只會自招危險。

然而，總督在談到進一步發展政制的問題時，原本充滿自信的言辭開始略有遲疑，甚或不安。這亦毫不為奇，因為一九九七年將會出現基本的改變，同時本港需明智切實地邁向新的客觀現實，我們希望殖民地政府所賦予的多種自由全部獲得保留，亦謀求新憲制下的管治當局給予更多具爭議性的自由。我們要求港人治港而不受北京嚴重干預的權利，我們請求北京同意，發展民主是本港由殖民地成功過渡至特別行政區的一項必須條件。我們請北京賦予香港人高度自治權，以及相信本港不會實行違背中國利益的政策。鑑於社會主義政制以及建基於民主原則與法制的制度差異極大，中國政府對於香港民主改革的步伐表現極端審慎，亦絕不為奇。

然而，這卻不應妨礙我們力促中國當局同意在迄今議定的基礎上，讓本港進行更快的改革及賦予更大的自治權。我們應繼續以兩局共識方案為一九九五年的目標。英國政府曾經多次答應我們，倘若一九九一年的選舉成功，則會嘗試說服中方同意進行更快的民主改革。現在，一九九一年的選舉已大功告成，本局很快便可證明能夠為着社會公益，有效地協力工作，並可予人信心，全面履行職務。因此，得悉總督表示可能會與中方接觸，我深感高興，相信這是為了改善直選議席的比率的緣故。我謹此恭賀李柱銘議員及其民主派盟友在選舉中大獲全勝，大多數香港人的政治取向為何，已十分明確，他們顯然是擁護自由民主的溫和人士，絕不激進。現在正是本局全體議員拋開歧見，協力合作的時候了。

同時明顯可見的是，我們必須因着中港雙方的利益，日漸加強與中國合作，從而確保順利過渡，盡可能減少磨擦和誤會。中港之間已建立強大的經濟合作基礎，而可資繼續發展之處仍多。中港經濟唇齒相依，一方受損，另一方必受牽連；一方受惠，另一方當蒙其利。我們業已證明，雖然兩地政制南轅北轍，建制原則迥異，但若有重要的經濟理由，卻可緊密合作，甚至可能有朝一日，深圳與香港合而為一，成為本港北面的市郊重鎮，屆時香港的邊界可向北移，而仍舊實行資本主義社會及經濟制度。這是否癡人說夢呢？事實上，更加匪夷所思的事亦曾有發生。無論如何，深圳與香港已透過經濟合作，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在結束政治話題之前，我擬重申我曾再三在本局及其他場合表明的觀點，就是中國現已應着手正式承認行政局與立法局的地位，以及兩者均屬有效的組織。行政立法兩局是香港政制架構中的一環，中國當局現在再沒有理由不承認這點。兩局的地位和效力一旦獲中方承認，將有助促進雙方的了解和合作，為進行溝通及諮詢工作大開方便之門。

現在我轉談一些惹人關注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總督的施政報告對這些問題已多有提及，因此我會力求簡短。

通脹是一項極為嚴重的問題，而導致通脹的各種因素，又非全部受我們所控制或影響，此情況令通脹問題更形複雜。由於香港是以外貿為主的經濟體系，這種情況實難避免，但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卻是我們可以做的。

我所代表的組別 — 香港總商會，最近曾公布一系列我們可以以及應採取的中短期和長遠措施，以打擊通脹這個威脅本港經濟及社會穩定的敵人。香港總商會的意見書已送交政府研究，我不打算在此逐一複述其中所列的要點。

要點之一是銳意削減公共開支，即使這意味在未來一、兩年內，某些適宜進行但非必要的大規模工務計劃須押後撥款，以及公務員整體薪酬的實質開支亦須減少；雖然要削減其中一些開支，但其影響或可因效率與生產力提高而抵銷。另外，某些公共服務由私人機構辦理會更為有效，政府應積極研究將其私營化。

雖然我建議提高政府的生產力，以達致更高工作效率甚或較低成本的目標，也亦須指出，一般而言，任何企業或各主要行業提高生產力，是一項長期的任務，需假以時日才有成果。短期來說，提高生產力不會對改善本港通脹產生鉅大的效果，所以，我們必須找出更直接的解決之道。

當局應出售更多土地，以供興建私人住宅及商業樓宇之用。目前住宅樓宇炒賣活動十分活躍，這主要是因土地供不應求所致。雖然土地委員會同意於明年四月多撥約六公頃土地出售，但此數可能仍不足以應付需求。當地價下降時，供求或許會較趨平衡。

然而，即使推出更多土地發售，但由於這數年勞工嚴重短缺，地產市場所受通脹壓力仍大，短期內提高生產力並不能紓解情況，從中國輸入更多勞工乃勢所必然，政府現在很明顯已理解到有此需要了。

有些人投機地產是為了牟取暴利，此風亦助長通脹節節高升。我很高興知道政府已與有責任感的地產發展商接洽，以期設法遏止涉及黑社會份子以及一些與黑社會無關的投機活動。

通脹使我們的經濟體系染病，良藥難免苦口，但我們應勇於吞服，以求日後的經濟趨於穩健。政府內部成立了一個研究反通脹措施的委員會，我建議應擴大其成員範圍，招納私人機構的專家參與其事。通脹是大家共同面對的問題，自然應由大家一起研究解決的辦法。

總督談到香港人的生活質素，概述了在改善環境和社會發展方面的多項進展。過去數年來，本港確有長足的發展，但仍有不少事情等待我們改善。今天我要就本港社會保障制度與計劃的一環，特別提出一項請求；我建議應由政府統籌推行無需調查經濟狀況的供款式養老金計劃，使所有年屆 65 歲的本港居民受惠。這種養老金將可代替目前需接受經濟狀況調查方可領取的高齡津貼，確保高齡市民無須再擔憂退休後如何過活。本港是較富裕的社會，然而與其他經濟稍遜的地區相比，我們對老年人的態度和給予他們的待遇卻落後於人。我認為為全港高齡人士而設的養老金計劃，比起只惠及工人而非全民得益的中央公積金計劃，較為切合本港的情況。

在現階段，我只促請政府承諾就此項計劃的有關變數與成本進行詳細研究。研究有結果後，我們才可決定是否有能力負擔以及需撥款多少以實施計劃的問題。社會保障學會於本年較早時曾進行一項私人機構的研究，其結果當可為擬議的研究提供不少有用的資料。我們不能長此忽視本港社會保障制度下這極弱的一環。

此外，我要重提月前的一項請求，就是促請各公共交通公司為高齡市民提供優惠票價，此事需經政府與有關公司磋商。小小的優惠，可令高齡市民生活更美好。當然，該等公司，甚至包括地鐵，可以規定只限於非繁忙時間提供優惠票價。

同樣談到優待老人的問題，我呼籲所有提供文娛活動的公司或機構，免費或減價招待高齡市民入場。某些機構早已提供優惠，但很多仍未見這樣做。

我認為政府應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負責推動各機構為高齡市民提供優惠票價與收費。本局當會有議員樂意參與其事，我深信該委員會能為這種形式的社會服務作出重大的貢獻。

最後，我要談到相關的法律與治安問題。以英國普通法與衡平法為基礎的法律制度，最重要的地方是司法獨立，假若組成終審庭的方式對司法獨立構成威脅，採用這法制亦沒有多大用處。中英政府就此問題達成的協議已獲行政局同意，但我認為協議有未盡善與不足之處。中方必須明白，若不能令商家確信本港司法獨立，他們對本港的信心更會動搖。我認為協議應加以修訂與改良；倘若政府向本局提出條例草案，以期使現時中英達成的終審庭協議獲賦予法律效力，我便投反對票。

本局現正研究有關打擊有組織罪行的新法例，我希望此法例能夠迅速獲得通過，以及有效實施。同時，我們亦須體會到我們優秀的警隊實在面對極大壓力；警務人員積壓了鉅額逾時工作補償未獲發放，我更聽說頗高級的警官要做的事太多而資源太少，以致士氣日漸低落。若增加撥款給警隊能提高其整體的效率，使香港治安更好，我認為值得支持撥款。例如，當局應發放積壓的逾時工作補償，必要時亦應再增加撥款，支付進一步的逾時工作補償。

我不打算談越南船民問題，業已有人專注於這問題而在政壇一展身手。然而，這些哀愁的船民快將踏上歸途，盼望他們回到家鄉後，前途會比留在本港較為光明。

我們對本身的前途並非毫無憂慮，我們的命運也非操縱在自己手中。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共同努力，務使香港無論作為殖民地還是特別行政區，均能不斷增長與發展，進而保持其為世上最優秀的經濟地區之一。見解不同和各有所長的人，可為公益而和衷共濟，協力工作，本局同寅當可以身作則，向香港人昭示如何做到這點。

杜葉錫恩議員致辭的譯文：

副主席先生，民選政制剛在香港展步，我們責毋旁貸，必須證明民主並不僅是一種口號，而是為全港推行的一個更公平的政制模式。實行民主政制，並不是為了任何人士或團體的權益，而是為了全體市民的權益，不論貧富、青年人或老年人、資方或勞方、多數派或少數人士。民主的路向，應以維繫香港經濟穩定繁榮和建立公義的社會為目標。要達致這理想，殊非易事，我們必須深入探究一切有關問題，察看本港的法例和當局的政策可作何種改善。

房屋問題

數項重要的問題引起我的關注，其中一項就是仍為最多數人帶來莫大困難的房屋問題。對於渴望能租住或自置一個小型住宅單位的本港居民來說，房屋委員會和私人發展商所關心的，似乎在於如何謀利而不是為了使市民安居。總督在施政報告作出承諾，表示有關當局將會在未來 10 年間興建 40 萬個公屋單位。但問題卻是：誰人獲編配這些單位？這些單位在編配時，會否落入那些一般來說經有適當居所的人士或那些有能力向私人發展商購買居住單位的人士手中？我們期望這些單位主要是分配予那些居住環境惡劣、所繳付租金非常昂貴而又在輪候登記冊等候多年的人士？以我之見，這類人士應獲優先處理。

有關的政策科司級官員表示，當局承諾興建的 40 萬個公屋單位，其中一人單位將會出現短缺情況，我對此事深表關注。這是否表示年老的單身人士的住屋需要又再一次被漠視？香港現時高齡人口數字日益增多，自五十年代迄今，這些人士對本港的經濟發展貢獻良多，當局為何要他們與一些可能未能與人和諧共處的租客同住，此種安排的理據何在？這是否表示由於房屋委員會繼續忽視在市區為單身人士提供住所的需要，而使年紀老邁的單身人士日後將仍須露宿街頭、入住籠屋或以行人通道為棲身之所？有關當局必須矯正過往錯誤的政策，以照顧本港市民的住屋需要為本，而並非只顧及謀取更多利潤。

教育問題

總督在施政報告亦就教育事務作出多項承諾，當局將會在教育事務方面擬訂良好的計劃及撥出所需的款項，這是一項喜訊，然而，待這些計劃付諸實行之時，是否真正能夠配合教育需求，實屬疑問。本港青年人口數字現正逐漸減少，當局實無必要將關注重點放在教育服務的數量上，而讓提高教育質素的機會溜走。很多兒童不知不覺地年屆 15 歲，他們離校時卻沒有具備任何可以使其成為勞動人口一份子的適合資歷，同時亦缺乏能力達致其期望使本身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善。現時學校每班的學生人數仍然偏高，教師的工作量亦過重，頗多教師的學歷只及中學水平而且沒有受過適當的訓練。加上本港的學校以英語教學為主，面對一群被迫接受這種教育方式而對無心向學的學生，他們無能為力。在學生而言，他們認為黑社會的種種活動更能引起興趣。然而，警方仍矢口否認本港存在黑社會問題，企圖在治安問題上以假象隱瞞事實，以消除市民對此問題的疑慮。

治安問題

就治安問題而言，我認為我們應在本年度會期內付出大量時間及精力對付這問題。對於小規模的示威行動，我們應停止採用警方作過份監管，使警方能夠專注對付暴力罪行、黑社會活動及各種犯罪勾當，因為這些犯罪活動正推毀本港無數青年人的前途。

我擔心人權法案向罪惡滔天的犯罪份子傳送了完全錯誤的訊息，這些犯罪份子在社會犯了極其可惡的罪行，卻有能力聘請收費最高的律師，為他們在法例中找尋漏洞，利用人權法案逃避其應得的懲罰。至於這類罪案的受害人，其可獲得的保障可謂微乎其微。與此同時，對於人權一無所知的青年人，在本港法庭裏似乎並無獲得保障。部份青年人曾被勸承認有關控罪，但事前卻沒有給他們警告，說明認罪後對其整生的影響。對於這種趨勢我們必須急謀對策，以免人權法案淪為富裕人士和具影響力人士藉以享有特權的法例，卻不理會那些最需要輔導和需要協助改過自新的青年人，以免他們終生陷入罪網。人權法案應該是保障社會的法例，決不應淪為喪盡天良罪犯藉以逃離法網的途徑。

通脹問題

總督曾在其施政報告中表示，勞工嚴重短缺是導致通貨膨脹的主因之一。相信部分同僚定會強烈反對這個論點，我亦與他們有相同的看法。我揣測建造業缺乏廉價勞工才是原因之一，並認為高昂的建築成本是由於該行業受到黑社會勢力控制所致。黑社會份子不僅向該行業榨取大筆保護費，並循合法或非法途徑從事輸入廉價勞工的勾當。政府當局對此當然矢口否認，然而，除非當局面對現實，否則這種情況無法得以改善，而依然會將通脹問題歸咎於勞工短缺。

土地及物業價格急升肯定是導致通貨膨脹的主因之一，多種工業已經被迫遷往中國大陸繼續發展。另一個引致通脹問題的原因是顧問公司就研究各項工程所收取的顧問費過於高昂，而此等研究工作本港政府部門本身應可應付裕如。另一方面，開設高薪公務員職位，而其中部份職位似乎只屬白白支薪的優差，肯定亦是導致通脹問題的原因之一。當局實施零增長政策並沒有凍結高層職位的增長，實際上反而增加此等職位的數目，然而，此等高

層職位的工作量卻轉嫁至工作量已十分沉重的較低層人員身上，導致不得不削減對市民的服務。

人口問題

在決策科司級首長主持的簡報會上，議員獲悉政府當局現正研究長遠計劃，以應付人口自然下降的問題。以往我曾經建議一個可改善此情況的具體方法，現再次提出，此項方法就是增加每日准許由中國來港的入境者配額，但規定來港者必須是香港居民的配偶及子女。此舉可提供長遠措施，透過此等能溶入本港社會，成為香港一份子的人士，增強本地的勞動力。深信定有人會認為此方法會出現被濫用的情況。然而，現准許輸入勞工的政策已被嚴重濫用。濫用的情況必須透過立法途徑對付，而不應被用作不採取行動的藉口。讓真正的家庭得以團聚可在若干程度上減輕此等家庭被迫分離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同時亦可紓緩部份因此等家庭成員分隔而對本港社會服務造成的負擔，希望香港政府及中國政府會慎重考慮此舉的可行性。

越南船民問題

部分宣稱為人道主義者的人士認為，不管該等尋求較理想生活而由越南抵達本港的人士是否政治難民，本港理應一律收留。我不明白何以該等鼓吹人道主義的人士沒有一視同仁，把為着同一目的而來港的中國人士同樣看待，他們亦似乎對於因偷渡來港工作而身陷囹圄被視為刑事罪犯的中國青年漠不關心。本港的財政能力無法為年老人士提供更佳福利，然而，這群人道主義者卻期望我們付出數以十億計港元，為所有只要是來自越南的非法入境者提供食物、衣物及住屋。越南人民過往甚至現今仍須面對的惡劣經濟環境，乃由美國政府一手造成，但美國政府卻堂而皇之地期望香港能為其在越南引致的後遺症付出代價。讓我公開向美國政府言明：「香港樂於把越南船民送往貴國，以便你們可以行動向這群不幸成為貴國政策受害者的人士顯示愛心。假若貴國無意收留這群人士，請別多管閒事，而香港亦會採用貴國解決非法入境者問題的方法來處理本港在這方面的問題，換言之，香港將會把綜合行動計劃付諸實行，而貴國亦是該行動計劃簽約國之一。」

銷售稅

我亦想就另一問題略抒己見。市民對當局聲稱為壓抑通脹而擬開徵的銷售稅或其他形式的間接稅日感憂慮。毋庸置疑，銷售稅會引致更嚴重的通脹問題，並使升斗市民百上加斤，因而須要求更高的工資，結果使通脹情況更為惡化。開徵銷售稅將會削弱本地居民的購買力，外來遊客早已抱怨香港不再是購物天堂，銷售稅更使他們的購買慾下降，因而對本地各有關行業造成影響。有關這一點，我會讓其他同僚詳加論述，然而，對於開徵銷售稅的建議，相信我們必須加以否決。

婦女權利

最後一個想於今午談及的事項是婦女的權利。女性絕非只屬少數，然而，有時其所受待遇卻遜於男性。很多婦女組織曾呼籲就女權問題成立一個委員會，我認為這個委員會早該

成立。女性所面對的難題，例如離婚後所面對的居住和獨力照顧子女的問題，有些女性甚至可能須應付高利貸人士威迫其為已逃之夭夭的丈夫承擔債務問題，有多少人會了解，又有多少人知道或關心到海外女傭的僱傭合約內規定須在中止合約後兩個星期內返回原居地的規則實是於理不合？此項規定罔顧該等女傭應獲得的保障，例如針對工作時間過長、無良僱主無理對待，以及以中止合約要脅不得作出投訴等不公平待遇而提供的保障。倘能成立委員會，定有不少婦女組織會就婦女權利問題向該委員會躊躇發表意見。

結論

追求民主不僅是崇拜一尊美麗的民主女神像。事實上，並沒有所謂理想的政制模式，因為政制的好壞，須視乎其人民所訂立的法例本質和如何執行該等法例。然而，民主政制可能是市民用以監察政府有否盡責，以及確保可選出能夠在各種問題上真正關心社會各階層情況的人士擔任有關職位的最理想方法。

我們仍須作多方面的努力，以改善本港現時的社會及經濟情況。希望我們在本年度會期集中進行此項工作，而行政機關亦會對本局所提出的各項合理建議作出回應，以達致此工作目標。

副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陳偉業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就總督於本月九日發表的施政報告，本人有以下幾方面希望加以討論：

(一) 有關興建新機場及其核心工程的財務及各項安排：

總督於一九八九年的施政報告中指出，由於啓德機場的使用量已差不多達至飽和，本港極需一個新機場以應付不斷增加的航空需求量；而中英兩國政府已於本年九月三日簽訂了興建新機場的諒解備忘錄，一切似乎已塵埃落定；但總督在本年度的施政報告中卻並未提及有關興建新機場及有關工程的具體融資方法及財政安排實在使人感到遺憾。究竟興建新機場及其核心工程的資金將從那兒籌集？對市民的生活質素會否產生重大影響？通脹數字是否會持續高企？相信都是一般市民所關心的問題，可惜我們並未能從本年度的施政報告中找到答案。

另一方面，施政報告提到興建新機場計劃在六年建築期內的開支，僅佔本港非經常性開支總額約四分之一，而這個開支水平相當於同期的全年本地生產總值的 2% 左右，言下之意，興建新機場的開支對本港的影響似非太大；但就目前所見，本財政年度政府已着手削減及凍結各項公營部門的開支，最明顯是污水處理策略已因財政問題而無限期押後，政府雖然一再聲稱這種壓縮不會影響公營部門的服務質素及效率，但一般市民均擔心在這種資源不足的情況之下，市民並不能享有合理的社會服務及保障。可謂「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最使人感到失望的是，政府從未公佈有關興建新機場及各種基建工程的財政評估報告，但另一方面立法局財務委員會已在本年七月批准撥款 6.5 億元，作為臨時機場管理局的經費，這是政府資助新機場計劃的第一筆撥款。機場財務顧問報告將於一九九二年一月完成，並說根據迄今所得資料及臨時機場管理局現正擬備的經營計劃，政府所須承擔的資金可能不超逾 138 億元，佔機場成本總額不多於 40%。此外根據政府的估計，西九龍填海工程費用大約為 90 億元，西九龍幹線大約為 17 億元，三號幹線 56 億元，北大嶼山幹線 43 億元，機場鐵路 125 億元，再加上其他工程計劃，整個機場核心工程的總費會高達 986 億元。

在工程支出方面政府已有明確的數據，但在財政來源方面，政府往往利用財務顧問公司報告仍未完成為理由，而不作出交代。不禁使人覺得政府是有意隱瞞各項資料及決策，要到既成事實後才向外公佈。類似的情況亦見於各項工程策劃。

政府往往在未公佈有關工程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未諮詢受影響居民意見的情況下，就已着手進行建設工程，令到市民無法表達自己的意見；甚至作為立法局議員，也因資料不足而無法向政府提供意見，更遑論將市民的意見向政府反映。這種罔顧市民知情權的做法，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今天，實有徹底改善的必要。

(二) 電訊事業

八十年代世界電訊科技突飛猛進，港府亦在八五年的廣播事業檢討委員會報告書首次探討發展有線電視的可能性；而繼後的幾年，有線電視投標、衛星電視發牌經營，以及第二網絡發展的討論等，均對市民有着深遠影響，可惜在今次的施政報告中未見提及，實在使人失望。

事實上，雖然政府對傳播及電訊政策的決策架構牽涉多個政府部門及政策科，但許多政策的建議及決定均操縱在少數官員手中，一般民間團體以至民選議員對政策均無機會過問。例如批准有線電視及衛星電視的發牌條件，這方面明顯地對本港社會的資訊流通以及對全港市民的廣播服務有重大影響，但政府一直未有將有關資料（例如：各投標的條件、顧問公司的意見、政府考慮的準則等）公開諮詢公眾意見，可見政府完全漠視了市民的參與。

另一方面，由於政府官員對於有關電訊及廣播的專業技術掌握不足，往往被科技發展以及大財團的意願牽着鼻子走，而政府至今對電訊事業應如何發展並無一套固定及完整政策，亦欠缺相應的發展原則、系統及計劃，使到本港的電訊事業未能追上歐美的先進國家。

使人感到遺憾的是，由於政府當初要顧全有線電視的商業利益，故此在衛星電視的發牌條件中，規定三年內不得播放粵語節目，此舉嚴重削弱了衛星電視的競爭條件，亦犧牲了本地觀眾選擇節目的權利。另一方面，由於發展衛星電視，部份地產公司及財團在未得到小業主的同意，就在大廈裝上接收天線，並要求住戶

繳付費用，另外部份大型屋邨更有財團透過直接或間接控制，而禁止安裝競爭對手的網絡。此種情況並有愈趨嚴重的趨勢，這種做法無疑是罔顧了小業主及消費者的意願，對他們來說絕不公平。

就本港電訊事業的發展，本人希望提出以下建議：在制訂廣播及電訊政策時，政府應：

- (1) 引進更多專門人才；
- (2) 開放資訊及決策權；
- (3) 盡快釐訂長遠而宏觀的廣播、電訊政策及發展原則。

此外，本人並希望政府注意未來有線電視（收費電視）之發展，不應危害免費電視的經營，以保障市民現時免費享用電視節目的權益。

(三) 公共事業

總督在施政報告中指出，通貨膨脹是本港內部備受關注的主要問題。事實上公共事業的收費政策與市民的生活關係十分密切，可惜在總督的施政報告中，並未有隻字提及檢討本港的公共事業，實在使人覺得遺憾。

目前本港的公共事業機構大部份受「管制計劃」所監管；事實上「管制計劃」是確保了這些公共事業機構的利潤，但對其服務質素卻未有管制，就算該專利公司提供極劣的服務，也可獲得一定的利潤，明顯地對消費者不公平。

而最為市民所詬病的是，由於這些公共事業機構大都享有專利經營權，而管制計劃乃保證該公司獲得一定的利潤，當該公司的利潤低於某個百分比(例如九巴的准許利潤為其固定資產平均淨值 16%)，就可以申請加價，而其服務質素則全無保證，明顯地這些專利公司擁有雙重利益。事實上公用事業連年加價，帶動通脹，利潤管制法則顯然是罪魁禍首。希望政府能盡早着手檢討現行的公用事業管制計劃及專利權，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副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對「施政報告」深表失望。

梁錦濠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

立法局與政府的關係

1. 正如總督在施政報告中提及，香港現正經歷著關鍵性的轉變，而今屆立法局初次有大部份議員由選舉產生，更是本港憲制發展的一個里程碑。為香港奠定一個向公眾負責的政治體制，使有效管治能夠平穩繼續下去，無疑是本港未來數年內一項首要的任

務。在這方面，施政報告只提及本局與政府是處於夥伴關係，而不明確指出該夥伴關係的性質，實在令人感到施政報告「搔不著癢處」。

2. 我希望在施政報告見到的是，當局清清楚楚、不花不假地明確闡釋本局與政府之間，是一種監察與被監察的關係。總督在施政報告第 6 段強調，香港的憲制與西方不同，對這點我十分同意。香港的行政架構 — 亦即狹義上的政府 — 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文官系統，政府當然要在一切選舉中保持中立。可是，這只是就政府與個別政治黨派和候選人而言。至於政府與立法局整體之間，前者被後者監察這個關係卻是絕對不能含糊的。其實，正正因為本港的憲制與西方不同，本港沒有部長制，在西方國家一般由民選產生的部長主持制訂的政策，在香港一直都是由公務員負責。就是因為本港的公務員肩負了這樣重要的角色，才更有需要明確和強調立法局的監察作用，只有當政府的施政充份接受主要由選舉組成的立法局的監督，才能保證這些施政能符合大部份公眾的意願。

財政支出優先次序訂定的準則

3. 另一方面，未來數年內本港會進行龐大的基建工程，這必定會影響公共財政支出的結構。同時間，香港經濟正處於轉型期的階段，亦需要對人力資源作出大量的投資，而廣大市民在過去幾十年經濟起飛期間忍受的環境污染和生活質素不佳等問題，到今天亦已急待改善。有鑑於此，我覺得有必要提醒政府，在訂定公共支出的優先次序時，必須確保不會過於側重經濟建設和一些對短期政經利益有關係的項目，而忽略較長遠，無形的社會得益，例如社會福利、文化康樂、環境保護、勞工保障和教育等政策範疇。改善市政設施，為廣大市民提供豐富多樣的文化康樂活動，素來是區域市政局的宗旨和職責所在，但這些繫及市民日常生活便利和身心健康的服務能否有效地提供，以及發揮其應有的效果，端賴政府當局在相關政策領域上的支持和合作。歸根結柢的問題是：政府有否把市政和文化、環境改善和教育等社會性開支放到應有的優先次序上面。

政策的貫徹問題

4. 副主席先生可能會感到我是多此一提，施政報告亦已多次提及環境和其他關於生活質素政策的關注，不下於對大型基建的重視。可是，這裡面還有一個政策能否貫徹始終的問題。總督在歷年的施政報告中許下的承諾，是否有被切實執行，是我們必須仔細留意的重點。在這裡我特別想到的例子，是總督早在三年前的施政報告中（一九八八年施政報告第 83 段），曾允諾政府會大肆改善全港的污水處理系統，但目前這個計劃似乎仍然開展無期。總督在今年的報告中第 57 段提到在未來五年間，政府將撥出 80 億元的經費，用作污水、化學廢物和垃圾處理。但其他資料均指出，這 80 億元是政府早已在去年的五年預算計劃中撥出，並非今年新撥的款項，而要完成整個污水處理計劃，共需達 161 億元的經費。上述提及的 80 億元，只有少部份是用於污水處理計劃。這即是說，與全港市民身體健康有關的污水處理計劃，財政上尚無著落，何時落實還要望天打卦。

5. 總督在整個施政報告均沒有提及兩年前提出的「鄉郊規劃及改善策略」，我希望這並非意味著政府又再一次遺忘鄉郊居民的利益和整體鄉郊的發展。過去政府對新界的政策，側重新市鎮的發展，即把鄉郊地區市區化，這與政府一貫側重經濟建設忽視生活質素的政策偏向是一致的。事實上，香港地小人多，鄉郊地區的均衡發展和保存，不特直接關係到鄉郊居民的生活，亦影響到所有本港居民的整體生活質素。環境優美的鄉郊，其對現代都市生活的調劑作用，不下於心肺在人體的功能。我要在這兒指出，區域市政局是十分歡迎政府這個改善鄉郊環境的計劃，亦會在計劃執行上與政府盡量配合和合作，但整個計劃的執行畢竟是落在幾個有關政府部門，特別是改善鄉郊環境的項目多而小，分散而雜亂，不像其他大型基建工程受人矚目，便更容易備受忽視。我在這裡再一次敦促政府，要把鄉郊規劃及改善策略切實執行。

打擊炒樓投機活動

6. 以上所講的都是較為長遠的改善生活質素的施政，就當前民生來說，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兩位數字的通脹率，而物業市場過熱，是構成高通脹的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政府一個月前提出要採取措施遏抑物業市道過熱，但要治本，我認為一方面需要採取措施打擊炒樓投機的活動，亦要增加樓宇的供應量，透過經濟自然規律平抑樓價。我要特別提出，政府在制訂具體措施時，必須緊遵兩個原則，第一，該等措施不應使到真正買樓自住或置業投資的買家增加負擔，有關措施只應針對投機炒樓人士；第二，該等措施不應導致樓宇減少供應的客觀效果，不能促使發展商把樓宇囤積居奇。只有在遵從這兩條原則下擬訂的措施，才能夠有選擇有分辨地打擊炒樓活動，從而保障真正買家的利益。

總結

7. 綜合來說，我的發言希望政府可以做到以下四點：(一) 不花不假。明確闡釋本局與政府之間是一種監察及被監察的關係。(二) 不偏不倚。在安排財政支出時，不要偏重經濟建設大型基建而輕視普羅市民的生活質素。(三) 不要虎頭蛇尾。政策要貫徹始終，落實執行污水處理計劃、鄉郊規劃和改善策略。(四) 不忽視當前最重要的通脹問題，致力打擊炒樓活動，保障真正的買家。

副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副主席（譯文）：現在已是八時多，根據會議常規第 8 條第(2)段的規定，立法局現應休會。

布政司（譯文）：副主席先生，如果閣下同意，我謹動議暫停執行會議常規第 8 條第(2)段的規定，以便本局可完成今午的事務。

動議經向本局提出，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吳明欽議員致辭：

副主席先生，今天我希望將發言集中在總督施政報告中兩個受忽視的環節。

第一個受忽視的環節是教育政策：總督去年的施政報告中為二十世紀的香港教育提供了一幅十分美好的圖像，但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卻只提出大專學位的擴展為一項政府的「進度檢討」，而對如何改善中小學教育的質素、以至整個教育制度的問題都未有談及。作為香港民主同盟的教育發言人，以及從廣大的學生及家長的權益出發，我對督憲閣下這次的表現大感憂慮；一來這似乎表示政府對教育事業上的投入退卻，二來政府似乎顯示其在教育方面只是着重大專教育的學位擴展，而全不注視中小學的發展以至基本教育質素的改善。

而事實上，單單擴展大專學額並沒有解決香港教育制度的最重要問題，並且由於缺乏其他方面的配合，很可能產生不少流弊。我們可以看到，自從督憲閣下於八八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大幅擴大大專學額的建議以來，大專教育的急劇擴展已帶來不少的惡果。今年不少大專院校出現收生不足，而教學人員、圖書館及課室等資源亦沒有相應擴展，令人擔心大專的教學水平會否因資源不足而出現「量升質降」的結果。而事實上，單方面地擴展大專學額而不注意中小學教育質素的改善，結果只會是沒有足夠良好質素的學生升讀大專，而大專在不斷擴張下，被迫取錄不少質素參差的預科學生，這只會變相令政府在大專教育上的投資未能被盡量利用，培養人材的目標更難有效達致。

此外，由於政府擴展大專而沒有相應的擴展中六學位，亦將會令學制上出現怪現象：政府的目標是在九四年為 24% 的學生提供大專學位，這比例差不多相等於現在中七學生佔適齡青年的比例。這即是說，到了九四年絕大部份能升讀預科的學生，包括那些在高級程度會考中不合格的學生，都可順利入讀某種形式的大專。再加上大多大專採取聯合招生制度，學生很早便可獲悉已被取錄，將會令不少中六學生提不起興趣去學習兩年預科的課程。這些問題的出現顯示我們必須在這時認真的檢討預科學制，因為隨着大專學位的擴展，將來的高級程度會考再不能用來篩選學生，預科變成所有大專生的一個兩年預備課程，但實際上政府亦不應該浪費公帑為每一大專學生提供一個兩年的準備課程。在這情況之下，政府實在應該認真考慮如何改變預科課程，令得它更有價值，甚至重新檢討預科課程的存在意義。

如果從資源分配的角度考慮，政府一向的政策已是將過多的資源放在大專教育身上，而在大幅擴展學額下則更是變本加厲。去年大專教育佔總教育經費的 29.2%，今年在大幅擴展學額上已超過三分之一，平均每位大專生所獲的津貼大約為 70,000 元，但相較之下，中學生平均所獲的資助只為 15,000 元，而小學生則只為 9,600 元，而學前教育更只佔教育經費的不足 1%。政府不斷增加資源於大專教育而忽視中小學經費，令人實在懷疑政府是否有足夠資源去改善中小學教育質素的問題。教育界極為關注的中小學教學質素、日趨嚴重的學生行為問題，以及教師流失及士氣等問題，施政報告中都未有提出解決的方法。教統會四號報告書大力建議推行的課程改革及學生為本教育，本來是改善中小學教育的良好方向，但政府卻只把大量的資源用於擴展大專學額上，令人憂慮四號報告書中提出的良好方向，最終只會因沒有資源推行而流為一紙空文。

政府不單沒有提出對中小學加強投資的承諾，我們去年還不斷看到政府爲了節省資源而推行不少措施以減少對學生的津貼：我們已經看到政府削減了學童的車船津貼，學生要負責洗自己的課室、成人教育的經費被削減。我想請問，我們明年還會見到多少類似的措施？會不會是每班中小班級加多兩三名學生？會不會是文職職員削減而教師要負責更多文書工作？

以上提及的一切措施只會帶來一個結果：學生或是學生家長負擔更多的教育開支，這情況縱使是大專學生亦不能倖免。踏入九十年代，我們明顯的看見大專學費急劇增加，到九四年已達每年 24,000 元，而另一方面，過往六年內獲得政府助學金或貸款資助的學生比例不斷減少，由八五至八六年的 45.6% 降至九〇至九一年的 24.1%；換言之，將來有近八成的學生家庭要自行負擔學生的全部高昂學費。我們看到，教育的總開支的比例在近年來一直徘徊不前，而教育開支多年來都只佔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大約 3%，是亞洲四小龍中最低的比例，我相信如果要改善教育的質素和令更多人接受更多的教育，港府必須積極地投入更多資源，而不是犧牲質素以就數量，或是要求學生家長代替政府的責任，掏腰包以爲子女提供教育。我懇請政府鄭重考慮，在未來的數年內增加教育開支於公共開支的比例及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以令我們能訓練更多更好的人才，協助香港迎接廿一世紀的挑戰。

副主席先生，另一個受忽視的環節是新界西社區。多年以來，屯門、元朗區雖然位處邊陲，與都會區相距遙遠，但獲得政府投入的公共資源不但沒有相應提高，反而較其他社區更低。我希望行政當局能正視此問題，投入合理資源，促使屯門、元朗區的四大問題獲得紓緩：

(一) 內外運輸方面：短期內改善青山公路及屯門公路的使用效率，提高運載量；長期而言從速興建第三號幹線的新界西與葵涌相接段落；興建集體運輸系統相接新界西及荃灣地鐵總站。此外，輕便鐵路的服務質素及專利特權等仍應重新檢討。

(二) 治安秩序方面：增加警方人手及設備，改善警隊士氣及效率。

(三) 環境污染方面：應特別注意屯門河的污染。

(四) 醫院服務方面：尤應注意青山醫院的病人太多，院舍過擠及屯門醫院急症室 24 小時啓用問題。

副主席先生，我明瞭到政府爲了承擔機場及基礎建設的龐大開支而壓力沉重，但無論如何，就算「基建壓倒一切」，也不應該「基建壓掉一切」吧！希望當局三思。

副主席先生，我對施政報告表示失望。

副主席(譯文)：我現依照會議常規的規定，宣布會議暫停。明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復會。

會議遂於下午八時十一分暫停。